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战俘手记

 **eBOOK**
网络资料 电子图书

第一章 为了祖国赴朝鲜作战

我所在的部队是 1951 年 3 月 21 日入朝鲜作战的。出发前，上级把我从团宣传队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教干事，负责编印《战斗快报》。我背上油印机就随部队开拔了。

那时我才 21 岁，满身初生之犊的劲头，对于战争还带着相当浪漫的观点。虽然我参军后也经历过解放成都战役和川西剿匪战斗，但那只是风卷落叶似的扫尾作战。而且作为一个文艺兵，我从不曾直接投入战斗。因此，我对战争的那点认识，远不足以使我懂得战争的残酷性。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从安东（即现在丹东市）跨过鸭绿江大桥时的情景：我们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铁桥，大家不时回头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快过完桥时，我组织宣传队员们一起激动地高呼：“再见了，祖国的亲人们！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第一脚踏上朝鲜那被战火烧焦了的土地时，我转过身来看着被夕阳映照得金光闪闪的鸭绿江水，心想：“你放心地流向大海吧，我们决不允许敌人的铁蹄越过你去践踏祖国神圣的土地！”

根据上级命令，我们必须抢时间在 15 天内赶到三八线，也就是平均每天要走 100 里地。

现在回想起这 1500 里强行军，真难以想象是怎么挺过来的。朝鲜战争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何等严峻啊！

那时我军还未掌握制空权，只能夜里行军。北朝鲜多山，我们摸着黑上山下山。偶尔过一段开阔地，也总有敌人的照明弹挂在天上，总有敌机轰炸扫射。每当走上顺着山沟的较平坦的公路，两边山梁上就有敌人用汽油弹点燃的两条火龙来代替照明弹，以便它的“油桃子”喷气式飞机向我们轮番狂轰滥炸，既造成我军伤亡又干扰我们的行进。

我们不得不时而疏散卧倒，时而跑步急行。等到能正常行军时，背负的那几十斤重量已使得双肩愈来愈感到撕裂般疼痛；等到双肩压得麻木之后，眼皮就会愈来愈沉。听到一声：“原地休息！”往路边一躺就入了梦乡。好不容易走到宿营地，有村子也不能进屋休息，更何况那时已经很难找到几间未被炸毁的房舍。我们只得先挖好避弹坑才打开背包躺下。要是遇到下雨，夜行军就更加困难，一晚上不知要摔多少跤！

有一次到了驻地怎么也找不到一席避雨之地。挖的掩体里马上就灌满了水，只好把自己绑在树干上在雨里站着睡觉。刚迷糊过去，突然近处的一个蝴蝶弹（敌机扔下的一种定时炸弹）轰响了，把头顶上胳膊粗的树枝都给削断了。我从未经受过这么可怕的危险和艰苦。这一切使我不再把入朝作战单纯地当成一件光荣的事，也无心去欣赏异国风光了，我甚至曾怀疑过自己能否坚持走到三八线去。只是在一路上不断看到被美军炮火夷为平地的城市和村镇，不断听到那些失去了亲人的朝鲜妇女儿童儿童的悲啼之后，我内心升起愈来愈强烈的对敌人的愤怒和对祖国的责任感，才逐步克服了自己的软弱。后来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只要炸不死、累不垮，我爬也要爬到三八线去投入战斗，消灭鬼子！”

第二章 初战告捷的欢乐

1951年4月4日，我们终于按期到达三八线南边的前沿阵地。尽管我们团驮炮的骡子已所剩无几，运弹药、粮食的汽车也几乎全被炸毁，但人员伤亡并不大。经过短期修整，战士们又生龙活虎地恢复了元气！

我们团驻扎在金华、铁原三角突出地带的—个山沟里。大概由于上次战役我军推进得很快，敌人还来不及破坏就被赶走的缘故，山沟里的村子竟大部分完好。为了对付敌机轰炸，我们把高射机枪架在两边山头上，战士们的步枪也是实弹以待。每当空袭警报的枪声打响，十几架高射机枪和几千支步枪就同时瞄准敌机，—声令下同时射击。有一天，—架耀武扬威的“油挑子”终于被我们击中起火坠毁在山后。我们抱在—起又笑又跳高兴地大喊：“看你龟儿子还神气不神气！”

有—次，我跑到山顶上央求机炮连指导员让我亲手用机枪打鬼子飞机。面对着俯冲下来的敌机，我从瞄准镜里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了那个戴着头盔的鬼子的面孔，那副狂妄残忍、不可—世的样子使我愤怒地扣动扳机向他射出一串串复仇的子弹。虽然我没能打中它，我的机枪的巨响和硝烟却压倒了敌机向我扫射时的轰鸣，并冲去了我内心对敌机的恐惧。

回到村里，我愉快地哼着歌子用老乡的石磨磨炒面，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准备干粮。

正好团政委赵佐端同志到我们机关连来视察大家的战前准备情况，他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屋里来，又高兴地尝了我磨的炒面。第二天，政委在机关连的战斗动员会上表扬我说：“别看张泽石同志是个大学生，过惯了大城市的优裕生活，现在钻山沟、吃炒面还蛮高兴！看来战争真能锻炼人哩！”多少年了，我总忘不了团党委书记对我这个知识分子党员的鼓励。

1951年4月中旬，我们团投入了第五次战役第—阶段的战斗，为了采访英雄事迹，我随主力营参加了那次消灭美军—个坦克连的战斗。我进一步体验敌人高度机械化装备的技术力量，他们那坦克炮和榴弹炮的声音大得吓人，火力很猛，把我们占据的山头炸得山石横飞，临时挖的掩体几乎全部炸平，幸好我们隐蔽在山梁背后没有太大伤亡。但我也亲眼看到我们的战士那顽强的战斗作风。他们勇敢机智地用无后坐力炮抵近射击，又沿着小河沟冲向坦克，用集束手榴弹和爆破筒把—辆辆坦克打得冒着烟团团转着，最后瘫倒在河滩上。那时，我真想跑上去拥抱他们！战斗结束后，我在《战斗快报》上写了—首快板来歌颂战士们的英勇顽强。

我军在第—阶段打得很好，我看见从前线押送下来的敌方俘虏，不只有美国和南朝鲜官兵，还有从英国、土耳其等国来的不同肤色、不同军装、佩戴不同标志的士兵。这使我体会到朝鲜战争确实是一场国际战争，是当时两个阵营、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场大较量！

我军首战告捷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

第三章 不幸落人敌手

北汉江陷入重围

1951年5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

我们再次带上一个星期的干粮和轻武器，又一次涉过北汉江，沿着铁路向南穿插。

正面的敌人竟不战而撤，然而从两侧升起的探照灯光柱却像尖房顶棚的支柱般交叉排列在我们头顶上空，指示着它的炮群向我军射击。

三天后我们已靠近春川，前方传来友邻部队围住了南朝鲜军队一个团正在围歼的好消息。我们停下来担任掩护，美军却并未前来解围，我们和敌人只有一些零星战斗。

到了第六天，我们忽然奉命迅速后撤，但在到达北汉江畔的芝岩里时，又停下来去抢占鸡冠山等山头，掩护友邻部队撤过江去。原来我们军承担了掩护全线大踏步后撤的任务，我们师则为全军断后。

翌日，四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北面尤甚。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已被敌人包围了，但这时内心并无丝毫惊慌。我深信我军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能突围出去。

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密集的排炮把我军占据的山头上的树木几乎全部炸光，战壕已无法修复。眼看美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爬上来了，战士们忍着伤痛、饥饿、疲劳从岩石后面用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奉命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弹药送上去阻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敌人不再硬攻而采用飞机、大炮向我军据守的高地倾泻钢铁和凝固汽油。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盼望的援军并未到达。我军伤亡很大，弹药所剩无几，而粮食三天前就已吃光！我们终于丢失了周围的制高点，被敌人的炮火压缩在芝岩里南面的几条山沟里。天下起了大雨，部队在山林中躲避炮击已陷入混乱。我找不到自己的上级，身边只剩下从四川带出来的十来个宣传队员。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岩下面，大家都已全身湿透，周身泥浆，在冻饿之中瑟瑟发抖。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既无援兵，又无粮草，找不着组织，甚至辨不清突围方向！

突围

头顶上又亮起了照明弹的惨白的镁光，接着响起了敌机的嗡嗡声。透过雨幕，我看见了在我们这条山沟里还有数不清的战士正低着头，沉默地互相挤在一起坐在泥水里。

炮轰停止了，整个战场沉寂下来。忽然，空中响起了惊人的广播声：

“中共XXX师的士兵们，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投降吧，联合国军优待俘虏。”

这是敌人在飞机上对我们喊话啦，我们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从来都是我们向敌人喊话要敌人投降，今天是怎么搞的啊！但这也提醒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要力争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否则真的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前面沟口上传来一片喊叫声，我听清楚了有人在动员：“要

突围的跟我走，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是汉江，生死在此一举。冲啊！”

随即在沟口爆发了激烈的枪声。

“好，咱们就跟着他们往外冲！”我边对身边的小鬼们说，一边解开干粮袋，把珍存的最后一小碗炒面全部抖落出来分给了大家。水壶早已空了，我们只好舔着树叶上的雨水把炒面咽了下去。一个小鬼提出：“咱们什么武器都没有了，怎么杀出去呀！”

我正为难，旁边一位腿上缠满绷带的伤员支起身来说：“我这里还有个手榴弹，拿去吧！我反正不行了，你们还走得动就快往外冲吧！”

我接过手榴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只感到喉头发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去，用手指了指沟口示意我们快走。

我领着同伴们迅速插到沟口边上，只见前面是约有 50 米宽、100 多米长的开阔地，在照明弹的光照下，遍地是突围中倒下的烈士和伤员。敌人的曳光弹从两侧山头上交叉着倾泻下来。

我观察了一下地形，便攥紧手榴弹领着同伴们沿着山脚下树丛的阴影弯腰向前猛跑。

但还没跑出 50 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我四周溅起泥水，只听见后面“啊”地喊了一声，我回头看，一个伙伴已经倒在地上。

我大喊一声：“卧倒！”就顺势滚进了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我们只得泡在水中隐蔽起来等待时机。

后面又有不少战友往外冲，大都倒在了半道上，不少人也滚到水沟里。

看来只有等到照明弹熄灭才好再突围。但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地射向空中，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

雨停了，东方出现了朦胧的曙光。不久，沟外公路上响起了坦克的轰鸣声。紧接着，在滚动着浓雾的沟口出现了黑色的坦克炮筒。坏了，坦克进沟了！

“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躲起来再说！”我把唯一想到的主意告诉了伙伴们，便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

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光滑的巨石挡住了路。我把手榴弹别在腰带上，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攀，脚下太滑，子弹在我头边溅起的石渣擦破了我的额头。我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便头朝下摔了下去，只觉一阵剧痛就昏了过去……

被俘

我在痛楚中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只带铁钉的大皮靴，第一声听到的是：“OK！THISFELLOWISALIVE！”（好，这个家伙还活着！）那只皮靴又踢了一下我的脸：“GETUP！”（起来！）

我完全清醒过来，看清是几个鬼子持枪围着我，便一下惊坐起来。眼前冒出一片金星，我低头喘息着，下意识地往腰里摸去，发现手榴弹也丢失了。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完了，一切全完了，我怎么没有摔死！”

随着一声更粗暴的“GETUP！”一只冰冷的刺刀挑起了我的下巴，我摇晃着站起来。

不远处，随我一起突围的几个伙伴正低着头，双手放在脑后一跛一拐地被押过来。

我身边的美军将我交给押送他们下来的美军士兵后继续往山上搜索。

难友们抬头看见我，眼圈立即红了。我痛苦地点点头，进入他们的行

列，互相搀扶着走出沟口。

一转出沟口，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令人目不忍睹。而两旁押送的美军却耀武扬威地大声喝着：“HURRYUP！”（快走！）

我的心像是被刀扎一样疼痛起来：“我们被打败了？打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麻木地移动着脚步，思想上的极度痛苦压倒了肉体上的伤痛：“我怎么成了俘虏了呢？我怎么向组织上交待啊？！”我想起“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古训，想起狼牙山五壮士，羞耻的泪水涌流出来。

“拼了吧！现在还来得及。”我向身边的大个子美军斜了一眼，盘算着如果我突然扑上去能否将他手中的枪夺过来。正想着，一块石头绊得我猛一趔趄，好久没缓过气来，我明白凭我现在的体力，单独行动只是白白送死。

“那么，等恢复些体力，再串联些难友，一起行动。即使跑不脱，拼死几个鬼子也够本了。”我这样拿定了主意。

突然，前面一个美军叫喊起来：“STOP！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要找死啦！）紧接着响了枪声。

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正向山脚跑去，美军朝天开枪了。我急得用英语大喊：“别开枪，他是拉肚子要去解手！”

我身旁的那个美军惊奇地瞪着我，立即把我押往后面押队的吉普车旁，向坐在上面的军官报告说：“这个战俘会讲英语！”那位美军少尉好奇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便叫我上车。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英语？怎么跑到朝鲜打仗来了？”

我心一横：“既然已经发现我会英语了，就实话告诉你，看你们怎么处置找吧！”我告诉他：我姓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

少尉却嚷了起来：“啊！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可惜你上了共产党的当，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他见我把脸扭向一边不说话，便又温和地说：“张，你不用害怕。就我所知和谈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他并未注意到这个信息多么震撼了我：“和谈！交换战俘！重返祖国！再见亲人！”这是多么可贵的希望之火，尽管还极其渺茫，却开始使我振作起来。

但当我从车上下下来走向队伍，刺刀紧跟在我后面，又使我回到严酷的现实之中：“敌人难道真会放过我们？不把我们送到台湾当炮灰或送往日本做苦力？对敌人还是别抱太多的幻想吧！”

我一路上歪歪倒倒地走着，严重的饥饿、疲劳使我全身发软、头发晕，但脑子却在紧张地活动着：“敌人如果真要把我们弄走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能跟敌人拼到底，还要团结难友们一起干！”

“对，这又是一场反美抗暴斗争。我不是在沈崇事件后参加反美抗暴学生运动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么？现在继续这场斗争吧！只不过现在是在敌后，条件更艰苦些罢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没什么了不起！”我那惊恐、迷惘的心情开始逐渐安定下来。

在路过一条水沟时，我用溪水洗净了多少天没洗过的脸，把又脏又湿的棉军衣脱掉，只穿我里面套着的一套崭新的单军装，自己也觉得精神多了。

蒙蒙的细雨又下起来，乌黑的云层把两边山头全罩住了。前面，在一个荒凉的河滩上出现了一些军用帐篷和用铁丝网围着的营地，看来这就是战俘收容场所了。我们被陆续押进了铁丝网。

这天是 1951 年 5 月 27 日，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战俘生活。

我终生都将牢记这个日子。

第四章 选择哪条道路

试探

“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被划成一块块长方形营地，每块有篮球场那么大。我们到达时，下来的战俘还不算多，我呆的小拘留营里约有 200 人。

大家靠着铁丝网一周坐下来，疲惫不堪，沉默不语。

外面是一溜帐篷，一些南朝鲜民夫正从卡车上往帐篷里搬运草绳编织的粮包。从那些帐篷的门缝里冒出阵阵蒸气，顺风飘来诱人的饭香，引得我的肠胃一阵阵痉挛，也使得衰弱已极的难友们抬起头来寻找这香味的来源。

时间过得好慢啊！终于那座帐篷的门帘撩开了，两个伙夫把盛着饭团子的箩筐抬到铁丝网大门口来了。难友们骚动起来，艰难地站起来拥向大门。

那位在路上押阵的美军少尉在门口大声喊：“ZHANG！COMEOVERHERE！”（张，到这儿来。）

等我挤出去，他要我整理好队伍，要大家排成一行按顺序到门口领饭，并要我负责给每人发一个饭团。

我尽力大声地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队伍很快排齐了，难友们默默地移动着前来领饭。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大麦米团子，一边说：“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有的难友却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楞楞地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则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站在我两旁的持枪的美军，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WHATAREYOUSPEAKING？”（你在说些什么？）

我用英语回答他：“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否则会引起胃疼。”

另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大拇指说：“OK！”（好！）

我不禁心中一乐，外语也是一种武器呢。

最后一名难友领过饭后，那个黑人士兵拿起两个饭团给我——表示“以资鼓励”。

我没有拒绝，回到难友身边便把其中一个掰开，分给了几个小鬼。

考验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那种大麦米掺豌豆面的“美味”，整个饭团就吞没了。正当我后悔不迭时，那位美军少尉领着一个大胖子美军上尉进了铁丝网来到我面前，指着我说：“就是他会讲英语。”

胖子上尉端详我一会儿，伸手对我勾了勾食指说：“你，跟我来！”

看样子来者不善，我的心狂跳起来。

上尉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时，顺手拎起条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他说看见我这个模样很难过，他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在昆明出生的，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布鲁克斯，父亲是美国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似乎为了证实他有中国血统，又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这既出乎我意料，又引起我的警惕。我不由得抬起头来，从他那高鼻子蓝眼睛里看不出一点黄种人的血统，但从那眼光里却又看不出欺骗和伪善的痕迹。“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我思忖着。

接着他又用英语问起我的姓名，哪里人？父亲从事什么职业？在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心想这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如实地告诉他。便回答他：“我是四川人，父亲是工程师，我学的是物理专业。”

他又问：“你的英语发音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一直是上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师就是美国人。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父母该是基督教徒？”他有些高兴他说。

我停了一下，心里飞快地转着念头：“你错了，我考教会学校只图它教学质量好。

你也别以为教会学校培养的都是洋奴！”接着我想起了“应以灰色面目来迷惑敌人”的地下斗争策略，便说：“连我自己也是个教徒呢！”

布鲁克斯显然更高兴了：“你看你，怎么又跟着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

“不，我是志愿来的！”

“那你是上了当了，共产党就会欺骗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

“但我不能不爱我的国家，就像你也爱美国一样。”

“那当然，但你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谁好呢？”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政治不感兴趣。见解当然也有些，只不知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那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于是我列举了解放后物价稳定，交通恢复，社会秩序好转，学生也能安心读书了等等事实。

他听完沉吟了一下说：“张，我欣赏你的诚实，但你太年轻，不懂得政治，你应当继续求学。”

“我本想打完仗就回去继续上学的，现在不可能了！”

他提高了声音说：“不，完全不，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我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

这个建议真使我大吃一惊。我的脑子又紧急动员起来：“要是答应他，我以后大概得上飞机对我军喊话吧？那我就劫持飞机去东北！不，这太不现实了，搞不好被弄到特务机关去当间谍就完了！看来只有和难友们在一起才有可能开展斗争，但要找个适当理由拒绝他。”

于是我说：“感谢你的好意，但我的未婚妻在国内等着我呢，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你忠于自己的爱情，我不能阻拦你。但这太遗憾了！战俘生活对你会是很苦的，如果你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拿我的介绍信交给押送你的美国兵，他们将立即送你去第八军司令部。我们现在主要是

跟中共作战，很需要你这样水平的汉语翻译。”随即他签名写了个条子给我，又送我两块巧克力，还让我把毯子带回铁丝网里去。

送我走到铁丝网门口时，布鲁克斯又对我说：“张，现在我派不出翻译人员来管理这么多中国战俘，就请你在战俘营里担任翻译协助我们的管理工作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于是我欣然点头同意了。

决断

回到铁丝网内，我开始按照解放前从事地下斗争时党教给我的策略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方针。我决定以当“翻译”来接近敌人，了解敌人对我们的意图，来掩护我在难友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我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爱国主义小组”，以便作为核心去团结难友们坚持爱国气节和共产主义信念。估计团里的领导也未能突围出去，还应尽快找到我们团的党委领导，把自己的打算向领导上汇报请示一下。想到这些，我的颓丧心情完全消失了，种新的、跃跃欲试的激情在心里升起。

一阵低低的啜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近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在哭。我把那床毛毯披在他身上轻声问他是不是想家了？他说：“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大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伤口又踢出血了！”

“你回答得太好了！你是个硬骨头，别哭了。”

“我不怕痛，我是想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我安慰他说：“和谈即将开始，交换俘虏有望。”又告诉他：“现在咱们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虐待。”

我想把他发展为我的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成员，便告诉他怎样观察难友们的政治态度，怎样开展反对背叛祖国、鼓舞大家坚持信念、争取交换回国的斗争方法。他高兴地笑了。他就是后来使叛徒们胆战心惊的硬骨头姜瑞溥。

当天，我还和我们团宣传队那些一起突围的小鬼做了个别谈话，告诉他们回国有望的情况，鼓舞他们振作起来准备向敌人进行斗争，也想把他们发展为第一批爱国主义小组成员。我告诉大家：万一被敌人分开关押，各人就要独立斗争，独自去发展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这批战友后来绝大多数坚持回到了祖国。

1951年5月28日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被叫醒，分别被押上了一长溜汽车。布鲁克斯走来对坐在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室里的一个美国军官说了些什么，那军官下来和布鲁克斯一起走近我所在的这辆车。布鲁克斯指着我对那个军官说：“他就是张，到水原后你将他带给克劳斯中尉。”汽车发动了，布鲁克斯对我喊道：“张，你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我点点头。车子走远了，我回头看见他还在向我挥手。

车队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进。从东边山顶出现了发白的曙光，我判断出我们是在向南走。迎面刮来的寒风使我瑟瑟发抖，我紧紧地靠在站在我旁边的难友、我们团的作战股长韩洛夫身上取暖。他索性打开棉军衣把我裹在一起。

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你要是能生还祖国，请向部队汇报我的情况，申请个烈士证寄回我家。我家在山西……”我没等他说完就反

过身来紧紧抱住他说：“韩股长，就这么自杀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机会时咱们夺了敌人的枪，拼它一场赚个本！”我又指着前面山路上几十辆亮着灯的车队说：“你看，咱们这么多的战士都被俘了！咱们是党员，是干部，自己要寻死容易，谁去照顾他们，谁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俘生活呢？”他痛苦地低下头，被我紧抱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车队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驶去。

“离祖国愈来愈远了！”我仰望着北方，试图寻找那颗北极星，但北边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布着阴霾。

第五章 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对付敌人审讯

1951年5月28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

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军衔、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

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面，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看到这本《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的审讯总算混过去了。

当上“翻译官”

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篷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还有几片鱿鱼。

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军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篷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

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睛。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军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你来了就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那位军官抢着说：“他姓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基督教徒呢！”接着又对我说：“张，克劳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说完对中尉笑笑转身走了。

克劳斯中尉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又指着帐篷里的一张行军床说：“你就睡在这张床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按日内瓦战俘公约，你应与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们吃饭、看病等生活问题。”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工作人员用的袖标让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谢谢您给予我的优待，但我还是和我的伙伴们住在一起好。”

他说：“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你当然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同伴们。”

正说着，一个南朝鲜人进来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中尉先生，运来的战俘都进了帐篷，吃饭是不是开始？”

中尉点了点头，随即将我介绍给他：“朴，张的英语比你，汉语更不用说了，生活管理就由他负责了，你只负责卫生。”朴斜瞪了我一眼点头哈腰地走了。

我立即表示要整理队伍分发饭团。中尉说：“好，你让伙房的伙夫把饭送到帐篷里去分发，你安排好后立即回来用餐。”他想了想又说：“我先陪你去走一趟吧！”

他先带我走进伙房，叫朴把伙房的伙夫介绍给我，并说明以后由我负责分饭；又领着我和伙夫们将饭食送往各帐篷中去，叫我请出两位年纪较大的难友临时负责分发。这时，我趁机在难友中查看有没有我们团的领导人。我心里很矛盾，既希望他们都突围出去了，又想见着一两位团党委领导，好在他们领导下开展斗争，特别是希望尽快向领导上说明我主动争取当“翻译官”的意图，免得被误解为想当汉奸。

中尉一直跟着我，当南朝鲜伙夫们动作太慢时就大声斥骂他们。

等我们分完饭回到营部时，中尉从一个铁皮柜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纸盒，他指着上面印的“C - RATION”字样说：“这是我们士兵们的‘日供应’，这就是你今天的定量供应。”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铁筒肉食罐头，三个饼干罐头，还有一个纸口袋，里面装有一盒烟，一包咖啡，一块糖，一盒纸质火柴。我认真地表示希望自己和难友们享受同等待遇。

克劳斯仔细地看看我说：“张，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必须区别对待，你是我雇用的工作人员，尽管你的身份是战俘，我们美国在日内瓦战俘公约上签了字的，我不打算违反它。”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说要是对待我的难友们也这样就好了。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既然是这样，我谢谢了。”

饭后，我把肉食罐筒带上，对中尉说我要去看看伤员和病号，便到几个帐篷查看了一下，把两位正发烧的重病号扶到医务室去请美军军医给他们打针吃药。当我向那位军医致谢时，他也说：这是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

我不禁想：要是所有美国军人都这么遵守公约，战俘营生活也许并不可怕吧！

在送难友们回帐篷时，我把罐头塞在了他们的上衣口袋里。两位难友竟然握着我的手呜咽起来。这使我非常难过：难友们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温暖啊！

骨气

正当我往回走时，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怪笑，我扭头一看，在营外一根电灯杆下，一个站岗的美军正将手中的烟一根根折断了往铁丝网里扔，而我们的一群难友正左右跑着，去抢地上的烟头。

我感到血一下涌上了头，忍不住跑过去大喊声：“回去，你们都回帐篷去！”

那些难友看看我臂上的袖标，勉强回到了帐篷。我跟进去对他们说：“尽管咱们落难了，但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啊！”看到难友们那憔悴的面容，我心颤了一下，又说：“从部队被围后，大家都没闻过烟味了。我这里刚好有盒烟，都来一支吧！”我取出那盒美国幸运牌香烟请大家抽，但难友们低下头谁也不伸手了。有位大个子难友竟抱着头抽泣起来。我过去把烟和火柴放在他跟前，赶快扭头走了。

这天晚上，我独自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我最担心的已不再是敌人将如何对待我们，而是难友们在经受了这么可怕的挫折，环境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的消极情绪！我该怎么去扭转这种情绪，使大家尽快准备好迎接各种危难艰苦！我多么希望有人来指导我啊！

皮特上士的内心世界

第二天早上，来了个高个子、纯白种人的美军上士。克劳斯把他介绍给我说：“张，这是皮特上士，他今天要带 20 名你的同伴去修补一段临时公路，你去选 20 名身体好点的，由你领着跟皮特上士去吧！”我想了想说：“我的同伴中有的身体还可以，但由于你知道的原因，身体都很虚弱。如果要干活，我希望能给他们增加点食物。”克劳斯同意给他们每人多发两个饭团。

我走进帐篷宣布这一情况。好多难友都举手要去。我看见这些仍在受着饥饿折磨的难友心里很不是滋味，便狠着心挑选了 20 名没有伤病年龄较轻的难友到伙房领了饭食就随皮特出发了。

要我们修整的是美军营房外的一段泥泞的公路。根据皮特的指示，我们先搬运一些碎石子铺上，再用粗砂土盖上。活并不太重，但大家抬着筐仍很吃力，尽冒虚汗。皮特几次要我不参加干活，都被我婉言拒绝了。我不想让难友们把我看成是电影中跟在日本鬼子身边对中国劳工指手划脚的那种汉奸翻译。

中间休息的时候，皮特请我到营房中他住的帐篷里去看看，我跟他去了。在他住的帐篷里整齐地摆了十来张行军床，每个床头都有一个大铁皮箱子，箱子盖上大都放着小镜框、啤酒、罐头等杂物，有的还放有化妆品。这使我很惊讶。我问他要是行军打仗这么多行李怎么办？他说这些东西不算多，行军时每人一口箱子一个帆布袋，每个班十来个人，一辆卡车完全装下了。我心想：真是少爷兵呢！

皮特打开他的箱子取出他全家的相片给我看，告诉我谁是他妻子，谁是他妹妹。接着又给我看一叠他在朝鲜拍的相片，几乎全是些裸体的朝鲜妇女。我感到难堪，赶快把头转开了。他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肯定还没接触过女人吧，张！”

“你不怕这些照片被你妻子看见么？”我红着脸说。

“她见了只会对我更好些！”

我不禁想起解放前美军在北平的胡作非为，对皮特也十分憎恶起来。

皮特见我脸色变了，收起他的东西说：“你们中国人真难以理解！”

我沉默着随他回到工地上，心里充满了对皮特的厌恶和对朝鲜妇女的怜悯。

和克劳斯中尉交谈

连续几天，每天都有几百名难友从前方下来，人数够一火车了就用专列运往釜山市的战俘集中营去。

我每天忙着安排食宿，照顾伤病员。克劳斯中尉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在他晚上值班时不止一次泡了红茶，兑上炼乳请我喝，跟我聊天。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军人，他自己在专科学校毕业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授受他父亲的建议当了兵，他在西德驻扎了几年又调到日本。这次他要求来朝鲜，这里月薪高，回国快，过半年他就可回国结婚了等等。

他说他对古老的中国很感兴趣，问我关于长城、紫禁城的情况。我借此机会给他谈了我们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谈了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古迹的珍视，还告诉他我们为了保护北平古城不受战火破坏所做的艰苦努力。他听了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游览北京名胜。我说：“等战争过去，中美两国恢复邦交，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并趁机问他和谈开始了没有？战争结束后是真会交换战俘么？他回答我和谈即将开始，交换战俘是肯定的。这颗定心丸我第二天就交给了难友们。

找到团党委领导

到水原后大约第 10 天的下午，我从新押送来的战俘中看见了我团的副参谋长杜岗同志。

尽管他头发、胡子都挺长，头上还缠着绷带，一身棉军衣又破又脏，但他那高大的身材和轮廓鲜明的脸仍然使我立即认出了他，我真想一下扑上去抱住他。

我尽力克制着这种冲动，等一切都安排好以后，我悄悄地带上香烟、罐头到他的帐篷里去了。正要开口喊“24号”（他的代号），他立即用眼睛示意止住了我。我看了看四周不认识的难友，便指着他头上的绷带对他说：“跟我去换药吧！”他站了一下，未能站立起来，我赶快过去将他搀扶起来一起走出帐篷。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后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刚轻轻地喊了声“24号”就说不出来话了。他眼圈也红了，说：“这一仗没打好，我们有责任！”接着他问我怎么也没突围出去？还有哪些同志一起被俘了？

我就详细地汇报了战斗和被俘后的情况、难友们的表现和敌人目前对我们的态度以及我自己争取当翻译的意图和组织爱国主义小组的做法，请示他是否可行。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表扬了我的主动精神。接着，他告诉我他在山上领着十几位同志打游击与敌人遭遇、头部受伤被俘的情况。

最后他指示我进一步了解敌人对我们的意图，要我努力去发现可靠的同志，团结更多的难友，鼓舞大家的斗志，但一定要小心防止被叛徒出卖。

他还告诉我他报了自己是炊事员，打算隐蔽在战士中开展对敌斗争，要我别大意暴露了他的身份。

见了他以后，我觉得有了主心骨真是十分高兴。可惜两天后他就随大

队被押往釜山，一直到将近一年之后我们才团聚在一起。

到了6月底，基本上已不再有战俘从前方押送下来。我对克劳斯说：“这里的工作已经不多了，我希望能到釜山去和我的同伴们在一起。”克劳斯说：“张，我们这里靠近前方，待遇比釜山要好，你如果愿留下来我是欢迎的，但我不勉强你！”我向他表示感谢，但谢绝了他的挽留。

第二天，我随着最后一列战俘车被押往釜山。那是一列货车，密闭的车厢上只开了两个小窗口。车厢里很脏，充满汗味和尿臊味，幸好人还不太拥挤，我们能轮流到小窗口去换换气。

列车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沿着东海岸奔驰。我从车厢小窗口望出去，能看见蔚蓝色的大海、被翠绿的山峦环抱的港湾、阳光下白色的沙滩和在海边拾海蚌的孩子们。看见这一切，我是多么希望火车停下来，让我跳到海滩上去自由地跑跳啊！我抓着窗口的铁条，深深感到它的坚硬、冰冷！

前面不远就是釜山战俘集中营了，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囚徒生活呢……

第六章 聚集爱国力量

釜山战俘集中营

1951年6月29日，我随这次战斗中被俘的最后一批难友来到设在釜山市的战俘集中营。

釜山是南朝鲜最南端的海港城市，是美军运送侵朝战争军用物资的主要口岸。

美军在离海湾不远的的一个僻静的山凹里沿公路设置了庞大的集中营群体。这是戒备森严的正规集中营，每个集中营都由三层铁丝网圈围起来，四个角都有高达20米的岗楼；沿铁丝网修有公路以备坦克装甲车巡逻和游动岗哨日夜武装监视。离集中营不远的山头上架设有探照灯。附近还有直升飞机场，停有随时可起飞投入搜索、战斗的直升飞机。

集中营附近除了海军陆战队和李承晚警卫部队的军营之外，还有宪兵司令部、远东情报局、第八军情报部等军、警、完、特机关。

当押送我们的列车抵达釜山火车站，我们被轰出车厢时，强烈的阳光使我们睁不开眼。釜山地区6月底的太阳已经十分烤人了。我们从火车站列队被押往战俘集中营。南朝鲜军队的警戒线把看热闹的老百姓隔得很远，我们就穿着被俘时的破烂军衣在美军押送下汗流浹背地移动着。

大多数难友一个多月来在山上躲避搜捕、寻机突围，被饥饿疾病折磨得衰弱不堪，整个队伍显得十分狼狈。我心里多么希望难友们能挺起胸膛来，就是打了败仗也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气！但我也理解难友们肯定也和我刚被俘时一样还陷在深深的羞辱、迷惘和痛苦之中。

拐过一个山脚，集中营的密密匝匝的铁丝网赫然出现在我眼前。再往前走，就看见在公路两旁的铁丝网里面挤站着不少裹着绷带、拄着拐杖的难友在观看我们的队伍。他们虽然换上了美军的旧军服，但不少难友还戴着自

己的军帽，其中不少是人民军军帽。

看来这是伤病战俘集中营，而且中朝难友们被关在一起。

志愿军难友大都沉默地用难过的眼光看着我们，而人民军难友们的神情则要开朗得多，有的甚至对着我们把两只手举起来紧紧地扣在一起摇动着，示意我们中朝军队的团结和友谊，使我十分感动！我看看自己周围的难友没有什么表示，就赶快向他们点头致意。

朝鲜姑娘的歌声

过了好几个伤病战俘营，公路伸向一个高坡。高坡旁有一个孤立的集中营，从那里传出阵阵悠扬的歌声，使我非常惊讶！走上高坡，我看见铁丝网里的小广场上整齐地成正方形围坐着上百名女战俘，都戴着人民军军帽，一位臂上戴有袖标的姑娘竟然在那里指挥着四部女声合唱。那歌曲我曾听朝鲜房东的女儿唱过，是流行的朝鲜民谣《春之歌》。

啊，这真是仙乐，那么优美的旋律，那么动听的和声！一个多月来，我生活在一个没有生气没有歌声的世界里，突然听见了从牢狱里传出来的歌声，而且竟然是描述春天的歌声！它深深地触动了我心里对自由、爱情、光明的渴望！我的眼睛模糊了：春天，春天，如果在我眼前晃动的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黑色的枪口，而是绿树、鲜花，如果这梦幻似的歌声是来自鲜花丛中，该多么好！

歌声突然中断了，那位小合唱的指挥者看见了我们的队伍，向我们跑过来，站在铁丝网跟前用带有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喊：“志愿军战友们好！朝中人民是一家！金日成、毛泽东万岁！”

我们的队伍停了下来，难友们抬起了头。我激动地回喊：“人民军女战友们好！毛泽东、金日成万岁！”正喊着，冷不防背上挨了一枪托，一声怒骂响在我耳边：“GODDAMN！DONOTSTOP！DONOTLOOKAROUND！”（混蛋，不许停留！不许东张西望！）这使我冷静下来，使我更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囚徒身份！

搜身比赛

我们被押送到挂有“第10号战俘收容所”牌子的营门口就停了下来。接着，两旁的美国卫兵开始了对我们的“搜身比赛”。他们狂呼着一拥而上，搜索每一样值钱的东西：钢笔、手表、打火机……每当有人搜到一样东西就发出一声欢乐的怪叫。我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的瑞士GYMA怀表可以免遭劫难，也被一个大胡子美军在我裤档里找到了，他摸到以后得意地怪笑着，硬把我的裤子全部扯了下来，拿着怀表对别的美军高喊“GYMA”！

炫耀他的“胜利”。

那只怀表本是我父亲送我的珍贵纪念品。1948年我从清华大学到解放区跨过封锁线时，曾用同样的办法使它免被国民党士兵搜走。这次却没有躲过更为狡猾贪婪的美国兵。

经过这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我们被赶进了第10号集中营。我们排队进入一个帐篷，完成每个人的入营登记。在“战俘登记卡”上除了写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所在部队番号、军衔、职务、健康状况等等之外，在卡片的顶上还有一个要求战俘本人必须记住的战俘编号。

我的编号是730030。

然后由一些从战俘中选任的工作人员各领50名新来的战俘到一个空帐篷里住下来。

同时，扔给我们每人一床旧军毯，一身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P.W.”(战俘)的字样，拿走了我们的志愿军军装。从此，我们就正式开始了集中营内的战俘生涯。

寻找

当我疲惫不堪地躺在潮湿的草垫子上，思考着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进来了一位胖胖的战俘操着四川口音问：“你们哪个会写英文？要会，就来参加填写登记卡片工作，我们人手不够。”帐篷里无人响应，我慢慢地举起手，他高兴地向我招手，我们一直走出帐篷。

我们坐在一条田埂上，手里扯着脚下那些因修建集中营而荒芜了的田里的杂草，慢慢地交谈起来。

开始我们只是互相试探，交换了各自的简单情况。当他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大学生、宣传队员等等情况后，显然在感情上比较亲近了。于是，他告诉我他名叫方向前，四川人，从中学志愿参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被俘较早。因为会些英文，一直在这个集中营的“卡片登记科”工作。

在我请求下，他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集中营主要是接收从前方新下来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登记、分类、编队后，即送往巨济岛战俘营长住，只有登记卡片的工作人员、炊事班、清扫队继续留下来。另外在这个集中营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集中营，叫“G-2”，是美军情报部门设置的专门审讯战俘、收集情报的地方，受审人员也是流动的。管理这个集中营的美军上尉叫泰勒。看起来为人还和善。他手下有个美军少尉负责后勤供应。

负责营内管理的有一个大队部，从大队长、翻译，到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等都由战俘担任。大队下面有中队和小队，都设有中队长、小队长。只有大队长是由美军上尉任命的，其余工作人员全由大队长挑选。

最后他说：“你就到卡片登记科来工作吧！这样至少可以不出苦工，可以吃饱饭。”我问：“怎么当个普通战俘连饭都吃不饱？”他苦笑了一下说：“这里每天吃两餐，每餐只有大半碗大麦米饭，饿不死也吃不饱。”

“担任工作的战俘不是应该和美军士兵同等待遇么？”

“你听谁说的？”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呀！”

“我们这里从没有听说过。”

“你们怎么能吃饱饭呢？”

“美军上尉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直接由伙房送来，一般都比普通战俘多点，这就算是报酬吧！”

我想：我必须首先熟悉环境，摸清敌我友情况，再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既然在“卡片登记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便同意了方向前的推荐，和他一起干上了登记工作。

几天以后，我确定他是一个敦厚正直的爱国青年，便发展他参加了爱国主义小组。

朝鲜战友崔成哲

一天，我因感冒发烧到营内的医务室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个很精干的黄种人，年龄不过30岁，穿着白大褂。我以为是美方雇佣的华侨大夫。但等我刚坐在他旁边，他举起大拇指用很蹩脚的中国话问：“你的，蒋介石的这个？”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回答。

他又问：“那么，毛泽东的这个？”

我环顾一下周围，用英语问他：“你会说英语吗？”

他高兴了，使劲点点头说：“当然！”便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反问他是不是劳动党员？怎么来这里当医生？

他笑了，说：“我是人民军军医，去年被俘的，我一直在给中国难友们看病。但凡是找我看病的我都要进行考试，如果你说蒋介石好，我就不给你好药！”

他的神情是那么天真。我也不禁笑了，说：“你不怕我去向泰勒上尉告密？”

他摇摇头说：“我看你不像坏蛋，你一说英语我就更可以肯定了。你们志愿军会说英语的只有大学生，而大学生是不会当叛徒的！”

“你的这个推理并不可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同志，你的兄弟！”

他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是劳动党员，你是共产党员吧！”

我轻轻地地点了点头，我们拥抱得更紧了！看到旁边的病人奇怪地看我们，他冷静下来，放开我仔细地为我诊断了病情，给了药，又用英语跟我约定晚饭后在医务室见面，有要事相商。

晚饭后，我走进医务室，只有他单独在那里等我，桌上还摆着打开了的水果罐头。

他一见我又赶上前和我热烈拥抱，把我按到他自己坐的椅子上，把罐头移到我前面用英语说：“我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我的好朋友，请吃吧！”

“你要先告诉我这罐头怎么来的？”我笑着说。

“这是这里管后勤的美军少尉送给我的。为了酬谢我常给他开些贵重药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赚钱。我这是帮助敌人去偷敌人的物资，多有意思！”他低声地说完爽朗地笑了。

“医生同志，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呢！”

“哦，我叫崔成哲，毕业于平壤医科大学，中尉军医，今年 29 岁。你呢？”于是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他告诉我说：“这个集中营里有志愿军的叛徒，已经把握了 G - 2 特号的大权，正在帮助美第八军情报部拷打被审讯的难友。他们把伙房也掌握了，贪污大家本来很差的伙食。我真急死了！我看志愿军战友们太老实，叛徒们太坏！你要主动去争取泰勒上尉的信任，把这个集中营的大队部抓住。否则就太晚了！”

他抓住我的手使劲摇着说了他的上述建议，我也使劲地点了点头。

争权

当晚，我躺在炕上反复考虑崔成哲的建议：看来美军并不了解战俘内部状况，语言又不通，只得任用战俘来管理战俘，谁当上了大队长谁就掌握了这个集中营的内部控制权。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位连、营干部来当大队长，我来当大队翻译协助他掌权，但目前我熟悉的连、营干部这里一个也没有。我必须自己去当这个“俘虏官”了。只是，难友们会怎么看我呢？会不会把我当成敌人的走狗呢？我最好等见到团里的首长请示之后再行动。可空等下去会不会丧失时机呢？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立即去争当大队长。

第二天，我转到位于营门口的泰勒上尉的办公室。泰勒看起来有 50 来岁，不像军人倒像个和善的老头。我尽量自然地用英语对泰勒说：“哈罗，

您好！泰勒上尉。我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以减轻您的辛劳！”

体格健壮、脸色红润的泰勒抬起头来，像看见了什么怪物一样惊住了。然后摊开双手说：“怎么搞的，你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位英语说得这么好的战俘！”

“我一直在卡片登记科为您效劳，现在工作量很少了，以致我想我快要失业了。另外，我还希望最好能说说英语，以免错过一个能增强我的口语能力的机会！”

“等一等，你先坐下来告诉我你的名字，你是怎么学会英语的？你是不是在美国生活过？”泰勒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我又把曾对布鲁克斯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他把上身往后一靠说：“哦，哦，你想有一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你肯定会有，只要在我手下！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翻译官了！不，等一等，对了，现在这一批战俘过几天就要送往对面战俘营在那里等待去巨济岛。你立即为我建立一个新的大队部，你来当大队长。”

我故作为难状说：“大队长！我担心我干不下来。我从来只执行军官们的命令，还没有指挥过别人呢！”

泰勒不屑地一摆手说：“有我呢，谁要敢不服从你，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那我就试试看吧，如果不行，还是只当你的翻译算了！”

我谦虚地说。

“不，你一定行！”

“我尽力而为吧！”于是，我戴上了大队长的袖标，真的当上了这第 10 收容所内最大的“俘虏官”。

当天，我就找了方向前担任我的大队文书，并请他替我物色了管理员、卫生员、翻译员等等，组成了大队部。在第一次大队部会议上，我宣布了“根据泰勒上尉指示”必须遵守的两条规定：

(1) 不得打架骂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要讲同胞兄弟的团结互助。

(2) 不得搞贪污，搞特殊，要和大家同甘共苦。

随后，我又请管总务的美军少尉布朗领我前去“视察”伙房、清扫队。我请少尉做指示，少尉强调了饭要做好，卫生要搞好。我在翻译时则趁机补充了上述两条规定，并明确说违反规定者将立即解除工作，送往巨济岛去。

在用这种策略建立了我的权威之后，就等于建立起了一个核心。这要求我首先深入了解我周围难友们的政治态度，精神面貌，但又不能暴露自己。该怎么做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好主意。

方向前为我挑选的通讯员小刘，卫生员小夏，管理员小李都是四川小鬼，只有原来就在清扫队担任翻译的曹友是湖北人，是个“老”战俘。

据方向前介绍，曹友脑子受过伤，有些疯疯癫癫的，这首先引起了我的警惕。于是每天晚饭后我开始给几个小鬼讲故事，从《安徒生童话》到《一千零一夜》，我观察他的反应；后来又教他们唱民歌，唱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插曲。

一天，我已睡下了，曹友拿着军毯挨到我身边躺下，轻声地要我再唱歌剧《刘胡兰》《白毛女》插曲。我轻声地唱了几首，忽然听到他低低的抽泣声，便问他怎么了？

他沉默了好久说：“你唱得太好了，这些歌使我想起在祖国的自由幸福

的生活，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问他是怎么被俘的？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作为侦察员深入敌后抓“舌头”被敌人发现后，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头部受重伤被俘的详细经过。

“多么好的同志！”我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于是我详细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必须与叛徒斗争、团结教育难友、坚持革命气节的任务以及秘密建立爱国主义小组形成斗争核心的措施。他听了非常兴奋，说：“你消除了我心里的苦闷。我就跟着你干了，给我分配任务吧！”我布置他继续装疯卖傻掩护自己，以便接近“G-2”特号里的叛徒们，了解他们的活动内幕，为我们下一步与他们开展斗争提供情报。

用同样的办法，我分别和大队部的几个小鬼谈了心，发展他们为爱国主义小组成员。

掩护政委

一天曹友带领清扫队到“G-2”特号掏粪，忽然跑下来把我单独拉到一个空帐篷里，说：“你们师有位叫王芳的团政委正在‘G-2’受审讯，叛徒们奉美军情报官员的指使正在残酷地折磨他，想迫使他说出军事机密。我们要赶快想办法救他！”

我想了想，便在香烟盒上写了两句话：“您已得了痢疾！赶快要求到医务室看病！”

明天上午我等您，您的战士。”要曹友想办法把字条偷偷塞进单独拘禁政委的帐篷里去。

曹友回到“G-2”特号后，和叛徒们嘻嘻哈哈闹着要去看看共产党的大官。叛徒们就陪他进去了。他看见团政委蓬头垢面，裹着床破毯子，佝偻脊背，闭着眼坐在草垫上，便说：“这哪里像个团政委！恐怕是个炊事班长吧！”叛徒们哄笑起来，出门时他走在最后，把字条从背后扔在帐篷里。

“是哪个团的政委呢？不会是我们团的赵政委改了名字吧？”

第二天，我站在医务室外等着“王芳”团政委下来看病，心里总是想着这个问题。

早上九点钟左右，我看见两个狗腿子押着一个行动艰难的老头儿走下来了，那样子有点像赵政委，可又不太像，等走到跟前再仔细一看，原来真是我们团的赵政委！

狗腿子们先向我点头哈腰地打招呼：“大队长，您在这儿看病哪？”

“这是谁？还麻烦你们送来看病！”

一个狗腿子说：“嘿，是条大鱼！”

“什么病？”

“他今天一早就喊肚子痛，尽往厕所跑，看来是吃多了，哈哈！”

“好吧，你们在外面歇会儿，我带他进去看看是真病还是假病！”说完扔给他们一人一支泰勒上尉送给我的“金骆驼”牌美国香烟。

我把赵政委引进了医务室，又领进用白布帘隔开的检查间。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转过身来紧紧地用双手握住了赵政委的手，看着他变得十分苍老衰弱的脸，我心里说：“我的政委，你受苦了！”在敌人集中营内重逢的痛苦和对我的团党委书记的担心与思念，使我不禁流下泪来。政委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们好一阵相对无言。我擦干泪低声说：“政委，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先送您到伤病战俘集中营去养伤治病，我会去看您的。”于是我把他引到

崔成哲医生桌前。

崔大夫见我领了“病人”来便会意地点点头，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然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在诊断书上写了“病毒性痢疾”的诊断。在他报告了泰勒上尉之后，特别害怕传染病的泰勒立即摇电话要救护车把赵政委送进了伤病战俘集中营。在那里，中朝难友们经过共同艰苦斗争，已经迫使坏蛋们请求“病愈出院”，从而掌握了营内管理权。

赵政委总算暂时摆脱了叛徒们的控制与迫害。

过了几天，我带着掏粪队来到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见到了赵政委。这时，他已经理了发，换上了病号服，显得精神多了。

在他的行军床前，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被俘经过和被俘后两个月来的情况。最后，我拿出由我起草，方向前、曹友等同志共同研究的爱国主义小组的章程向他请示。

政委看了很高兴。他深沉地看着我说：“敌人可以俘虏我们的肉体，却夺不走我们的革命精神，我相信咱们部队的大多数战士和绝大多数党员不会叛变。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主动积极地跟敌人斗，和叛徒斗，我的信心更足了。你们就坚决地干吧！我支持你们！”然后就一些具体斗争策略给我做了详尽的指示和建议。

我是多么激动呵！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依靠。以后，我就经常自己带队去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掏粪了。

使我十分高兴的是我在第三收容所还碰到了闹胃病住院的姜瑞溥，我的第一个爱国主义小组成员，刚两个来月没见他，他似乎一下变成大人了。他告诉我他在第三收容所已经发展了两名小组成员，告诉我在各个伤病战俘收容所里，中国战俘表现都不错，特别是我们师的连级干部李喜尔和韩子建挖地道出去和游击队联系，被鬼子抓回来毒打都没有屈服。我听了很高兴，要他好好向这些党员干部学习，并告诉他我的团政委已来到这个收容所。随后，我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政委，请政委直接领导他斗争。

女难友

七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午休，泰勒到大队部帐篷里来喊我：“快起来，张，你们的一个女兵送来了，赶快去替她登记卡片。”我一翻身爬起来急忙跟他走出去。走到半路，他又停下来：“等一等，你去叫布朗少尉，从我的日供应餐里给你一个罐头带来，你该好好招待一下你的女同胞哩！”于是我跑到布朗住的办公室拿了一筒罐头就向泰勒的办公室赶去。

一进门果然靠桌子站着个姑娘，顶多有十六七岁，尽管穿着一身志愿军的男军装，也没有长发露在军帽的外面，却掩盖不住她少女的窈窕身姿。这又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

我难以想象单独一个女同志怎么度过战俘营里艰难而又阴暗的日子！

我把土豆牛肉罐头打开，泰勒又亲自冲了杯炼乳放进一块方糖，一齐送到她跟前。

我亲切他说：“你先坐下吃点东西吧！”她看看我，坐下来急切地吞食。等她吃完，我一边问她一边替她填写战俘登记卡。原来她叫小丫，16岁，四川人，是我师卫生队的护士。我问她怎么刚被俘？她告诉我她病了，没跟上突围队伍，5月底就躺在担架上被俘了。

好在她头发已剪得很短，又穿着男军装，敌人没看出她是女孩子，在前方医院里病好后就女扮男装帮助照看伤病战俘两个月。后来还是被敌人发

现是女的，就被送来了。

“和你一起被俘的还有其它女同志没有？”

“当时和我一起的还有三个女护士，敌人一来都冲散了，不知她们是不是也被抓住了？是不是都送来了？”我告诉她到现在为止只来了她一个。她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我赶快说：“别哭，别哭，别让美国鬼子笑话！你并不孤单，我们大家都会关心你的！”

这时泰勒嚷了起来：“你怎么使她伤心了！告诉她，战争一结束她就可回到她妈妈身边了！现在你带她到女战俘营去吧！”于是叫了一个卫兵押送我们两个去女战俘营。

路上，我把泰勒说的话告诉了她。她低下头说：“我从小就没妈妈了，我是跟婆婆（祖母）长大的！”呵！还是孤女！我轻声告诉她：“朝鲜女同志们都很好，会待你像亲妹妹一样！你要好好向朝鲜大姐们学习，学会说朝鲜话，唱朝鲜歌，学习她们的斗争精神。等到和谈签字了就可交换回国了，再苦你也要坚持下去！”她听话地点点头，又抬起泪眼对我说：“你可要常来看我啊！”我肯定地点点头。

我们到了女战俘营，一下就被朝鲜女难友们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地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她。一位戴着“大队长”袖章的女同志挤了进来，原来就是那位指挥女声合唱的同志。她痛惜地抱着小丫，说：“小妹妹受苦了！你就跟着我吧！”说完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大队长，你放心。我是延边朝鲜族的中国人，原在解放军四野部队当文工团员，去年才调回朝鲜到人民军参加战斗，我会照顾她的！”

我说：“那就拜托你了！大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朴贞玉。”

于是我对小丫说：“我该回去了，你就好好跟朴大姐在一起吧！”

小丫又无声地哭了起来，我用袖子替她擦擦泪水，说了声：“我一定会常来看你的！”就离开女战俘营和押送我的美军一起回去了。

我不敢回头看她那孤苦无告的表情，但愿她在朝鲜大姐们的帮助下很快坚强起来！

这以后，我又给自己增加了亲自带队去女战俘营掏粪的任务。

一次，我刚带队进到女战俘营，朴贞玉就跑上来面带喜悦地告诉我：“小丫表现可好了。前天我们为纪念‘八·一五’光复纪念日，唱了《金日成将军之歌》。美国鬼子用毒气弹镇压我们，昨天我们绝食抗议。美国兵进来把大家都赶到大太阳底下强迫我们吃饭，我们坐在那里，面对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动不动。后来小丫忽然站起来进了帐篷，我们都吃了一惊。那个美军女少尉特别高兴，盛了饭菜给她送去。哪知小丫一巴掌把饭打掉在地上，大声喊：‘你们凭啥子让我们晒太阳！’气得女鬼子打了她一耳光，小丫捂着脸瞪着鬼子，倒把那个鬼子吓得退了一步，悻悻地走了。小丫真是好样的！”

已来到我身边的小丫听着，害羞地笑了。我真愿看到她那难得的笑容。我说：“小丫，你给咱中国人争了口气哩！”她更不好意思了。

准备转移阵地——到巨济岛战俘营去

1951年9月中旬，我所在的第10号集中营里陆续从前方送来的战俘已近500名。泰勒告诉我，他打算把他们作为一批送到巨济岛去，又说：“在巨济岛上第72号和86号两个中国战俘营已集中了将近两万名志愿军战俘了。岛上朝鲜人民军战俘闹事，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为此很生气，还是你们

中国战俘好，不爱闹事。现在板门店和平谈判已经由于战俘是否自由选择回国志愿的问题搁浅了！你们中国战俘有不少人表示愿意去台湾呢！

你自己怎么打算？”最后，他提出了问题。

“我的未婚妻在国内等我回去，我怎么能去台湾呢！”我认真地回答。泰勒笑笑，拍拍我的肩头走了。

第二天我立即带掏粪队去见赵政委，把泰勒说的情况汇报给他。我提出自己应该尽快到巨济岛去投入更大的斗争的想法。赵政委沉吟良久，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告诉我一定要争取到第 86 号战俘营去，他说：“第 72 集中营是个老战俘营，已经被叛徒们掌握了。

第 86 战俘营还没有被叛徒完全控制，你去后和咱们师的宣教干事金甫（原名张城垣）同志联系，告诉他：我让你去和他共同领导‘86’的地下组织，展开夺权斗争。”

我回到 10 号战俘营后，立即向泰勒请求送我到巨济岛去。

“什么？你要去巨济岛？你不知道岛上要比这里苦得多么？我都不愿去呢！”他吃惊地问我。我只好撒谎说我还有个弟弟也被俘了，我想到岛上去和他一起，好照顾他。

泰勒很惋惜地同意了。

于是我给方向前、曹友布置了留在釜山继续斗争的任务。

当晚，我去和崔成哲拥抱告别。他还提出如果在岛上遇见一位名叫孙振冠的教导员，一定要替他问候，说那是他遇见的最值得敬重的中国兄弟。

第二天，我又去伤病战俘收容所向赵政委和姜瑞溥告别，请姜如有可能设法照顾一下小丫姑娘。

最后，我到女战俘营和小丫告别，鼓励她坚强地和朝鲜大姐们一起坚持斗争，说我将设法托人带信给她。小丫哭了。我请朴贞玉尽量照顾和帮助她，朴贞玉也含泪和我握别。

1951 年 9 月 13 日，我和近 500 名难友被押送往巨济岛。我们先坐汽车到达釜山港口。

海港里军舰林立，码头上紧张繁忙，巨型塔吊正卸运军火，坦克和机械化步兵从登陆艇那张开的巨口中吐出来开上码头。

我从中看到美国的战争机器正在高速运转，并深深感到这一仗打败我们的并不是美军的精神、气质，而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实力。“如果以我们的苦难和牺牲能够换来祖国早日繁荣富强，也就心甘情愿了！”我望着翻腾的大海，痛苦地思索着。

敌人把我们押上一艘大登陆舰艇，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我挤坐在透气用的弦窗附近，在轰鸣的轮机声中，回顾被俘后两个多月的经历，觉得自己的斗争成效甚微，甚至还没有真正和叛徒们正面交锋。所幸方向已经明确，环境有所了解，并找到了组织领导。我正想着心事，忽然听见一个难友喊了声：“快到了！”我站起来从弦窗中望去，看见矗立在茫茫大海中的巨济岛那黑沉沉的锯齿形轮廓。船离海岛越来越近了，汹涌的海浪怒吼着冲上岸，撞击着岸边陡峭磷岫的岩壁，溅起了狂暴的浪花。

我不禁心潮澎湃：啊，你这从古代高丽王朝起就用来流放囚犯的死亡之岛，今天竟又囚禁了两万名中华儿女！怒海狂涛似乎预示着一场严酷斗争将在这座孤岛上掀起！

第七章 在巨济岛掀起大规模斗争

孤岛印象

押送我们的登陆艇一抵达巨济岛港口码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岛上的气氛要比釜山紧张严厉得多！

好几艘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美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巡逻艇向我们停靠的地点围过来。码头上还有手持卡宾枪的岗哨排列在我们上岸的地点附近。

在不远的地方有不少战俘在被吆喝着搬运那堆积如山的粮袋和美军用的装备物资。

他们那在烈日暴晒下不堪负重摇摇晃晃的身姿，向我们无言地控诉着岛上严酷而沉重的集中营生活！

美军押着我们这近 500 名战俘沿着伸向海岛腹地的公路走去。越过一个小山口，一座密密麻麻的帐篷城展现在我眼前。它们散布在前方那狭长的盆地之中，其规模之大，戒备之森严远远超过釜山的集中营！

当时我还不知道：一年前美军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半岛的蜂腰后，曾俘获了朝鲜人民军十多人；也不知道志愿军在入朝以后也竟有两万多人被俘。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我：这么多中朝儿女身陷囹圄，这场战争远比我亲身体会到的更为酷烈啊！

我们这个步履沉重的长长行列默默走过一座座集中营。每个集中营大门口都挂有该集中营的编号牌，从第 60 号开始往上排列。

时逢正午，烈日当空，除了集中营四周的游动岗哨外，几乎见不到人影。像长城上的烽火台般排列着的岗楼，高耸在“帐篷城”的四周，加重了地狱的气氛。

忽然迎面走来了一队抬着大铁筒的战俘队伍，全都穿着红色短袖衫和短裤，上面印有又黑又粗的 P.W. 字样。那身腥红衣服的颜色在黑色铁丝网和绿色帐篷的背景上极其刺眼，加上他们那蓬头垢面、干瘦黝黑的模样，使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演马戏的猴子。

在我们两支队伍擦身而过时，他们身上的汗臭味混合着粪桶里的臭味冲我们扑来。

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押送这些“苦力”的，除带枪的美军外，还有手提棍棒、身着同样囚服的战俘！这些工头儿们竟用中国话吆喝着：“他妈的，别磨蹭，给我快点走。”

那些“老战俘”汗流浃背，艰难地移动着脚步。当他们抬头看见我们这些“新战俘”时，那充满悲愤的目光，那欲言又止的表情，使我深受震动。他们的心在滴着血哪！

显然，这些苦力就是 72 集中营的难友了，而“72”已经被叛徒们牢牢控制了。

我们会不会被押送到“72”去呢？万一我们被送到那里去该如何开展斗争呢？我用什么办法联络那里的自己人呢？路上我紧张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不觉来到了“72”集中营大门口。前面的队伍并未停下来，看来我们不会被

送进“72”了。

我松了一口气，一面走，一面朝这个集中营里观察。在它的大门口内有一块影壁，前面立着一个不大的白色塑像。仔细一看，原来是自由女神像，只是塑得太拙劣了，女神那暗淡无光的表情，似乎在哀叹着自己也被关进了牢笼的可悲命运！我怀着对叛徒们的厌恶走过了72集中营。

一路上，那个自由女神的影子，老在我脑子里徘徊。我想：那个站在纽约海边的高大庄严的自由女神如果看见她自己的国家正在剥夺别人的自由时会作何感想呢？

86 集中营

前面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第86号中国战俘集中营。我们被押进大门，列队坐在广场上听候清点人数，核对战俘卡片。

这个集中营建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背后山坡上有几株没烧死的小树。小树的上方是蓝天和自由自在地飘游着的白云。小树下方是高达丈余的三层铁丝网和在两个拐角上高耸的岗楼，岗楼上重型机枪的枪口俯视着整个战俘营。营内中心广场两侧各有三个帐篷群，看来本集中营里有六个大队，在右侧帐篷群背后，有一排正在冒炊烟的铁房是伙房。在左侧帐篷群后面也有一座铁皮房子，门上有“C.I.E.”的牌匾，这是所谓的平民教育学校，“教师”是美军派来的随军牧师，也有聘请来的和尚、道士等。在大门口的两侧各有一个帐篷，右边是医务室，左边是联队部。

正当我仔细观察这个新的环境时，忽然，听见有人操着东北口音喊：“730030号张泽石，请到联队部来。”喊我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长着络腮胡子，穿戴整洁的“俘虏官”。

他把我带进联队部，负责押送我们的美军少尉对另一位美军上尉说：“这就是张。”又对我说：“本集中营总管史密斯上尉根据他的朋友泰勒上尉对你的介绍，希望你能协助他的工作。”

我转向史密斯上尉，用英语说：“上尉阁下，我很高兴能为您效劳！”史密斯微笑着说：“你来担任我的翻译官好吗？”

史密斯的个子超过一米八，年近50岁，金发碧眼，看样子他也是个职业军人。我微笑着点头同意。

史密斯把在屋里的联队部的同事介绍给了我。刚才喊我的是联队书记长郭乃坚。联队长叫应向云，联队副叫王福田。联队部有两个翻译，一个叫高化龙，另一个叫安定元。

还另有一个叫杨永成的小鬼担任通信员。他们都友好地向我点头致意。

我总算实现了第一步计划：利用我的外语能力，占据一个有利于斗争的位置。就这样我的集中营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接上关系

两天以后，我利用翻译官的地位，很快在第六大队找到了赵政委要我联系的师宣教干事金甫同志。他以战士身份隐蔽在一个小队里，个子本来就小，又穿得破破烂烂。很不容易为人所注意。

在一个帐篷角落里，我把赵政委的指示传达给他。他很高兴，立即向我详细介绍了86集中营内的斗争形势：

这个联队共有8000左右难友，分成了6个大队。其中，第一、四、五大队的大队长分别为王刚、戴玉书和岳天洪，他们都是坚决要求回国的老同志，因而这三个大队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另外三个大队的领导

权则大部分在叛徒手里。叛徒们还掌握了“P.G.队”，即联队警备队和“CIE”学校。好在伙房和医务室全在我们手中。联队部目前处于中立状态。一个月前美军管理当局曾把72集中营的联队副、在东京受过训的大叛徒李大安调来当86的联队长。我们动员了以戴玉书为首的“弟兄会”的力量将他狠狠揍了一顿，吓得他自己要求调回了“72”。现在联队部的工作人员公开表示“严守中立”，不介入营内的两派斗争。

谈到这里，他高兴地说：“你来了，太好了！你就首先争取联队部工作人员向我们靠拢，成为‘自己人’，这对咱们开展斗争十分重要！”

我表示一定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我又问了目前营内咱们的地下组织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尚无统一的地下斗争组织，有一些自发的地下党团支部，因时间短，还未全部联系上。

“目前我们采取了地下和公开相结合，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比如四大队的曹明、时占魁他们组织了秘密的党支部，又把戴玉书的‘弟兄会’争取了过来。‘弟兄会’则用‘反虐待争温饱’的口号，团结了上百名坚持回国的难友。叛徒们对这种类似于袍哥和青红帮的组织，一时还未弄清它的政治面目。叛徒们也在发展‘反共抗俄同盟’，自以为可以向其主子表示效忠，但完全自愿又敢于公开参加的人并不多。当前集中营内双方尚未分胜负，一些动摇分子尚在观望之中。”

金甫最后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正好抓紧时机发展斗争力量，咱们要争取把集中营内的控制权从叛徒手中完全夺过来。”

听了这些情况，我十分激动，为即将来临的这场斗争而跃跃欲试。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所面临的这场斗争的严酷性。

掌握联队部

我开始了争取联队部成员的工作。

我们联队部成员单独居住一个帐篷，比一般战俘住得宽敞多了，半个帐篷作为库房，堆了些旧军毯、旧军服、牙刷、肥皂、手巾和没有牌子的香烟等杂物，半个帐篷住我们六、七个人，垫的、盖的都比一般战俘厚些。

我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两个翻译和书记长身上，努力观察他们。好些天我难于从那一本正经的终日只谈具体事务绝对不谈“国事”的外表下，看出他们真实的内心活动。看来，他们对我也怀着戒心，不知我是干什么的，我只好主动出击。

于是，当早晚大家都在帐篷内休息的时候，我故意不经心地哼几句歌曲的旋律，如：《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走，跟着毛泽东走》等等在部队流行的歌曲，好看看大家的反应。但既没有人来应和，更没有人偷偷来请我唱下去。显然，这里的环境要比釜山十一收容所复杂和严峻得多。

用老办法不行了，我只好找机会个别交谈。我本想既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又要摸清对方的真实想法，可谈了两个都碰了钉子。我有些着急了，一天晚上熄灯后，我抱着毯子躺在高翻译身边，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老高，关于停战谈判的事你听说了吧！”

“史密斯上尉跟我说过。”老高说。

“但愿早日谈判成功，这场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你说呢？”我试探着说。

“打不打下去，对我是无所谓了！”老高漫不经心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不，早一天停战，咱们就可以早一天恢复自由。你还想老在这里受罪呀？”

“谁知今后会怎么样？我是过一天算一天。”

“不，老高，你说的不是真心话。”

老高沉默不语。

“老高，你看不出咱们联队现在的情况么？搞不好，就快变成‘72’那样了！”

仍然没有回答。

我见他还是不吭气，便把头靠过去低声说：“老高，我看得出来，你是有骨气的，咱们总不能让那些认贼作父的坏蛋胡作非为吧！”

“老张，在部队我就是个普通群众，现在我也不想参加政治斗争，有碗饱饭吃就知足了。”

“老高，跟我们一起干吧！咱们要不抱成团，叛徒们就要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了。”

“我，我胆子小，哪边都不参加。”

“啊！”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不料，老高又补充一句：

“老张，你放心，我也决不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好吧！”我叹了口气，“希望你再想想。”

这次谈话使我很恼火，心想：“怪不得总说知识分子有软弱性、动摇性，尽是些胆小鬼。”我找机会把情况向金甫同志谈了，他却笑着说：“大家还信不过咱们，能够表态说决不做对不起咱们的事，也就不错了。别着急，咱们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半年以后我才弄清楚老高的真面目：其实他这时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地下活动，但对我一来就当翻译甚为怀疑，很不放心我。

鸿门宴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CIE 学校的通信员到联队部来找我，说：“美军伍牧师来了。”

我们校长请张翻译官去帮助翻译一下。”我随他进了学校的办公室。我来“86”后，还从未到这个“学校”来过，心想趁机了解一下也好。我环视一下“办公室”，没见到任何一件教学用品，只见屋子正中摆了张方桌，桌子上摆满了集中营里罕见的罐头食品听装啤酒，桌子周围坐了好几个人。

傻大黑粗的大麻子程立人校长站起来说：“张翻译官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别的人也站起来说：“张翻译官请坐，请坐。”

我平时极少和这些人来往，只知道程大麻子是个“铁杆汉奸”。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心里有些怀疑，嘴上却说，“不敢当，是伍牧师要找我吗？”“伍牧师今天没来，是我们兄弟想请张翻译官来叙叙家常。您请坐，随便吃点，随便聊聊！”程大麻子干笑了一下，边说边把那些绿色军用罐头移到我面前。我在他对面慢慢坐了下来，努力用微笑来掩盖心里的紧张，平静地说：“我从釜山来的时间不长，整天跟着史密斯上尉瞎忙，没有早点来看望你们，抱歉，抱歉！”

其他人七嘴八舌地抢着说：

“张翻译官，太客气了。”

“您不比我们这些小兵整天吃完了没事干。”“我们早想请您来见见面了！”“大家都是落难之人，您不必客气！”

“今后还请张翻译官多帮帮我们弟兄的忙！”

程大麻子把手一摆，大家停了下来。他端起打开盖的听装啤酒站起来说：“张翻译官，我们早就听说您的才干深受美国人赏识，您要是瞧得起我们，今天就同咱们弟兄喝杯团圆酒。今后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您请！”

这时我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我也端起啤酒站起来说：“程校长过奖了，我只不过会说两句洋文，借此混碗饭吃罢了。今后还要你们多指教哩！”说完，我喝了一口酒坐下来。

程大麻子坐下来想了想说：“张翻译官，您才来‘86’不久，可能还不大清楚这里的情况。咱们战俘营虽说进来的都是战士，可混进了不少当官的，还有好些共产党分子，这些人暗中串联，还想抓权来压制我们。咱们这些当兵的，出身不好的，上过学的，以前在部队尽受他妈的排斥、压制，好不容易解放出来，决不能让那些当官的再骑在咱们头上！您在联队部，又受到史密斯上尉重用，您得站到咱们这边来。今天请您来，是想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组织。”

我把啤酒罐拿在手里转了转，含笑问：“你们的组织叫什么？”

程立人说：“这个，您若是答应参加，我自然会告诉您！”

我把身子往后靠了靠说：“咱们都是为联合国军效劳，参不参加组织只是个形式问题。再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早就宣布过禁止在战俘营内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让史密斯上尉知道我参加了什么组织反而不好。您说呢？”

这位校长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张翻译官，您既然这么说，我也不勉强您。不过，今天您既然来了，我们还是想听您一句准话，究竟是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仰仗您在史密斯上尉跟前替我们说话？”

好家伙，这是逼着我表态了。我该怎么应付这群走狗呢？我也盯着他紧张地思考着。

忽见他摆了下头，立即从外面进来了几个手提警棍的大个子 PG 队员，围在我身后。

我感到心跳加剧，血往头上涌。

“决不能让他们看出我心慌！”我告诫着自己，“奴才最害怕的是他的主子。”

于是，我把啤酒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程校长，您不会认为美军是无缘无故地重用我吧！我的情况。您可以去问史密斯上尉，或者向第八军情报部调查更好！不过，今天承蒙您盛情款待，我也请大家放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心里很清楚！”说完，我很自然地环视了一圈。

一时他们都愣着说不出话来。然后，由程大麻子带头鼓起掌来。

程翘起大拇指说：“张翻译官，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来，来，喝酒，喝酒，吃菜，吃菜！”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完说：“对不起！我得回联队部了，免得史密斯上尉有事找不着我！”

“好，好，招待不周，张翻译官，多多包涵。”程说完话，指挥这群奴才恭恭敬敬地送我出门。

我走出“学校”大门，迎着清凉的海风，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夺旗之战

随着美方在板门店和平谈判中提出所谓“根据战俘志愿进行遣返”的无理建议，造成停战谈判的僵持之后，战俘集中营内双方的斗争也急剧尖锐起来。叛徒们一方面极力发展反共抗俄同盟等反动组织，一方面利用其控制

的联队警备队的执法权利，在集中营内不断制造事端，向我们控制的几个大队挑衅，殴打我们的人，制造白色恐怖。

我把从美军《星条报》上看到的有关和谈的消息告诉了金甫。我们决定开展以反背叛、争取回归祖国为宗旨的斗争，在群众中大力进行秘密宣传和发展地下斗争组织，并把分散的、自发的地下党、团和爱国组织逐步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

我所在的军被俘的人最多，其中相当多的新战士是四川人，不少还是从成都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 95 军合编过来的，在旧军队中多半参加过袍哥组织。这些新战士虽然接受我党、我军教育的时间很短，但大都有爱国心，讲义气，被俘后也不像有些党员、干部那样，因怕暴露身份而顾虑重重。他们对叛徒们克扣粮食、副食，故意派不顺从他们的人干重活、脏活和随意打骂人的做法也敢于反抗。他们中有的人在反虐待、反迫害的斗争中自发地团结在一起，成立了类似袍哥的“弟兄会”组织。我们一些地下党团组织则因势利导地积极争取弟兄会组织投入反叛徒控制和反背叛祖国的斗争。

为了对抗联队警备队的挑衅，在我们所控制的几个大队都由弟兄会成员来组成自己的“大队警备队”，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样一来，集中营的气氛更为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1951 年 10 月 9 日下午，金甫叫人找到一大队去开会，我去后见到了一大队的时占魁、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卫生员钟俊华等我已经比较熟悉的地下组织负责人，还见到十来个不大熟悉的同志，其中有四大队警备队长陈昆、五大队警备队长陈其武等同志。

金甫主持会议说：“因为形势紧迫，只好把各大队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都找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先请李志虹同志介绍情况。”

小李是我们秘密打入联队警备队的自己人。他报告了如下情况：

当天中午，他们警备队长周演达召集了紧急会议。这个刚从东京受训回来的队长在会上先拿出一个包袱，让大家猜包里是什么东西。大伙猜不出，他就打开包袱，抖出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狗腿子们不禁惊呼起来。周演达立即摆手说：“轻点，别让共党分子听见了！”然后又得意地告诉队员们：“这面旗子是伍牧师送来的，要我们警备队明天早上在大门口把旗子挂出来，庆祝双十节（即国民党政府所定国庆节），好让美国随军记者来拍照。这个照片登出来全世界都将知道中国战俘不愿回大陆，这就会让在板门店谈判的共党代表下不来台！咱们警备队也就立了个大功。”周演达还说：“估计共党分子要捣乱，大家要严密监视他们，对为首分子要来个突然搜捕，先抓起来再说。

伍牧师已跟宪兵司令部打了招呼，必要时，美军协助我们行动！”

听了小李揭露敌人这一卑鄙阴谋，大家都十分气愤，大骂这些狗腿子卖国求荣。

金甫站起来请大家安静下来，说：“时间紧迫，我们集中研究一下怎样粉碎敌人的阴谋吧！”

只见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同志，这位智勇双全的老侦察员，操着一口山西口音，不紧不慢地讲出了他的主张：“对付疯狗的最好办法就是拿棍子揍他！我建议把咱们各大队的力量紧急动员起来。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围攻警备队，烧掉狗牙旗！”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又补充了一些怎样分工，怎样加强战斗力的想法。

还提出了可以让小李力争先把狗牙旗偷出来烧掉更保险些的建议。金甫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作了详细部署。其中包括他本人将立即通过医务室的朝鲜医生转到 64 野战医院去暂时回避一下可能出现的敌人的大搜捕。

最后，他说：“在我返回之前，张泽石同志将代替我负责集中营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现在，请张翻译官讲话，”

我激动地站起来，看了看我的这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又坚贞不屈的战友们说：“同志们，这次斗争关系到咱们的前途、命运，更关系到祖国和党的荣誉。我们决不能让美国鬼子的这个政治阴谋得逞，也决不能任凭咱们部队中这些民族败类肆意歪曲我们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形象！即使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希望大家下去立即动员咱们的爱国力量。今晚一定要把那面狗牙旗烧掉，力争把叛徒们都抓起来。我将向史密斯上尉控告这些坏蛋一贯为非作恶，激起众怒，请他将这些肇事分子调离‘86’，以保证我们联队的安全。”

大家点头称是，立即回到各自大队，分头准备去了。

我回到联队部，史密斯正在神色不安地看一个文件。见我去了，立即把文件递给我。

只见那份英文打印件上写着：“致第 86 集中营总管史密斯上尉：据悉您营内的中共分子将于今晚举行暴动，我已命令海军陆战队做好一切防范准备，请通知全营战俘今晚将实行戒严：当发出第一声警报时所有在帐篷外的人必须就地立正，第二声警报后必须立即回到帐篷中去，否则格杀勿论。”在文件上署名的是联合国军巨济岛战俘营司令官菲茨泽拉尔特上校。

史密斯接着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耸耸肩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暴动的迹象都没见到，我甚至怀疑那些共产党人真会如此幼稚，不想即使拼命翻出了铁丝网，也不可能游过几千哩到达中国海岸。”

“不管它究竟怎么回事了，你马上把菲茨泽拉尔特的命令传达下去吧！”

就在我请通信员通知各大队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前来听取命令时，营外公路上传来隆隆的发动机声，几辆满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装甲车开了过来。士兵们拿着铁锹下了车，在铁丝网周围以大约 20 米的间距散开，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挖开了机枪掩体。

我心中暗暗叫苦：“敌人已经为在‘86’升国民党旗做了周密的布置，今晚的夺旗斗争将是一场流血斗争！”

我在传达了杜德准将的命令后立即到四大队找曹明等同志研究了新的形势，我们决定先叫小李力争把旗子偷出来烧掉，不管成不成都要以四大队为主力。以路灯亮时为信号，突袭团警备队，力争在美军发觉之前解决战斗！

晚饭前，我回到联队部帐篷，正准备开饭，忽然传来一阵喊叫：“抓住他！抓住他！”我刚站起打算出去看个究竟，帐篷门一下被冲开，钻进一个人来。我扶住一看正是小李，忙问怎么回事？他喘着气说：“快！快把我藏起来！他们要抓我！”

我急问：“他们看见你进这个帐篷了没有？”

“没，没，我绕着弯过来的。”

没等他说完，郭乃坚已把他拉往“贮藏室”，将他塞在杂物堆里，拿许多军毯将他盖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刚端起饭盒，五六个带“PG”袖章，拿着

狼牙棒的警备队员进了我们的帐篷，东张西望地找人。

我满脸不高兴地问：“你们这是来查看我们在偷吃什么罐头肉吧！”

一个狗腿子赶快弯腰说：“不敢不敢，我们在抓一个共党分子，像是跑到你们帐篷这边来了！”

“那好办，我们联队部的人都在这里，请搜吧！”我笑一笑说。

狗腿子们伸头往“贮藏室”看了一遍，扫兴地走了。

我让通信员杨永成在外边放哨，进“贮藏室”把满头大汗的小李拉出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已经把狗牙旗偷到手并且已经塞进伙房的灶火里烧掉了，不幸的是正在他烧旗时，被伙房的一个坏蛋发现，告了警备队，这就追着抓他。

“你干得太好了，但这里也不保险，等天黑到四大队去躲起来就安全了。”

我心想：事情闹大了，坏蛋们决不会善罢干休，今晚这一仗将决定“86”的命运。

我们的力量是足够打垮联队警备队的，就看美军当局是否亲自出面支持叛徒们了。我不安地等待着战斗时刻的到来。

太阳终于向西边山背后落下去了，夜幕从大海中翻越山顶漫了过来。

路灯亮了，我钻出联队部帐篷，站在坡上，觉得心跳得厉害，我看见大约有100多位战友从四大队、一大队的帐篷里钻出来，弯着腰，手里拿着帐篷杆子、石头往联队警备队方向聚集。

突然有人高喊：“冲啊！”顿时，巨大的“打死叛徒！”“打倒卖国贼！”的怒吼冲上夜空，惊慌失措的站岗的狗腿子们抱着头后退了。小铁丝网门被冲倒了，战友们冲了进去，扑向狗腿子，有的抱在一起互相撕咬，有的双方撕扭滚在地上，一个人骑上去又被另一个翻下来。捧棍相碰，拳脚相击，一场混战在厮杀声中激烈地进行着。

就在这时，大门外美军警备车上的警报响了，凄厉的声浪盖过了喊杀声，几辆装甲车开进了营门。大约一个连全副武装的美军下了车，一面持枪跑步向武斗地点包围过去，一面高声喊着“STOP！STOP！”（住手！住手！）武斗双方都被迫停了下来。

我看见高大的史密斯上尉在几个美军的陪同下向联队警备队驻地走去。不久，戴有“PG”袖章的警备队员全部出来列队坐在广场上。而我们的人被美军轰回各自的帐篷。

我想：糟了，我们的人一旦被分散，再集中起来就难了，怕要被各个击破。

这时，联队警备队一个中队长跑来喊：“张翻译官，史密斯上尉请您去！”

我随他到达时，史密斯上尉正站在“PG”队员前面，而美军武装人员集合在一旁待命。史密斯对我说：他要对“PG”队员下命令，让我翻译。他接着发布了命令，大意是：“联合国军当局委任你们负责维持战俘营内秩序，你们平时管理不严，以致发生今晚的暴乱。现在我命令你们将主要肇事者给我找出来，宪兵司令部将审讯他们。我调来的美军将在必要时协助你们。”

这样的命令我决不能翻译出来，便说：“史密斯上尉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打架！今后不允许再互相殴斗，不论是谁，打伤人要坐牢，打死人要偿命。”

我刚“翻译”完，狗腿子中就有人喊口号：“共党分子要暴动！”又有

人喊：“张翻译是共党，我们不要他翻译！”

史密斯问我他们喊什么？

我说：“他们表示坚决执行上尉命令，请上尉放心。”史密斯做了个抓人的手势：“那好，现在立即行动！”

警备队长周演达站起来布置说：“别听张翻译的，咱们去把共党暴动分子抓起来再说，一中队去一大队，二中队去四大队！按我给你们名单搜捕。”

史密斯让我陪他去联队部等着押送人去宪兵司令部。史密斯坐下来，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掏出烟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掏出一支扔给我。我却把烟拿在手里忘了划火柴，为自己无法保护战友们而心急如火。

不久我就听见叫喊声和鞭笞声从旁边的小铁丝网里传出来，我从窗中里看见一些“PG”队员已经抓了不少人在那里拷打，广场上还陆续有我们的战友被反剪着手挣扎着在探照灯光下被狗腿子们押送到小铁丝网里。而站在广场上看热闹的美军士兵，有的在吹口哨，有的在喊：“NUMBERFUKINGONE！”（他妈的，顶好！）

从小铁丝网里传来的惨叫声愈来愈高，我终于忍不住对史密斯说：“上尉阁下，这样下去恐怕要打死人。真死了人恐怕会给您，也给联合国军带来麻烦。”

史密斯仔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好吧，我们去看看。”随即走了出去，我跟着他到了小铁丝网前面。

史密斯对站在门口督察的周演达说：“停止惩罚！”我翻译了上尉的命令。周演达看了看我的脸色，扭过头去喊了声：“史密斯总管让留他们一条狗命，弟兄们歇会气吧！”又回过头来，幸灾乐祸地对着我狞笑。我极力忍住了想向这条癞皮狗的小白脸狠狠地挥上一拳的冲动。

大门外传来了宪兵司令部囚车的刹车声，史密斯上尉便让我传令将已经被抓来的约60名“暴乱分子”押上囚车。

当我看见头破血流的战友们被押过我身边走向囚车时，心里痛苦异常。

我对史密斯说：“这些人伤势很重，是否先送医院包扎一下，以表明阁下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史密斯听了笑笑说：“OK，按你的意见办。”便向押送囚车的美军做了交待。

我接着要求说：“那我陪他们去一趟医院替医生做做翻译工作吧！”

史密斯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张，我知道你是同情这些共党分子的。你要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我镇静地向他说了声：“再见！”便随着战友们上了囚车。

坐在不透气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在黑暗中紧握着半躺在身旁的不知名的战友的手，在汽车的颠簸和轰鸣声中心潮翻腾：“我就这样结束了在‘86’的斗争？我完成了赵政委的嘱托么？明天叛徒们没法升狗牙旗了，要是没有美国鬼子进来，我们这一仗肯定能打赢！今后‘86’更加困难了，我们那些还没有暴露的留在‘86’的斗争骨干担子更重了……”

第八章 “刑事罪犯”

成了“刑事罪犯”

1951年10月9日晚，我们被押送到巨济岛64野战医院，美军医生和人民军战俘医生给被打伤的战友做了简单的包扎治疗。除了两位已不能行动的重伤战友被留下观察外，其余的人当天深夜又被押上囚车送到美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里有兵营，有办公用铁皮房子和几个互相隔离的关押犯人的小铁丝网，它们坐落在一处较平坦的山沟里，在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里只有两个帐篷。

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对面约50米远的小铁丝网内走动着一批戴人民军帽子的朝鲜同志。我挥手向他们示意。他们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朝鲜话喊：“你们是中国同志么？怎么也成了‘刑事罪犯’，关到这里来了？”

我能听懂但说不好朝语，只能生涩地回答：“我们打了叛徒！叛徒大大的坏！”

这时戴白盔的值岗宪兵过来大吼：“混蛋，闭上你的嘴！”

我还是喊了句：“金日成将军万岁！”在我进帐篷时听到对面喊了句：“毛泽东万岁！”

早饭前，又一辆囚车停在拘留所前面。我们都拥向铁丝网，押下来的果然都是“86”的战友，有20多人，是昨晚我们被押走后又陆续被抓起来的斗争骨干，其中有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时占魁等领导人。

看见他们也是遍身伤痕，大家又禁不住义愤填膺，特别是他们带来了王少奇同志被叛徒毒打致死的消息，不少人哭出了声。昨天晚上，王少奇烈士第一个冲进团警备队。

打了周演达。他是为了捍卫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上午，一位宪兵进来问：“谁是张翻译？跟我出来！”大家怕我被单独送回“86”，也不愿我离开他们而去。我在战友们担心的目光下跟他走进办公室，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黄皮肤蓝眼睛的美军中尉。他示意我坐下，自我介绍：“我是C.I.D.(美军刑事审讯科)的审查官，负责调查这次流血事件，根据史密斯上尉介绍，你可以为我担任翻译，请你协助我。”

我松了口气问：“您准备如何进行这次调查？”

“让我们先从受伤最重的人开始吧！请领他们逐个地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立即回去和时占魁、曹明商量，决定安排一个顺序，先找表达能力强的同志去，召集大家简单讲了怎样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控诉联队警备队一贯横行霸道，任意打人、抓人，克扣大家的食品，激起众怒。这次流血事件又是他们无故抓人去酷刑拷打引起的；控诉他们这次又打死了王少奇，打伤了我们这么多人。大家要一致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把警备队主要头头送往监狱服刑。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被问到了，做了审讯记录。好在我担任翻译，对有的战友回答得不完全或不妥当的，我翻译时都给予了适当修改补充，但我在态度、用语上完全采取了不偏不倚，就事论事的做法。

审讯结束后。审讯官对我表示了谢意并和我聊起天来。他问了我的家庭和上学情况，对我出身“基督教、高知家庭”，又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很感兴趣，便谈了他自己的情况。

原来他的母亲是美籍日本人，他姓布莱克，也是从大学法律专业学成

后出来当志愿兵的。他本来只希望到母亲的故乡日本看一看，没想到朝战爆发来到了朝鲜。他说很高兴到战俘营来工作，这里比前方安全。

我就势跟他谈了在战俘营内，美方不恰当地任用了一些坏人担任俘虏官，这些入仗势残酷欺压一般战俘，引起反抗，造成战俘营内的动荡不安，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他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但我无能为力。你知道我们的官方政策是要支持那些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俘，而这些人往往很坏。我本人是讨厌那些没有骨头的背叛者的。我只能在确实查出杀人凶犯时，从军法角度提出惩办他们，但最终决定权在我的上司。至于这次流血事件，我将如实上报，你的伙伴们没有责任，要惩办的凶手是那个‘PG’队长。”

“那么，对我们这些人将如何处理？”

“按美军军法，严重肇事者将作为刑事罪犯被拘留一个月，你们可能一个月后再被送回中国战俘营。”

临走，他送给我两盒“金骆驼”香烟、两块巧克力作为酬谢。还说：“你的工作是出色的，公正的，今后不管你到哪个战俘营，只要是我来审讯中国战俘的刑事案件，一定再请你担任我的翻译。”

我对他的信任表示了感谢。回到帐篷，我把烟和糖送给大家分享了。“金骆驼”当然远比集中营发的那种无牌号的朝鲜烟好抽得多，更何况自从拘留到此后，已多日“断炊”了。我们 81 个难友一支一支地轮流抽了好几天，都觉得那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1985 年春天，我作为北京市科协考察团成员到香港访问，偶尔见到美国“骆驼牌”香烟，却怎么品味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让人腾云驾雾的感觉了！）

成立地下党支部

当我从布莱克中尉那里了解到我们这些“刑事罪犯”拘留期满后将被送回“86”，甚至“72”集中营的情况后，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暴露，无论是去“86”或“72”，都只能被叛徒们严格控制隔离起来并将遭到残酷折磨，直到肉体被消灭。尽管我个人还可能在“翻译”的位置上免受皮肉之苦，但再想以“中立”面目应付美军总管和叛徒们是不可能的了。我的行动将被严密监视，开展斗争将极其困难！

审讯结束后第二天，原来留在野战医院观察伤势的两位战友被押送到拘留所来了。

他们讲了从最近两天由“86”送到医院去住院的“熟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自 10 月 9 日流血斗争之后，叛徒们继续以“清查暴动分子”为名大肆搜捕我地下组织成员，撤换了不少“俘虏官”，基本上完全控制了集中营的内部政权。

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大家的不安。我把时占魁、曹明、钟俊华、周铁行等同志找在一起，分析了 we 面临的形势。大家决定为保存这批宝贵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去“86”和“72”，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小战俘营。

我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正式成立地下党支部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核心。由于当时条件特殊，党支部对内公开，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

但当调查哪些同志是共产党员时，我们 81 个难友中竟然只有时占魁、

曹明和我是党员。原来，所有其余同志都是解放后新参军的小青年。其中共青团员也只有钟俊华、周铁行、余国藩、杨守让、袁朝模等十五六个人，剩下的都是非党团群众。在“86”时，他们只能以弟兄会的名义组织起来。而正是这些弟兄会会员在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为了祖国的荣誉，英勇地冲在最前面。

我们当时决定由担任过连指导员的时占魁同志任支部书记，曹明同志任组委，我任宣委。我对外兼任我们81人的战俘代表。同时成立地下团支部，由周铁行任团支书，钟俊华、杨守让为团支委，他们参加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核心领导。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上，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我们三个共产党员站在党旗下，尽管那盏15瓦的电灯十分昏暗，但墙上的“镰刀斧头”却似乎在闪闪发光。

支部书记时占魁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全体肃立，唱《国际歌》。难友们站了起来，室内安静极了，只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海涛声和铁丝网外美军哨兵沉重的脚步声。我低沉地起了个头，指挥大家低声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大家声音哽咽了，热泪从黄瘦的脸上淌了下来，渐渐地难友们抬起了头，歌声又硬朗起来：“……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大家坐下后，由我代表支部讲话。我先向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着党旗说：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我谨代表远离您怀抱的三名共产党员和全体您的被敌人囚禁在孤岛上的战士向您表示我们对您的忠诚！祖国啊！我们自从被迫远离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我们在苦难中每时每刻都深深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痛苦……”

我刚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背后响起的一片压抑着的哭泣声更加揪疼着我的心，催使我的眼泪汹涌而出。顷刻间，战斗失利，突围不成，大批被俘；鬼子的淫威，叛徒的猖狂，一幕幕重现在我眼前……

一种责任感强使我忍住了眼泪，继续讲了下去：

“今天，我们三个共产党员，81个爱国者，重新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我们深深相信祖国始终在关心着我们这些忠诚的儿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始终在支持着我们！我们将把党的理想化作我们的灵魂，用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燃起斗争的怒火，踏着那些在战场上，在突围时，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的血迹，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我举起了右手，握紧了拳头，领读了誓词：

“茫茫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宣誓完毕，我转过身来，先向难友们表示了我们党支部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以及我个人决不离开大家的保证。然后讲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险恶前途，要求大家紧紧团结在地下党支部周围，共渡难关。

紧接着，曹明代表党支部表扬了弟兄会的斗争精神，肯定了他们在斗

争中的贡献，然后宣布弟兄会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从现在起停止活动，今后全体弟兄会会员将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团支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也讲了话，他们激动地表示了坚决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绝不在艰险面前动摇，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决心。

争取成立“回国战俘大队”

第二天，我告诉来送饭的美国黑人士兵说：“我们要向管理当局写封申诉信，请你给我笔和纸。”那位士兵向我看了看，很快取来了一沓白纸，一支沾水笔和半瓶墨水。

我和周铁行一起研究起草了《告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书》，控诉了在“72”、“86”中国战俘集中营内，叛徒特务们违反日内瓦公约，企图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对战俘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罪行，明确表示，我们81人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坚决要求回归祖国，希望美方管理当局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最后表示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誓死不去“72”、“86”集中营，坚决要求将我们单独关押，成立一个志愿回国的战俘大队。

我随即将它译成英文。中午那位黑人士兵送饭时，我请他替我将信转交给他的上司。

他把那封书写工整的英文信正过来倒过去地看了看，吹了声表示欣赏的口哨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一个空白的军用信封悄悄地进来对我说：“你们的信我已送交司令部头头了。你真棒，写得一手好看的英文字，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呢？”

我笑笑说：“你不怕我在信上进行赤色宣传吗？”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不怕，相信你也不会那么做。”

“那你怎么酬谢我呢？”

“我给你一盒烟，行吗？”

我本想答应，又觉不妥，便说：“你知道，你们给的饭太少了，大家老是肚子饿得咕咕响，你能偷着多给我们送些饭菜就好了！”

“这并不难，我把饭压紧些就行了！”他高兴地比着手势说。

于是，我根据他的叙述写了一封给他在加里福尼亚的老母亲的平安家书。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我在信的最后写上：“去年圣诞节没能回国，今年圣诞节回国的希望又不大了，请老母亲和我一起祈求上帝保佑，让战争早日结束吧！”

从那以后，他送给我们的饭菜果然多了些。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管理当局的答复，一连几天毫无音信。我向警卫要求面见宪兵司令官，他回来说：“司令官让你们等候巨济岛战俘总管菲茨泽拉特上校的决定。”我们听了，只好一方面做好充分准备，防止敌人把我们分散开送往“72”、“86”，一方面耐心地等待。

在那些前途未卜的日子里，大家十分不安。党支部决定分头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我的那些四川同乡，从成都、重庆参军的小青年们，包括几位从国民党95军起义合编过来的难友，思想比较单纯，也不大动脑筋。“反正有党支部领着大家干呢！”一闲下来就缠着我讲故事。我们就披上破军毯，围坐在帐篷里，从文天祥蒙难讲到苏武牧羊，从《鲁宾逊漂流记》讲到《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巨济岛上已很冷，当帐篷外海风夹带雨丝呼啸而过，

大家更觉寒气逼人，于是就更紧地挤靠在一起。这时，大家静静地听着外面北风怒吼，感到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这寒风中冻死的……

后来，几个青年团员要求听革命故事，我就讲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讲我 1948 年到解放区，正好遇上八一建军节，我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接见的情形；讲我又从解放区回四川搞学运、农运、匪运，和在邛崃山区打游击的故事。

尽管当时我也才 22 岁，但每当我看见在这些小兄弟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绽出笑容时，看见那些尚带天真稚气的眼睛里闪耀出向往真理、向往自由、向往祖国的光彩时，就又高兴又心痛！

誓死不进 72 集中营

到了 11 月初，眼看一个月的拘留期限快到了，我们紧张起来。党支部研究决定，为了再次表示我们不去“72”、“86”的决心，我们再一次向管理当局和菲茨泽拉尔特上校递交一封态度坚决的英文信。信中表示：如果管理当局不顾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回国志愿，一定要强迫我们去“72”、“86”，那就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我们到时候将不得不被迫和押送的美军以死相拼！

在送交这封信之前，我把信的大意给全体难友讲了，并请大家在信上签字按了血手印。党支部还决定：一旦美军来押送我们离开拘留所，大家要手挽手紧紧扣在一起。到了“86”或“72”大门口，大家就抱成团围坐一起，敌人真要上来强拉硬拽，那就奋起夺枪和敌人拼了。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拥护支部决定。曹明组织大家反复进行了行军编队和夺枪搏斗演习。王刚、岳大洪、陈昆、陈其武等原弟兄会的领导表现了出色的格斗本领。

11 月 10 日，就在我们拘留期满一个月的那天一早，大约 20 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来到小铁丝网门口，一个少尉打开门叫我们排队出去。

我们几个领导人互相看了看，紧紧地握了握手。曹明下令按预先安排好的小组排成四列纵队，比较身强力壮的难友都排在两旁保护体弱和有伤的难友。站在最前面的是王刚、岳大洪、陈昆和陈其武。

我和曹明带着队伍走上公路。押送我们的美军如临大敌，手中的卡宾枪全都上了刺刀，看着这个阵势，我们知道将有一场恶仗等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大家，每个战友的脸色都那么沉着，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刚强劲。那个最爱听我讲故事的大眼睛小鬼钟骏骅还朝我笑了笑！

啊！我的可爱的骨肉兄弟们，我没能和你们同生，但愿和你们同死！

当我们被押着沉默地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后（在我们的感觉上真比十个钟头还长），前面赫然看见了“72”集中营的大门，就是那个对每个中国战俘来说都是地狱的大门。

我和曹明对看了一眼，他便按预先约定的暗号摘下帽子擦汗，让全体战友做好战斗准备。我听见了一阵轻微的骚动，然后又迅速平静下来。

在快到“72”门口时，我大声咳嗽停了下来，后面也立即停下脚步。

我向旁边押送的美军士兵说：“我有事要找负责押送的少尉。”

“不许可！最好闭上你的嘴！快走！”他一边骂一边用刺刀向我逼来。”

我们又慢慢地移动脚步，那个少尉赶了上来问：“WHAT'S THE MATTER（怎么回事）？”我趁机问少尉：“请问阁下是否知道我们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信？他有何指示？”

“我不知道，我只是执行宪兵司令部的命令！”

“那究竟打算送我们到哪里？”

“到时候你们就清楚了！”

说时迟，那时快。说话间我们已来到“72”大门口，少尉喊了声“STOP！”（停下！）曹明立即打了个手势，我们哗的一下迅速靠拢围成一团，敌人还未反应过来，我们已全部手挽手紧靠一起坐在马路中间。我被曾德全推到里层，孔武有力地护在了前面。

这时“72”大门打开了。几个美军已扬起了枪托。我立即向少尉高喊：“如果你们胆敢强拉我们进去，我们只有以死相拼，这是你已经知道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负责！”

那个少尉后退一步，看了看我们的阵容，向他的士兵挥手示意，全体美军立即围上来以刺刀相逼。

我又喊：“少尉先生！你真下令动武，我就下令我们81个人来抓你一个人。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一口气，咬也要咬死你！”

少尉惊恐地后退了，示意美军把刺刀放下来。他犹豫了一下，便走进“72”去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让“72”的“PG”队员把大门关上，又走到马路对过的“71”号集中营大门口，对那里的美军总管说了几句话。

“71”的大门打开了。他走到我面前说：“我算是认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你们胜利了！到‘71’去吧！你们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国大队。”

我立即站起来，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大家忍不住欢呼起来！

大家站了起来，在兩排美军士兵充满尊敬的目光注视下，手挽手排成四列纵队雄赳赳地进入了71号集中营。

就这样，通过自己团结一致以死求生的抗争，我们争取到了两年多战俘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第九章 “71”——巨济岛上的小延安

苦难中会师

1951年11月10日上午，我们81名来自86集中营的死硬“共党分子”被押送进71集中营。首先见到的是大门左边最靠公路的一个铁丝网里的朝鲜人民军战俘，他们显然看见了刚才我们在“72”大门外的那一场抗争，他们中有一些人站在铁丝网旁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被俘以来，我第一次同这么多朝鲜人民军战友关在一起。他们几个月前也在“72”，因支持中国战俘的斗争被押送到这里来了。

“走过这第一个“朝鲜人大队”，广场左边第二个被隔开的是个空闲着的铁丝网圈。

我们被带到广场左边第三个铁丝网圈前。

71联队的美军总管打开了小门，回过头来点了我们的人数，从押送我们的少尉手中接过我们的战俘卡片，核对了一下数目，便挥手让我们进去，又随手把小营门锁上。

小营内只有一座铁栅顶的大房子。我们进到铁棚房子里，环顾了一下这个可能是做过仓库的水泥地面的大房子，感到一种新的、比较自由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互相看着，像猛然醒悟过来似的一下子拥抱着跳了起来，任胜利的、欢乐的泪水在脸上流淌。

忽然，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我们全都听见了整齐雄壮的歌声，是《解放军进行曲》！

听，“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天呀！这是怎么回事？是天上传下来的仙乐么？

不，就在附近，就在房子的后面！

我们一下子拥出了后门，看见了在右侧的铁丝网后面整齐地排列着 100 多个中国战俘，是他们在朝着我们唱呢！

我们全都扑向铁丝网。开始，大家还呆呆地看着他们，紧接着我们有人哽咽着合唱起来，紧接着铁丝网两边的歌声汇成了一片。

……
从不畏惧，决不屈服，勇敢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一切都清楚了。

在对面的队列中，我看见了我最熟悉的战友们的面孔，有从川西地下党游击队时就在一起战斗的团宣传队干部马有钧，有从温江军分区文工队就在一起的团宣传队导演骆星一，以及 538 团宣传队指导员南阳珍……其他难友也都各自看见了自己部队的上级领导和战友。

于是，歌声刚一结束，两边的战友就隔着一层铁丝网热烈地握手，拍肩，拥抱，顾不得手被铁丝尖划破流血，顾不得铁丝尖扎进自己单薄的衣服里！

马有钧握着我的手，泪光闪闪地说：“我们也刚从‘72’军官大队杀出来，这半年多在‘72’受的罪一言难尽！刚才看你们被押进来，还以为你们是美国鬼子派来整我们的 PG 队呢！我远远地瞧见你走在头里，就不像是叛徒队伍。大家还不放心，决定唱个歌考察一下你们。好了，这下好了，咱们又战斗在一起了。咱们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更不怕敌人搞鬼了！”我含着泪花直点头。旁边有的难友竟隔着铁丝网抱在了一起痛哭失声！

这时，只听见一声高呼：“同志们，战友们，请安静，我说几句话。”

大家逐渐安静下来。讲话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戴着银丝边眼镜的青年人，个了不算高，却气质不凡。

马有钧低声介绍说：“这是××军的营教导员孙振冠。”啊，孙振冠！他正是釜山第 10 收容所朝鲜人民军军医崔成哲要我找的人。

他站上了一个小土堆，接着用带点上海腔的普通话说：“战友们，我们从‘72’冲杀出来的全体同志向从‘86’冲杀出来的难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从今天起，我们这两支队伍会师了！我们将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结合成咱们中国战俘营第一支坚不可摧的先锋队！目前我们这支队伍人数还不多，还不要紧，只要我们在巨济岛上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几万名中国战俘就将心向我们，就将和我们一起展开不屈服的斗争！我

们要成为卡在敌人咽喉里的硬骨头，要成为吸引全体难友的吸铁石……”

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我一下就深深爱上了这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指挥员！

统一领导

当晚，我们偷偷地在隔着军官大队和战士大队的单层铁丝网下面开了一个洞，我、时占魁、曹明、周铁行、钟俊华钻了过去，向以魏林（团副参谋长，老红军）为书记，孙振冠、顾则圣（教导员）为副书记的军官队党支部汇报了我们在“86”的斗争情况和我们81人脱离“86”的经过，包括我们自己成立地下党支部的情况。最后我们对10月9日的流血斗争没有取胜，没夺取到“86”的内部控制权表示了内疚。

首长们表扬了我们的斗争，对那次失败，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是叛徒们得到美国鬼子直接武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你们能够以仅仅81人的微弱力量抗住了敌人把你们送进虎口的阴谋，保住了这批可贵的斗争骨干，是立了一大功的！现在我们合在一起力量更大了。”

我们表示：“被俘后，大家一直在找上级，找党组织，希望得到上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找到了，请求首长们把党团组织合并起来，把战士大队统一领导起来。”

首长们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决定让时占魁、曹明和我参加统一的党支部活动，时占魁参加党支部，团员们参加统一的团支部活动，周铁行参加团支部。我被任命为71联队中国战俘对敌翻译，配合代表孙振冠同志负责敌工工作。

和我一起担任敌工工作的还有英文翻译张济良、日文翻译吴孝宗，秘书组的黎子颖（××军文化教员，集中营化名傅稚恒）、何平谷等战友。

孙振冠对我讲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重点。他告诉我：目前和谈斗争已集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美方坚持要搞“尊重战俘个人志愿”，他们利用叛徒来控制战俘营，强迫战俘拒绝遣返回国，以此在政治上打击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北朝鲜的威信与破坏和谈。我们的任务是揭露敌人的卑鄙伎俩，反对敌人支使叛徒特务控制战俘营和残酷镇压战俘，尽力争取扩大“71”的队伍和影响，特别是争取团营干部脱离叛徒控制到“71”来。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争取人民军战友们的支持，首先要和71联队内的朝鲜人民军战友搞好团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点任务就是向对面“72”的难友们开展宣传，动摇叛徒们的控制。

我听了心里很高兴，庆幸找到了一个好的领导人，并表示愿在他领导下尽力完成任务。我还告诉了他我怎么在釜山第10收容所结识了人民军军医崔成哲，他曾要我在遇到你时，代他问好。

“我总算完成朋友的托咐了！”我笑着说。

老孙也笑着点头说：“崔成哲是个十分热情的好同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夜很深了，我们才带着从未有过的兴奋，从“洞”中钻回到战士大队。当天晚上，我多少天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十分安稳的觉。

巨济岛上的第一次追悼会

第二天晚上，我们召开了王少奇烈士的追悼会，没有遗像，没有灵堂，只有一个用手纸、铁丝扎的花圈，只有几幅军官队和人民军战友们用烟灰沾水写在手纸上送来的挽联：

忍将热泪祭战友，
怒讨血债向敌人！
不屈忠贞爱国志，
尽洒热血民族魂！

最使我感动的是人民军战友竟然送来了两支蜡烛，几个水果。

上午我写了悼词，骆星一为它谱了曲，十几位会识谱的难友排练了这首挽歌。

那天从清晨起就下起了大雨，开追悼会时更是风雨交加。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像祭奠的爆竹，屋内昏黄的灯光映着大家悲愤的脸，追悼会在低沉的挽歌声中开始，又在激昂的挽歌声中结束：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
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仇恨永记在心里。
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
和敌人战斗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这是我一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词，也是我唯一的一首含着悲愤的热泪写出的歌词。

它后来成了集中营历次追悼会的挽歌，成了我永生难忘的一支歌。

在追悼会上最后讲话的是地下党支部的代表马兴旺营长，他说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对祖国的忠诚，他是祖国的好儿女，是党的好战士！号召大家学习青年团员王少奇烈士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完成烈士的遗愿，把反对敌人迫害，反对背叛祖国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争取大囚牢里的小自由

71 联队的美军总管格林中尉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看样子不到 40 岁，瘦高个子，亚麻色头发，谈吐比较文雅。我是在到“71”后的第三天和他单独见面的。

那天我接受了任务去和美军总管谈判，要求开放我们的小营门，允许两个中国大队自由来往。我站在小营门口使劲摇晃铁门，用英语高喊：“开门，我有事要见联队总管！”

从联队部帐篷里跑出来一个戴着“INT”（翻译官）袖标的南朝鲜人，中等个子，一脸苦相。他走过来不耐烦地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你，你什么的想？”

“我有急事要见总管！”

“你的，我的告诉可以。”

“不行，我一定要见总管当面谈！”

他不高兴地回到联队部，过一会儿拿了一串钥匙来打开小营门，说：“中尉叫你到联队部去。”

到了联队部，我先神色自然地说：“中尉先生，您好！”

中尉勉强地回答了声：“你好！有什么事？说吧！”

“我们来‘71’后过得比较愉快，我的同伴们要我来对您给予我们的宽厚待遇表示谢意！”他显然对我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掠过了一丝笑意，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将我们两边的小营门打开，允许我们两个大队的中国人互相来往。军官们文化程度高，我们的战士希望向他们学点文化知识，以免虚度时光！”

他立即摇头说：“不行，你们这批中国人都是好斗分子，根据上级指示，必须严加管束，平时不得随意出来自由行动。”

“那么，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国大队之间开一个小门呢？”

“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我将尽快答复你们。”

“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减少您的麻烦，今后我们中国人统一派出一个代表、一个翻译、一个文书、一个联络员，接受您的管理。”

“可以！”

“如果您认为适宜，我愿担任翻译，我们的孙振冠少校可以担任代表。”

“可以！”

我起身表示感谢。仍是那位朝鲜“翻译官”送我回去。路上，他追着我：“你的英语讲得好，好顺溜。”我装作没听见，让他讨个没趣。

第二天中尉果然派了人来，在我们两个大队之间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可以过人的通道。大家对此十分高兴，表扬我说：“我们的张翻译外交上还真有一手！”

我们派杨守让担任文书，钟俊华担任联络员。曹明为了让我们在“外交场合”更精神些，还特意为我们用军毯缝制了“毛式八角帽。”

揭露敌人，鼓舞难友

“71”地下党领导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72”、“86”的叛徒特务在美方唆使下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从“72”、“86”撤走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在翻译这份“外文公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字典。为此，支部决定从发给我们一人一条的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韩士兵“采购”一本英日字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入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本用旧了的英日字典。为此，三名难友就要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

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要算这本工具书“价钱”最贵而且对革命做的贡献也最大了。

靠它（它的日文注释中有不少汉字），我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军的公开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我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要求。

这些文件有的是通过格林中尉之手送给美军管理当局；有的是交给菲利浦先生（我在后面介绍此人）转交出去；有的则是用极小的字体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约五厘米长一厘米直径的圆棍，包上锡箔塞入肛门，派人住进64野战医院，伺机送给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的联络员，由他们负责送出去。

我们使用的特殊纸、笔、墨水都是用衣服、毛毯向南韩士兵换来的。

我们派往医院的“地下党联络员”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或用辣椒面腌烂眼睛，被当成传染性红眼病送去住院，或用生酱油呛进肺里造成剧烈咳嗽和肺部阴影被当成肺结核送去住院。南阳珍就是这样被派往医院送过信。

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最初只是人民军战俘营自己的组织，后来通过劳动党在南韩军队中的地下党员与平壤建立起了联系。我们“71”地下党支部则是通过64野战医院的人民军军医联系上了他们的地下党组织的。

为了起草和译写上述文件，我们敌工组和秘书组的几个同志经常在一起开夜车。战友们则经常从那少得可怜的半碗饭中留出点饭菜来给我们“加餐”。领导同志常常陪着我们一起吃。我们或拿上难友们匀了来的毯子披在我们的背上，以抵御巨济岛冬天的严寒。

1951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在“71”集中营度过的。美军在我们那个大铁棚房子里给安装了一个用大汽油桶做的简易取暖炉，上面有个烟筒，下面有个炉门，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油漆筒。烧的是煤油，煤油定量，只能在睡前烧一个多钟头，烧时炉壁都发红，大家围坐在四周，前胸烤得慌，背后冷飕飕。晚上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草帘子的水泥地上十分难熬，大家尽量挤在一起，穿着全部衣服，合盖几床军毯才能勉强入睡。

我常常半夜冻醒，醒了还不敢动，怕惊醒身边的战友，只好睁着眼去回忆童年时代在家乡冬天烧树疙瘩烤火的情景，回忆在游击队时围着篝火烧土豆吃的快乐来进行“精神取暖”。因此，我们倒是愿意在一起开夜车写东西，有热水喝，有“夜餐”吃，脚冻了起来跳一跳，大家说说笑笑，时间反倒过得快些、轻松些！

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和配合我们向美军管理当局的书面揭发、抗议，我们还在小铁丝网里游行示威，200多人排成双行，打着用中、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强烈抗议美方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坚决要求取消战俘营内的法西斯罪恶统治！”“反对美方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反对美方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等等。这些标语都是用纱布绑在帐篷杆子上，用手纸拼成横幅写成的。

我们高声唱着《国歌》、《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走，跟着毛泽东走》等歌曲，在大约两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上来回转圈。

我们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对面72集中营内的难友们的反响，许多难友听到我们的歌声，跑出帐篷扒在铁丝网边上瞧着我们。

很快，狗腿子们也气急败坏地跑出来，拿着棒子把难友们又赶回去。于是我们就高声喊口号：“打倒汉奸走狗！”“不许迫害战俘！”“认贼作父的叛徒可耻！”

狗腿子们恼羞成怒地跳脚，用极其下流的话漫骂。我们便又唱起“国民党呀那个一团糟呀，汉奸走狗可真不少呀……”

一开始，站岗的南韩军、巡逻的美军都站在公路上看热闹。美国兵还大声喊叫：“ENCORE！”（再唱一次！）但后来再游行，宪兵司令部就开来了装甲车，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跳下来，向我们投掷催泪瓦斯弹，黄绿色的浓烟包围了我们。我们只好收起横幅标语，呛咳着流着泪撤回屋内，紧闭屋门。

以后我们有了经验，只选择刮大风的天气游行，歌声又传得远，毒气又散得快。气得带队的宪兵头头大骂我们是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共党分子”，并威胁我们说再闹事就开枪！我就用英语大声回答：“你们美国不是讲民主

自由么？你们的宪法都允许游行示威，你为什么不允许？你最好请你们的总管来一趟，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抗议！”那个头头干瞪眼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斗争行动使得“巨济岛上成立了一个第71号红色志愿军战俘营”的消息很快传遍巨济岛和釜山各战俘营。

人民军战友们抬大粪路过“71”时总要摘下帽子向我们挥帽致意！而一些被调去釜山接受审讯回巨济岛的中国战俘纷纷要求要到“71”，不回“72”或“86”。管理当局很伤脑筋，对我们的看管更加严密。他们把“71”内支持我们的人民军战俘换成一批人民军中的败类，并从此不再派我们的人出公差搬运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后来连我们的粪便也不让我们出去倒了，只把粪桶抬放在广场上，让朝鲜人民军战俘中的叛徒抬到海边去倒，这使得那些坏蛋更加恨我们。

12月初，他们也举行一次游行来庆祝南朝鲜的一个什么节日。他们用硬纸板剪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漫画像，在美军的同意下，他们近千人竟然举着画像在广场上游行，唱着反动歌曲，喊着“打倒金日成”、“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往画像上吐唾沫，扔石头。

这可把我们气坏了。于是我们准备了石头瓦块，等他们走到我们门口，就雨点般地打过去，打得他们抱头鼠窜，草草收兵。之后，我们坚决抗议其挑衅，要求将其调出“71”，否则，他们将负责一切严重后果。

不久，这些坏蛋就真的夹着尾巴滚蛋了。“71”也就完全成了我们的天下！伙房、医务室都由我们管了起来。

绝食换回14位战友

12月的一天，几个难友从釜山被押回“72”。他们一到“72”门口，一位难友趁押送的美军没留神，转身就朝“71”大门跑过来，又不顾铁丝尖刺伤，迅速爬越过大门，跑向我们的小营门口。

当时正好是开饭时间，小营门正开着往里抬饭，我们欢叫着把他拉进了战士队。

很快格林中尉就领着那几个押送的美军进来要人，我们便将他藏到军官队去。那些美国兵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辨认，没找到，又跑到军官队去找。军官队有四个帐篷，大家挤来挤去，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长得又很相似，最后只得作罢。但从此美军押送中国战俘路过“71”时就特别警惕了。

1952年的新年来到了。

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迎来了这个充满苦难的新年。预见到未来的艰险岁月，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两个大队的新年“团拜”，以鼓舞斗志。

一清早我们这200多名“死硬共党分子”冒着凛烈的寒风，站在广场上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啊，我们的国歌多么像是专为我们而谱写的啊！我想起了小时候唱这支《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抗战激情，过了这么多年竟仍要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年抗日，现在抗美，我们的民族竟如此多灾多难！我的眼睛模糊了。

当魏林同志代表党支部致新年祝词，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准备好作更艰苦的斗争时，我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好像是来自北京，来自天安门……

我多么想知道就在这一时刻，北京是怎样欢庆新年的？那些正在放鞭

炮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为了他们的和平生活，人们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1952年的新年过了不几天，就在我们“71”大门口演出了一幕惨剧。

14名从釜山伤病医院押送来巨济岛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停在大营门前。双手拉住铁丝网坚决要进“71”。高大强壮的美军硬要拽他们进“72”。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都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倒在公路上。

我们在里面大声喊叫，咒骂，却无济于事。眼看着难友们被硬拽进“72”去，不少人失声痛哭，大家纷纷要求支部想一切办法救他们。一想到他们将在“72”受到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党支部决定举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美方把他们送过来。我把给菲茨泽拉莱特的抗议书写好，和孙振冠一起到联队部送给格林中尉，并请他转告菲茨泽拉莱特，我们宁肯饿死也要救出这14位难友。

第一天，伙房停伙了，美军没有理睬我们。第二天，送来的粮食蔬菜堆在小营门口没人去取，我们动员大家躺着休息准备长期绝食。难友们开始还想走动、说话，到第三天都躺下了，但没有一个人喊饿。

格林中尉开始几次来叫我劝大家吃饭，他说他将努力去争取把那14名战俘调过来。

我回答他：大家决不会进餐，除非见到我们那些被拖进“72”，现在已生命垂危的难友。

第四天下午，“71”、“72”大门同时打开了，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被送了过来。

我们从“床”上爬起来，激动地争着去拥抱他们，完全忘记了饿得肚皮贴后心的痛苦。

晚上唐乃耀同志叙述了他被拉进“72”后的遭遇。当他把衣服脱下来，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烙痕和翻起来的被烧焦的肉皮惊住了。多么残忍的叛徒，多么坚强的战友啊！

而唐乃耀包扎了伤口，第二天就要求和我们一起去开夜车写那份血的控拆书——《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丁先文拼死来到“71”

1月中旬的一天，丁先文难友被美军主动地送到了“71”，这使我们很感到奇怪。他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血的纱布，脸色蜡黄，一走进来就要往下倒，我们赶紧扶住了他。

从他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叙述中，才知道他是在医院坚决要求来“71”遭到拒绝后，被迫用刀片割了脖子，经输血抢救才送来的。

大家深深被感动了，当晚专门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在会上他吃力地叙述了他怎样和张达、张光甫、王云生等难友在团参谋长杜岗领导下秘密组织起了“回国小组”开展斗争，又怎样被叛徒告密，他和张达被整得死去活来，后美军检查卫生时发现他们已奄奄一息，才被送到医院。

他特别痛心汇报了杜岗同志的情况：杜参谋长被抓后痛斥了叛徒的罪恶行径，坏蛋们便恼羞成怒，将他吊在帐篷顶上毒打，门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72”受非人折磨。

他说到这里已发不出声。停了一会儿，他鼓起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了过去！

丁先文难友后来担任了回国支队的纠察分队长，负责一个分号的内部

保卫工作。尽管他在起义的 95 军里当过国民党兵，却对集中营里那些国民党特务、叛徒极为厌恶，他在旧军队挨打受骂，太了解这些人了。他用以死相抗的实际行刻赢得难友们的信任，后来又被吸收为地下党员。

菲利浦

在“71”，除了格林中尉外，我还不止一次见到另外一个特殊的美国人——菲利浦。

他约有一米八的个子，身材匀称，碧眼金发，年约 40 开外，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一身笔挺的米黄色或浅蓝色西装，风度十分潇洒，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自由出入战俘营。菲利浦每次来“71”都是先找魏林、孙振寇、马兴旺，对他们象老熟人一样握手拍肩。

我们到“71”不久的一天，他来了。当地从军官队来到战士队见我正趴在床上校对一份英文稿，便弯下身来用中国话对我说：“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禁吓了一跳，从被俘后还没见过着平民装又会说汉语的美国人呢！我转过身来把信稿递给他看。

他迅速地读了一遍，指着一个地方自言自语地用英语说：“这儿好像写错了！”我站起来也用英语说：“那就请你帮我改正吧！”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便掏出笔来，改写了一个更恰当的单词，然后又用汉语说：“总的来看写得不错，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嘛！”

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他便伸出手来用英语说：“原来你就是张翻译，我早听说过你的情况了。咱们交个朋友吧！”

我很勉强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觉察到我的疑虑，便自我介绍道：“我叫菲利浦，是美联社记者，常驻巨济岛专门采访战俘营新闻的！我和你们的魏林、孙振寇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说：“您一定够忙的，战俘营的新闻太多了，每天都有打伤打死人的事，不知您采访到没有？”

“我今天来，就是想通过你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嘛。”他笑笑说。

“主要情况我们都写在这封致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公开信中了。”

“我看过了，里面的大部分事实我都知道。我愿帮助你们直接送给上校。以后有其他类似信件我也可以效劳。”

“非常感谢！我是否可以表明我的如下想法：您既然是位记者，能否请您对战俘营的各种非人道现象给予公正的报道？”

他马上说：“我是很憎恶那些变节者的丑恶行为的，我已不止一次对总管上校建议要严厉管束他们。我还愿尽我的可能去减轻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后果，你们军官队 140 多人就是在我的努力下，从‘72’分家出来的，这一点魏林他们可以证明嘛！”他脸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笑着说：“这一点他们已向我说过，您做了件好事！那就委托您把这封信交给司令官吧！您最好是能够发表这封公开信！”

他接过信说：“我一定亲自交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至于公开发表，你知道决定权并不在我这个普通记者手里。”

临走，他忽然说：“怎么管理当局连桌子、椅子都不给你们，这怎么写字办公呢？我去替你们提要求。”

我用难以相信的眼光看了看他说：“那就太感谢了！”

事后，我把和菲利浦的谈话向孙振寇做了汇报。老孙分析说：“他决不

是什么普通记者，据我们估计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务，他对我们表示的友好，很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伪装替我们干点事，你给他将了一军，这很好！看他还有什么表演吧！估计桌子会送来，以证明他的‘关心’。”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格林中尉果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方桌四个凳子，还有纸笔墨水。我们再不用趴在地上写字了。

我再一次感到老孙确实不愧为我军的教导员（在部队叫他“小老兵”），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策水平是我所不及的，尽管当时他不过24岁。

两天后，我们从操场上拾到一块包有信纸的石头，信上用英文写着：“你们的团政委被敌人从釜山押来，关在‘72’军官队受折磨，尽快设法把他要到‘71’去。”

我们立即向司令官写信，要求将“王芳（即赵佐端）上校”和“杜岗中校”送“71”。

我们在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被叛徒整死，您将负全部责任。”我们估计那个情报是人民军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伪军中的自己人扔进来的。

几天后，当菲利浦再来到“71”时，我们把赵政委和杜参谋长的处境告诉了他，并把我们写给司令官的信给他看了。

老孙对他说：“这是两位我们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美军恐怕不好交待，而叛徒们为了讨好主子却很可能整死他们。”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老孙又说：“我们不希望为了挽救他们而被迫再次绝食。这对贵国不会有好的影响。”

他终于说：“你们放心，我想总管上校会明智地处理这件事，我也愿再次替你们转达你们的要求。”我们表示了感谢。

次日，我们在“71”迎接了赵政委和杜参谋长，他们都是我们团的团首长，我最熟悉的领导人，见到他们那被折磨得异常憔悴的面容，尽管他们笑着，我心里却在流泪。

当晚我们开会庆祝这一重大的胜利，我们的团一级领导干部都挣脱了叛徒控制来到“71”，我们的领导力量大大增强了。

我们的“宣传队”表演了《钢铁战士》和歌剧《刘胡兰》片断以及活报剧《蒋家班垮台》。马友钧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晒干后蒙在铝筒上制成的，而铝筒是从帐篷支柱的接头上锯下来的。在我们这块“红色根据地”里，能人多着哩！

那天我们演出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演员的那种激情，观众的那种心情却是人间少有的。

当我们的“独唱演员”——军文工队队员余国藩唱着：“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我从那前线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没唱完大家就使劲鼓起掌来，难得的笑声震动着铁皮屋顶飞出了铁丝网。

第十章 反对血腥“甄别”

审查中国战俘“自杀”案

1942年的春天来到了巨济岛，从南边海上吹来了暖风。三月初，草被吹绿了，它们在铁丝网边上的乱石缝里倔强地向上伸出头来，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甚至开出小花来。

我的那些年轻战友常低头徘徊在它们身旁，有感于它们那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春天并未给战俘集中营带来希望。原86联队部翻译安宝元同志通过住院坚持要求来“71”被允许了，他汇报了在“86”敌人的恐怖统治日益加剧的情况，大家听了更加不安。他还说高化龙翻译已经去了医院，不打算回“86”了，联队部只有书记长郭乃坚仍在坚持。看来，形势更加严峻了，由于板门店的和谈僵持着，美方更加紧在战俘营内推行它的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政策。

叛徒们根据其主子的指示加强了战俘营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和对战俘的政治陷害、人身折磨。我们通过医院不断听到在“72”、“86”集中营内难友们奋起反抗和狗腿子们残酷镇压的消息。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动标语，从在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直到在前胸后背上刺上“青天白日”。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盖手印，甚至被强迫写“绝命书”：“再不送我去台湾，我宁愿自尽……”

3月初的一天上午，“C.I.D.”的布莱克中尉忽然坐吉普车来到“71”，他要我为他担任翻译，一起去审查一件在中国战俘中发生的“自杀案”。

我被他带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先译出一封“绝命书”。

那是写在两张被揉皱了的烟盒上的一封“给蒋总统的信”，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受共匪奴役、为共匪卖命的受苦人，是联合国军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着蒋总统派人来接我去台湾，等到现在不来接我，共匪的板门店代表还要强迫我回大陆，我只有死报效党国！蒋总统万岁！”

铅笔字迹很潦草，我坐在中尉的办公桌前辨认了半天，正要拿起笔来翻译，布莱克问我想喝红茶还是喝咖啡？我说：“谢谢，我不渴。”

他说：“给你冲杯咖啡吧！”便走出办公室去冲咖啡。

我低头偶然看见在中尉未关严的抽屉里有一张写着英文的白纸，我悄悄将抽屉开大点一看，正是这封信的译文。最后那个“蒋总统万岁！”的译文后面还打了个大叹号。

我赶快把抽屉还原，立即想到布莱克已经找人翻译过此信。让我再译的原因或者是不相信那人的水平，或者想考验我是否可以信赖。

我迅速作了决断：不管怎样，我必须按原文译出来。尽管我十分厌恶这封信，特别是对蒋介石的称呼和喊万岁更为反感。

布莱克送来咖啡后便坐在一旁喝着咖啡，一面看一张《星条报》（美国军报），一面对我说：“你不必着忙，上午能译完就可以了。”

当我咬着铅笔杆，抬起头来思考一个确切的英语单词时，忽然看见那张《星条报》上的一行标题中有“板门店”几个黑体字，我意识到那是一则关于和谈的通讯，我多么想要过来读一读。但我又怕碰钉子下不来台，便先集中精力把那封信译出来，誊清之后交给了布莱克。

布莱克把报纸放在桌上拿过译文仔细读起来，那张报就离我不远，可惜那项关于和谈的报道却压在了反面。我喝着早已凉了的咖啡，反复想着用什么办法去了解那个报道内容，我们太需要知道和谈的情况了。

布莱克看完了我的译文，满意地说：“看来还是你的英语更好，这下我

弄清了这份‘绝命书’确切的内容了。”

我问：“我可以问这位死者的情况么？”

“当然可以。我今天早上得到报告和这件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物证。死者是第 86 战俘营的一个中国战俘，今天清早被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里。我负责审讯这个案子，你将尽力协助找，是么？张！”

“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回答。

他看了看手表说：“啊！已经吃午饭的时间了，为了你的良好工作，我请你在这里用餐。”说完，他从柜里取出一个美军军用扁平型铝饭盒，又说：“你就坐在这里等我，不会让你久等的！”便走了出去。

一阵强烈的喜悦冲上心头，他一出去，我便拿起报来，心里咚咚地跳着，迅速翻到那则消息：“板门店和谈僵局可望打破，朝中方面可能在战俘志愿遣返问题上做出让步。”

“我的天，让步？！”我急速地看报道内容：

“我方出于早日结束战争的愿望和对战俘的人道主义考虑，在此次会谈中，我方首席代表呼吁朝中方面同意我们提出的在中立国监督下对战俘的去向志愿进行甄别。朝中方面未予反驳……”

“啊！‘未予反驳’！我们的代表是否清楚在巨济岛上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再看下去。

“……朝中方面代表只是再次提出无根据的指责，重复所谓‘美方对战俘实行变本加厉的血腥镇压，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老调。”

“啊，原来祖国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祖国是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的！”这时门外响起脚步声，我立即放下报纸。

布莱克端着饭盒开门进来了。我站起来要迎上去，他示意我坐下，把饭盒放在我面前。我打开饭盒，里面放着蕃茄牛肉汤、夹着黄油的面包和几块肉。

他指着那几块肉说：“这是从美国空运来的新鲜鹅肉，只有我们军官食堂才供给。”

我吃着这丰盛的午餐，想着难友们这时正在急切地咽吞那飘着烂萝卜叶的酱油汤和半碗大麦米饭，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完饭，布莱克用车送我回“71”。在路上，他告诉我，明天他来接我一起去“86”作现场调查。

公路上只有我们这辆车行驶着，我看着他的手枪想，要是在前方，要是我会开吉普车，这真是个逃走的好机会！我不禁脱口问他：“开吉普车很难学会吧？”

他说：“并不比学走路更难！”很快，我们就到了“71”。

我一回去立即把在《星条报》上看到的消息向赵政委、老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嘱咐我找机会继续了解有关报道。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布莱克驾车来了，我们一起往“86”驶去。

一路上我很激动：“‘86’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能否见到自己的知心战友？见到了又是否有机会说上几句话？”

车子从关押着人民军战友的第 76、77 集中营铁丝网外驶过，我看见里面广场上有一队队的朝鲜战友戴着自制的人民军军帽雄赳赳地在练习队列行进，有的在拿着帐篷杆子练刺杀动作。我禁不住轻轻地“嘿”了一声。

布莱克显然听见了，他握着方向盘正视着前面的弯道说：“这是一些疯

子！”说完看我一眼。

我笑着说：“您还不太了解朝鲜民族，他们历史上多次受到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其中包括我们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太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了！”

布莱克说：“那么，现在你们中共军队占领着北朝鲜算不算异族入侵呢？”

我反问道：“难道历史上有过这种侵略吗？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个强大的入侵者！”

布莱克笑了：“这真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我们美军不是也和南朝鲜军队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个强大的入侵者吗？你怎么回答我呢？”

不等我回答，他又收起笑容说：“算了，我们争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这完全是一场混乱的、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不值得为它离开妻儿不远万里跑到这个倒霉的岛子上来，而你这个大学生更不值得为它抛弃学业到这里来受罪！”

我对他的坦率和他对这场战争的观点感到惊讶。我不愿多讨论这个问题。心想：“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我并不后悔自己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我知道了为什么他虽然很清楚我的政治立场，却仍然抱有同情甚至信任感。

“86”到了，在联队部，史密斯上尉见到我笑着问：“张，这一向你过得如何？”

“实在说，我过得比在这里时要轻松些！”

“我知道，我理解！”

这时我见到郭乃坚正用眼睛向我表示问候，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布莱克中尉请史密斯领我们去看看事故现场。我们来到三大队旁边的那座用石头砌成的简易厕所。

史密斯用手绢捂着鼻子指着那根当作檩条的铁管说：“喏，死者被发现吊在它下面。”

布莱克去站在下面自己试了试，看来以他的中等偏高的个头如果用绳子上吊，脚还能踩在地上。

他问：“您认为死者的身材比我矮得多么？”史密斯摊开双手表示他不清楚。

布莱克说：“让我们再去看看尸体吧！”

我们钻进坐落在铁丝网边上的一个空帐篷里。在暗淡的灯光下，躺着一具用草帘子盖着的死尸。布莱克戴上手套去揭开草帘，一张双眼暴突、舌头外伸、嘴角沾满乌黑色血迹的可怕面孔显露出来。

尽管我在朝鲜战场上已经见过不少尸体，被炸死的，被烧死的，被射杀的，形状各异肤色不同的尸体，但见到这个形象仍然禁不住惊呼了一声，立即转开了视线。

我听到布莱克怀疑地“嗯”了一声。我转过头来，见到他弯下身子正拨着死者的头，观察颈下的印痕，又拿出卷尺量了量死者的身长。

然后他盖上草帘，直起身来，扔掉手套说：“这是他杀，不是自杀！”

史密斯上尉又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联队部看见联队副王福田，团警备队长周演达，三大队长和三大队警备队长等“证人”都已被召来坐在那里等着。

见我们进来，他们全都露出谦卑的笑容弯腰站了起来。

我怒视了周演达一眼，他赶忙低下头去。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下：“布莱克中尉将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应如实回答。”然后向我点点头。

我以很严肃的口吻翻译道：“布莱克中尉现在开始审讯你们，你们必须老实交待各自的罪行。”几个坏蛋惶恐地抬起头来，周演达站起来试图辩解什么。布莱克看出来，摆手制止道：“我只需要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我说：“让你们老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只得又坐了下去。我看见他嚼着牙根，心想今天你小子得听我的摆布。

布莱克先提问了死者的姓名、在部队的职务、籍贯、年龄、文化程度。

三大队长说只知道死者姓名。史密斯请郭乃坚递过来死者的战俘卡片。我看见卡片上用英文写着的姓名是张什么，河北什么县什么村的人，67军的一个班长，24岁，没上过学。

我便对布莱克说：死者的家乡是个很偏远的老解放区，死者显然是贫苦农民参军的，不会有什么文化。

布莱克点点头，然后问了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又怎么找到了那封绝命书？

那个三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队长来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

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1.74米高的人吗？没想到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到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

当我也连珠炮似的把这几个反问扔向几个坏蛋时，他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布莱克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

我译道：“布莱克中尉要你们从实招来，否则将罪上加罪。”

见这几个家伙顽固地缄口不语，中尉摇了摇头说：“张，请把他们的供词用中英文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

我立即向郭乃坚要纸笔，他在给我纸笔时趁机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见他泪光闪闪，我的眼圈也一下就红了。我低着头记录完供词，又将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说：“告诉他们，现在改供词还来得及。”

我便翻译道：“你们听着，中尉说了，现在如实招供还来得及，否则等着你们的将是判死刑！”那几个走狗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后又沉默地低下头。

中尉见状摆了摆手，我将供词拍了一下说：“那就签字吧！”那个三大队警备队长歪歪扭扭地签了名。

在把我送回“71”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我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么高明！”

他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

“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

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

我望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里的诚挚神色，收下了这份“工资”。

回到“家”里，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老孙。领导上决定除了留下两盒香烟给我们开夜车作奖励之用外，罐头分给病号，烟分给大家。

于是，过着烟瘾、吐着烟圈的难友们说：“就盼着咱们的张翻译给多挣点‘工资’回来！”

我详细地向领导同志们汇报了在“86”见到的惨况和侦破审讯的经过。领导同志们当时就一起交换了看法，大家认为根据《星条报》刊登的和谈消息和我汇报的这个血案，敌人正在大做战俘的文章，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同时要就这个惨案向美管理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当天晚上我们心情沉重地连夜赶写出了一份《向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的严重抗议与严正要求》，揭发控诉了叛徒们在美方指使纵容下屠杀爱国战俘的极其卑鄙、残忍的暴行。

坚决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惨案，否则美方必将受到全世界支持正义的人民的同声谴责……

夜很深了，一直陪着我们的顾则圣和李喜尔从伙房端来热气腾腾的肉粥。老顾告诉我们：粥里那点肉是病号同志们硬要把我带回来的罐头打开放进去的。

70 联队难友夺权

3月底，在70联队（从“72”调往海边去做苦役的近千名“不稳分子”所组成），我们的同志计划组织一次夺权斗争，以打破叛徒的残酷统治，粉碎敌人愈演愈烈的强迫往难友身上刻字、强迫写血书等政治陷害阴谋。

不幸，他们的计划被叛徒告密，金甫、韩子建、姜瑞溥、续公度、阳文华等七人被美军押回“72”军官队，日夜加以残酷折磨。

“72”军官大队的帐篷正对着“71”，当他们被押到铁丝网边的厕所解手时，被“71”的同志认出。我们当即向新上任总管杜德将军写了抗议信，要求立即将他们送来“71”。同时我们每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场上唱歌，以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认出了被两个狗腿子押着上厕所的姜瑞溥。他的脑袋肿得很大，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心痛极了，高声地喊：“瑞溥，坚持下去，我们已向美军指名要你们过来！”

瑞溥听了一下子向铁丝网边冲过来，狗腿子们追上去，只两脚就踹得他在地面上打滚。

我们大家一起猛喊：“不许打人！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这些疯狗，你们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围上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和我们辱骂；另一些继续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气得我跑回屋里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了一场。

1981年4月27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里聚会，纪念我们“蒙难三十周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双手扶着头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想什么吗？你越是喊我，我越难受。我真希望那铁丝网上通得有电流，我好撞上去杀身成仁！”我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饮而尽……

反对血腥“甄别”

4月6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找孙振冠。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少校到‘72’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

孙少校安全返回‘71’。”

我立即到军官大队向赵政委他们汇报。赵政委马上召集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敌人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老孙的安全。

老孙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我随他到了联队部，我要求格林允许我和老孙一起去。他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老孙劝我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72”走去。

我见大门外果然排满了吉普车，还有一个排的卫兵，一个顶上装有喇叭的广播车。

看来确实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难道和谈真成功了？要宣布战俘遣返了？我们能回国了？”想到这里我的心狂跳起来，“老孙你快开完会回来吧！”我返过身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战友都拥挤在小铁丝网里面，眼巴巴地踮起脚向“72”大门望着。

时间随着心跳一秒一秒地过去，终于（其实只有约半小时），“72”的大门开了，几个狗腿子把老孙从“72”大门里推出来。老孙涨红着脸回到“71”，我没敢问究竟，陪他急忙往回走。突然空中响起了高音喇叭的汉语广播声音：“战俘们，中国战俘们！”我们惊得停住脚步，全世界似乎都停止了呼吸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接着喇叭又响了起来：“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联合国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愿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听完广播大家都懵了，想等着再听一次。

广播又再次重复，忽然对面“72”喊声大作，我看见许多提着棍子的败类，正疯狂地吆喝着：“回去！都给我滚回去！”挥棒驱赶着已经拥出帐篷来听广播的无数难友。

接着在他们的帐篷里、广场上到处响起敲打碗盆的噪声，广播声被淹没了。但在我们这边还能继续听出大意来。

我们都回到房子里，军官队也都过来了。老孙站着眼大家讲了贝尔上校召集开会的情况：

“72”、“86”、“70”的代表都在场，贝尔故意说：“板门店中共代表态度非常强硬，一定要求无条件交换全体战俘。联合国军为了和平，正考虑是否答应中共要求！”这引起了叛徒们好一阵叫嚣，喊口号誓死不回大陆！然后贝尔才说：“不要吵了，联合国军正是考虑到战俘的志愿，决定在二三天内进行一次审查甄别，以保证按照大家的个人志愿，自由遣返。”尽管我立即站起来严正声明：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应全部交换回国。美国作为签字国应当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应无条件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我们坚决反对搞什么审查甄别。但贝尔根本不认真听完我的发言就宣布散会。刚才的广播大家都听到了。下一步怎么办，请大家等我们研究个初步方案再征求意见！

接着，党委委员们退出去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都不愿离开，静静地挤在一起等候党委做出决定。

半个小时后，老孙回来传达党委的三项决定：

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好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72”的难友们在甄别时敢于表达回国志愿。

二、立即联名向杜德送去紧急声明，提出我们的具体要求。

三、我们将拒绝接受“审查甄别”，同时，到时候将声明我们全体一致要求回归祖国。

老孙讲完之后，问大家有无补充修正意见，会场先是沉静了几秒钟，然后爆发了十分热烈的掌声！

我们紧急行动起来：我和黎子颖、何平谷、吴孝忠、张济良一起起草和翻译出给杜德的紧急声明，曹明、南阳珍则带几个战士队的同志负责赶制国旗。

黎子颖先根据党委指示，用中文起草了信件，提出了下列具体要求：

(1) 在各集中营重新向全体战俘宣读公告内容。

(2) 立即将“72”、“86”、“70”各集中营的俘虏官加以隔离审查；由我方最高军官王芳上校前往各战俘营在无干扰情况下向战俘们进行解释说明。

(3) 从现在起美军应在集中营内外日夜巡查警戒，防止流血事件。

(4) 立即将下列有生命危险的四百八十人（名单附后）送来“71”，以保证其安全。

草稿经党委审定后，立即由书法工整的何平谷、吴孝忠加以誊清。我和张济良同时动手翻译。当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将给杜德的紧急信件，中英文各一份送给格林中尉，请他尽快转送杜德将军。我对他说：“在此关键时刻，为了减少中国战俘的死亡，务请您立即送去。”

格林接过信，用手掂了掂，便去打电话给司令部，请杜德的副官来“71”取信。

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回来时，吴孝忠已向值勤的伪军交涉好，用几条军毯换几大瓶红药水和奎宁丸来“治病”，伪军答应于明天凌晨送来。曹明也已经和钟俊华等几位难友，把军用防雨布变成了一幅白绸子。他们先把雨布放在炉子上烤热，再用帆布使劲一点点擦去橡胶，变戏法似的将雨布变成了白色的尼龙绸。

4月7日，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浓雾从海上爬出来笼罩着巨济岛。“71”和“72”表面上都极为安静，上午10点钟美军的广播车又开来广播了公告，“72”又是一片喊叫声和敲打饭盆的嘈杂声，接着广播车又开走了。

我们估计当天下午可能开始甄别审查，便加紧制作国旗。雨开始下起来，公路上出现了装甲车的隆隆声。为了防止美军闯进来，我们增派了室外监视哨。在屋里，白绸子被曹明用红药水染红，还有一块则用奎宁水溶液染成鲜黄色。几位难友趴在地上根据回忆画着五个星星的大小与位置，然后用小锯片磨成的小刀裁剪出五个五角星来，又用浆糊粘在了红旗上。

有人说：“应该用针缝上才不怕风吹掉呢！”于是，曹明又拿出他自制的针线。这时，军官队的战友们几乎都过来了，都想看看这面亲爱的五星红旗，都想去缝上一针。

赵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一针。旗子被摆在房子中间，大家肃静地等着开始。凄风苦雨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灯摇曳着，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意志弥坚的中华儿女。

赵政委第一个走上去，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有人带头唱起了国歌。政委艰难地站起来又跪下去，捧起一只旗角亲吻起来。在低低的国歌声

中我听见了哽咽声，我自己忍不住流出了热泪。

难友们一个个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敬仰，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前去跪着缝旗、吻旗，呜咽声更大了，歌声、哭声和着风雨一起飘向远方。

啊，祖国，你听得见我们在地狱里的呼唤吗……

那天下午没有美军来巡查，我们松了一口气。当天夜里，曾德全等几位比较有力气的战友在风雨掩盖下悄悄地在操场上挖着埋旗杆用的深坑。地面极硬，又无工具，实在难挖，随即改成将三个空汽油桶紧靠一起，在桶里装进石块、土块，三个桶的空隙中将立起旗杆。岗楼上的探照灯几次穿过雨帘照过来，他们急速趴在泥水里不动，回屋时已成了泥人，大家赶忙为他们擦身换衣。军官队的战友则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成一根长达十余米的旗杆，这一夜大家几乎没有合眼。

从对面“72”集中营传来的一阵阵狗腿子们的狂喊，难友们的惨叫彻夜不停。我们“71”的战友们愤怒之极，轮流冒着雨到外面对“72”高唱革命歌曲、喊口号，激励难友们坚持住。

194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71”地下党委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钟俊华、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天刚亮，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旗杆在三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钟俊华、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在绳上系好，等着升旗。

岗楼上的美军好像睡着了没有动静，值岗的南韩军人在外面还傻瞪着眼。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上土坡指挥大家齐唱国歌。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像是刚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南韩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孝忠走上去用日语向那些南韩军说：“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南韩军看了看岗楼上正在用机枪瞄准国旗的美军，蛮横地嚷着：“不行，你们再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孝忠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南韩军人也扣动了扳机，吴孝忠同志捂着肚子倒下去！任贵全、孙长青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中！国旗上洞穿了一串机枪眼。

难友们愤怒了，一些同志跑去护理伤员，许多人在地上寻找石头准备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拉起手围起一道人墙，《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响亮，敌人似乎被自己的枪声吓住了，暂时沉寂下来。

老孙在我旁边大声对着我耳旁喊：“泽石，你赶快去找格林要救护车！”

我转身朝“71”联队部跑去，我看对面“72”的帐篷外面站着好多好多难友在仰望着那面不屈的五星红旗，狗腿子们提着棒子不知所措。

格林正在联队部里来回转圈。见我去了，急问：“你们怎么搞的，死了人让我怎么交代！”

我也焦急地说：“请您先打电话要救护车吧！有三个人倒下了，晚了就

不行了！”

他急忙拿起电话往医院里打，我又跑出联队部去看国旗。机枪又响了起来，机枪子弹将旗杆打得木屑横飞，终于系旗绳被打断，旗子慢慢地飘落在保卫它的人丛中。

三个重伤员被战友们用雨布做的临时担架抬到了联队部。我跑向吴孝忠，见他脸色煞白，就伏身问他：“孝忠，孝忠，你伤着哪里了？”

他努力笑了笑，喘着气说：“大概是肚子打穿了，不要紧。”我赶忙扭过脸去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我又跑过去看了孙长青，他的左腿被打断了。这时，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声，我忙回身去和格林一起打开大门。两位美军护士给伤员做了包扎，大家七手八脚急忙把伤员抬上了救护车。鲜血一滩滩留在大门口，它那殷红的颜色多么像国旗上的红色啊！

上午 10 点，几辆卡车和一队美军开进了第 71 集中营，带兵的上尉对我说：“奉杜德将军之命，前来审查甄别。”他指着几个穿军装的黄种人说：“他们会讲中国话，将由他们来审查，请把你们的人排成队，带到联队部跟前来。”

我立即回去报告了情况。大家紧急集合，带好简单的行李，整队前往联队部。

那个上尉又说：“你们将一个一个进入联队部，单独地、自由地表明自己的去向，愿意去台湾的立即上车送走。”

我把老孙介绍给他说：“这是我们的少校，我们的代表，请听他的回答！”

老孙严肃地对他说：“我们已经明确地向你们的杜德将军表明我们对甄别的态度，我们全体 238 名志愿军战俘也已全部签名向杜德表示了回国意愿，你们不用再麻烦了。”

那个上尉听了我的翻译看了看格林中尉，问：“您知道这是真的吗？”格林肯定地点了点头。

上尉回过头看看秩序井然地静坐着的战友们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便挥手说道：“那就全部上车走吧！”

我们一面激动地想着：“可能这就要上船回国吧！”一面列队上了车。

汽车发动了，我回过头来望着 71 集中营，看了看我们整整半年在那里住过的铁皮房子，看了看仍然屹立在那里的旗杆。心想：“再见了，永远再见！‘71’，你这巨济岛的小延安。”

这时站在旁边的钟骏华小鬼把我的右手拉进了他的怀里，我触摸到那面五星红旗的滑润的绸面和一颗剧烈跳动的心！

我的左手又被攥住了，我扭过头来，看见的是曹明的满脸笑容。他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咱们胜利了！”

1987 年 1 月的一天，一个须发皆白土里土气的老头叩开我的家门，他激动地对我说：“啊，我就是找你，泽石！”说着就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我赶紧请他进了屋。坐定后，他让我仔细端详他，要我猜一猜他是谁。我努力回忆着，过了好半天，仍然认不出来。我难为情地摇摇头。他却对我笑了笑。我一把抓住他大喊一声：“曹明！”他什么都变了，只有当年他那深深印在我心中的笑容却一点也没变！

“啊，曹明！”我声音嘶哑了。

他立刻把我抱住，哭了。他不断他说：“见了你！我就想大哭一场。”

原来，他回国后一直在山西一个农村当农民，这次是到北京来上访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的。

这年2月，当年的小鬼、现已两鬓斑白的钟骏华出差来北京，也到我家来看我。他在成都当一个供销社的书记，他是我们战友中能在我们落实政策之前就入了党的少数几人之一。这些年来，每逢春节他总要托人捎给我一些充满兄弟情谊的土产品。这次是亲自带了泸州大曲和他爱人张雪明亲手做的四川腊肉来“探亲”的，喝着家乡酒我们一起回忆了那次反甄别斗争！

第十一章 602 战俘营——回国支队

孤岛上的群英会

1942年4月8日，巨济岛第71集中营里的238名中国战俘中严正拒绝了美方强行审查甄别战俘的命令，庄严地表达了坚决回归祖国的集体意志。美方只得将我们238人作为“集体要求回国战俘”送离“71”。

五辆十轮军用卡车向海边驶去，后面跟着押送我们的装甲车。

我和钟俊华、曹明等40多名战士队战俘站在第一辆卡车前头。迎面吹来的风咸味愈来愈重，海岸似乎愈来愈近了。

车队越过一个石头山梁，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显现在远方，使我们这些被长时间关押在山沟里的囚徒心情为之一振：多么宽广的世界，多么自由的空间！那一群群在海上翱翔的白色海鸥，多么令人羡慕！它们尽情地欢叫着，不理睬人间还有没有战争悲剧。

啊，海上还停有几艘舰船，我们不禁狂喜起来，那是送我们回国的海船吧！眼看我们快驶向它们了，但是卡车却拐进了通向另一条山沟的公路。大海、舰船、海鸥又从我们视线中消失了。

我们的心沉下去了，卡车开向一个显然是刚建起来的集中营营地。营外还到处倒放着没用上的电杆，带刺的铁丝盘条、固定铁丝网用的水泥柱子。四周的岗楼顶上的铁皮还没生锈，正在阳光下闪亮。

在较平坦的土坡上，堆放着尚未打开的草绿色帐篷，显然是等着我们自己支起来居住。营门口堆放着铁炉子、大锅、用草袋装的粮食、蔬菜、墨鱼干，显然是在等着我们自己建灶起伙。

看来，我们确实是不会被立即交换回国了。卡车驶近大门了，我看清上面挂的那块不大的牌子上写着“NO. 602P. W. Camp.”（第602号战俘营）。

站在联队部门口看着我们下车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红脸膛上尉和一个少尉、一个上士。

老孙领着我走向那位上尉。我向上尉介绍了：孙少校——我们“回国战俘总代表”和我自己——“回国战俘总翻译”。

他自我介绍姓博托。又把少尉、上士介绍给我们，说少尉负责管理生活用品、医疗，上士负责伙房和卫生。

博托上尉说：“你们是第一批送来的要回大陆的战俘，很快所有志愿回国的中国战俘都将集中在这里。我知道中国战俘中主要负责军官都在你们中

间，我就全权委托你们负责这个战俘营的全部自治管理工作。我仅负责向你们提供生活物资及安全警戒。”

我试探着问他：“请问上尉先生，我们遣返回国的日期定下来了吗？”他摇头说：“无可奉告。我只知道你们将在这里住下去，直到在板门店的和谈代表们完全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为止。”

我和老孙回到难友们的队列前。老孙将情况简单告诉了大家，然后说：“我们恐怕要有个长期思想准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立即行动起来，支好帐篷，建好伙房，做好饭菜，迎接即将前来团聚的难友们。他们在“72”、“86”、“70”受尽折磨，我们要尽可能让他们一来就住进帐篷吃饱、穿暖！”

难友们分头忙活起来，在地下党委的统一指挥下有条不紊地抓紧建设营场，我们一面干活，一面焦急地期待着自己熟悉的难友能早点到来，战士队的同志们特别希望“86”能有较多的难友脱离苦海。我思念着关在“72”军官队的姜瑞溥、金甫和原来86联队部的郭乃坚、高化龙、杨永成等战友。

不久，装载难友们的卡车接连不断地开来了。我们涌向前去，打开车槽，扶着那些被折磨得行动困难的难友们下车。许多难友在车上就流下了眼泪，那些彼此熟悉又互相日夜思念着的难友们，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那种情景使我想起1948年夏天，我从苦难深重的蒋管区通过封锁线第一脚踏上解放区的土地时的心情，那时我真想跪下来亲吻那块圣洁的土地！对于从叛徒特务白色恐怖下拼死冲出来的难友们，当时他们那种回到亲人怀抱的心情我很理解，尽管这里仍是在孤岛上，仍是在铁丝网中。

但是，我更深地理解他们的感情却是在几天以后。那时我才详尽地知道了他们在甄别前和甄别中的种种可怕的遭遇！

一天黄昏，我终于在一辆从“72”开来的车上找到了由几个难友托抱着的姜瑞溥。

听到我动情的呼唤，他使劲睁开血肿的双眼，看清了我。我抓着他双手摇晃着，用手巾擦着他那无声的泪水，小心地和大家一起扶他下车，扶进重伤员住的帐篷。

从各个中国战俘集中营送来“602”的难友总共才4000多人，我们不能相信有2多名志愿军战俘中仅只有1/4的人要回归祖国。但是，博托上尉告诉我除釜山伤病战俘营外，全部中国战俘包括釜山第10收容所都已甄别完毕，该送来的都来了。

地下党委开会研究了严峻的形势，做出如下决定：

在各大队分别召开控诉会，收集整理敌人在这次血腥的“四八甄别”中的罪行。

公开隆重举行全集中营的追悼大会，追悼在这次反对强行甄别、争取回国斗争中的死难烈士。

举行游行示威，最强烈地抗议美方采取一系列卑鄙恶劣手段强迫扣留战俘的滔天罪行。

向美军管理当局提出强烈要求：由我们派代表前去调查在这次甄别中发生的全部屠杀事件，严惩杀人凶手。按照我们在4月6日提交的紧急信中具体建议，重新调查战俘的个人志愿，尽快把那些在其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未能表达回国志愿的战俘送来“602”。

最后，党委还决定尽快派人到64野战医院和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取得联系，共同行动。

悼念血腥“甄别”中被惨害的烈士

在各大队的控诉大会上，难友们沉痛而详细地控诉了在甄别中发生在“72”、“86”、“70”各联队的暴行和死难烈士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特别感人的是林学逋、阳文华、戚忠常等烈士临牺牲前的浩然正气。据“72”的战友们说，林学逋烈士是在4月7日晚上叛徒搞的一次假甄别中被剖腹挖心的。

那天傍晚，叛徒们把他们大队的战俘集中在广场上宣布：“联合国军说了，凡是要回大陆的，现在就到大门口去上车。”林学逋见大家有疑虑便站出来高呼：“要回祖国的跟我走。”当即有20多名难友跟他向大门口冲去。他们立刻陷入了狗腿子的重围，全部被打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双臂，拽到C.I.E学校的大礼堂“过堂”。

当时，各大队被这样抓来“死心踏地的共党分子”一共200多名。林学逋被带到讲台上站在耶稣十字架下。联队副李大安手持美军伍牧师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逋，要他回答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林学逋挺胸坚定他说：“要回大陆。”

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刻的字留下！”说罢，使用匕首将林学逋在几天前被捆在帐篷柱子上硬刺上去的“杀朱拔毛”几个字，从左臂上连肉一起削下去。

李大安狞笑着又问：“到底去哪里？”

林学逋忍痛高呼：“回祖国！”李大安又将他右臂上刺的“反共抗俄”连连带肉一同挖下。林学逋昏死过去。

李大安叫人端来冷水把他喷醒，用匕首对着他的胸膛，咬着牙再问：“到底去哪里？”

林学逋看了看匕首，用最后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没等他喊完，就被李大安的匕首刺死。

李大安剖开了烈士的胸膛，挖出了烈士的还在颤动的鲜红的心！然后，用匕首挑着它狂喊：“看见了吗？谁要回大陆，就这样去找毛泽东！”这两条眼发红的疯狗在大礼堂喊完又跑到许多帐篷里去狂喊。

在第二天美军去“审查甄别”前，各大队都对敢于要求回国的难友毒刑拷打。

姜瑞溥在控诉中愤怒地揭发了叛徒们的另一桩罪行：

4月8日早上，叛徒李大安亲自带着一群狗腿子来到军官队单独关押着从70联队押回来的七个“共党暴乱分子”的帐篷里。首先是阳文华的国民党军校同学路禄上前将阳文华拉出来问道：“阳文华，你还认识我吗？你我都是蒋总统的学生，想不到你竟然要回大陆！”

阳文华怒视了路禄一眼说：“大陆是我中华祖国，我为什么不能回……”

狗叛徒路禄不等阳文华说完，就一铁棍子将他打翻，然后又吊起来毒打，阳文华愤怒地斥责路禄无耻。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壮烈死去。

接着，李大安又领着狗腿子，一边用棒子照着他们劈头乱打，一边狂喊：“我叫你们回大陆，我叫你们去找毛泽东！”

韩子建高喊：“拼了，咱们和这群疯狗拼了！”大家便奋起夺取敌人的凶器，但是，寡不敌众，很快全被打倒在地。

李大安将阳文华烈士的心也挖了出来，又将他的遗体拖出去示众，被正在营门口“审查甄别”的美军看见。几个美军过来制止了一下，并叫来一些正准备上车的难友，把奄奄一息的六个人扶上了开往“602”的卡车。

从“86”冒死冲出来的何雪泉揭发说，在前两个月不少难友被寒流冻病之时，叛徒们让大家广泛签名，请求美军管理当局发放棉衣。等大家签完名，他们将申请棉衣的内容换成了申请去台湾，并公开张贴出来。叛徒们告诉大家：“这份大家签了名的申请书已送交板门店共方代表，共方已经知道你们誓死不回大陆了，你们再要回大陆，只能当作派遣回去的间谍！”这个恶毒的欺骗和陷害吓得许多难友在这次审查时，不敢要求回国。

郭乃坚揭发说，叛徒们将一位坚决不肯刻字的难友掐死后吊在厕所里，谎报是自杀，又搞了个假绝命书。把自杀原因说成是怕去不了台湾。尽管C.I.D的刑事审讯官员在张翻译协助下侦破了真相，美军当局对凶犯仍然不予惩处。那以后，又整死了五六名坚持回国的难友，以此造成严重的威胁……

我们收集整理了敌人犯下的种种血腥罪行，收集了各集中营的死难烈士名单，起草了给杜德的《严重抗议与紧急要求书》，抓紧了追悼大会和示威游行的筹备工作。老孙和我与博托几次交涉，要来了一些白纸、铁丝、木板和纱布。

4月中旬开始，我们连续几天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游行示威。在举行追悼会和示威之前，我们将抗议书递交博托上尉，请他转呈杜德将军，并通知他我们要开追悼会和示威的决心，希望他能理解我们的心情，避免发生新的冲突。

头一天，我们面向大门，设置了灵堂，顶上挂着用中、英文写的横幅：“沉痛追悼在‘四八血腥甄别’中英勇就义的死难烈士！”在横幅下面，正中是烈士名单，两旁是大幅挽联：

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

囚笼中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

再下面是直径达二米的几个白色花圈。4000多名难友戴上用手纸做的白色小花，肃立在灵堂前默哀，唱了《国歌》、《挽歌》，听了地下党委写的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促人奋起的悼词。

举行过追悼仪式，大家举着横幅、烈士名单、挽联、花圈，排成长队沿着铁丝网游行示威，一面唱挽歌，一面喊口号。队伍几乎首尾相接，排满了铁丝网的周围，声势十分浩大。大家一方面沉痛悲愤，一方面又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这支回国队伍这么壮大而振奋。

可能是慑于大家的愤怒情绪和美国不愿再制造新的血案以造成政治上被动，这天全部站岗的伪军和巡逻的美军都很老实，既未大声斥骂，也没有投掷毒气弹，有的甚至暗暗地向我们竖起大拇指。

在游行队伍里走着的一个年仅17岁的战俘，他的名字本来已写上烈士名单，却意外地在追悼会前夕从监狱中被押来，他就是张达。在野战医院丁先文自杀未成被送到“71”后，张达也要求去“71”，和美军争执起来，愤怒地回敬了美军对他的拳打脚踢。他把一个美军的眼镜都打掉了。结果，被当成刑事犯押进监狱。一个美军在把他押上警车时故意向医院的战俘宣布：“这个暴动分子现在就拉出去枪毙。”医院的难友通过甄别来到“602”后，汇报了“张达被敌人枪杀”的消息。

第二天，“602”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

两块横幅英文标语上写着：“强烈抗议美方制造四八甄别血腥惨案！”“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严惩杀人凶手！”横幅标语是正面朝外挂在大门两旁铁丝网上的。

吴春生、张辉忠等还赶制了两幅大型漫画。一幅画的是林学逵烈士英勇就义场面。

高大威严，怒目圆睁的林学逵烈士尽管双臂被反剪捆绑，衣衫被撕破，满身鞭痕，两臂鲜血淋漓，满头冷汗，但仍昂首挺胸，面对一把刺至胸膛的大匕首巍然不动。身材矮小，长有狗尾巴、面目狰狞的李大安手举着那把上面醒目地刻有“U.S”字样的大匕首，狂吠着：“我要你去台湾！”（英文）。而林学逵的回答：“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英文）是用大红字母写的，它横贯全画顶部。另一幅画上左侧是大脑袋、小身子，身穿美军军装、头戴牧师方帽，胸挂十字架的伍牧师。他正狞笑着用铁丝牵着一群长着人面的狼狗。这些恶狗背上印有“P.G”字样，张着血盆大口，正吞噬着被五花大绑的、躺在地上的一群中国战俘。这些战俘身上印有“P.W”字样，从他们口中呼喊出来的是横贯全画上部的红色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英文）

这两张巨幅漫画也挂在了营门两侧，吸引了美军、伪军拥来观看。几个美军还指手划脚地小声议论起来。

博托上尉在漫画张挂之前就认真看了画，他对我说：“张，我不能不佩服在你的同伴中竟有这么能干的画家。但是，我却不能同意它的有损我的国家声誉的内容！”

“谢谢你对我的同伴的绘画才能的夸奖。至于它的内容，只不过较尖锐地叙述了一个确实发生了的流血事件，我相信您会同意我们不是在故意无中生有！我一向尊重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相信您也是乐于尊重事实的。”

“我知道在审查甄别时，确实发生过流血事件，但据了解那是你的同胞之间因政治信仰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我听说过你们民族从来是喜欢打内战的，比如，几年前在你们国土上发生了死伤上千万人的内战，总不能说是我的国家的罪过罢！”

“博托先生，没想到您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所研究。但如果您知道蒋介石拿来打共产党的武器也都和画上的那把匕首一样印有U.S.字样，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反正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没有到大陆上去参加战斗！”

“是的，我们一向把美国人民、包括军人在内与你们的政府区分开。我们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我的中学老师中就有美国人，我的英语就是他们教给我的，现在我还很感谢很想念他们。极为遗憾的是你的政府中的掌权者——而不是你的国家，这些年来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但，即使如此，我们反对的也只是你们政府的这种政策。”

博托举起双手说：“哦，张，我被你俘虏了！但愿我们之间能够合作，在我的任职期间能平安无事！”

我说：“我们将尽可能不使你个人为难！也希望您在您的职权范围内对我的难友们的合理愿望予以支持！”

他点点头。

昭昭忠骨埋何处

在我们和朝鲜人民军各“回国战俘营”的战友们举行了大规模抗议行动之后，美方为平息战俘营的怒潮做了一点让步，答应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同意我们去墓地祭吊我们的烈士和到“72”、“86”寻找死难烈士的遗骸、遗迹。

4月底的一天，我们在美军带领下分头出发，我随各大队派出的共10名代表前去为烈士扫墓。我们坐着一辆中型吉普，后面跟着一卡车的美国兵。绕过一个山沟，在一片面向大海的荒坡上，有一片低矮的十字架，这就是墓地。

领我们去的一个美军军官，指着一片新土说：“这些就是最近掩埋的中国战俘，其中有从医院太平间拉来的。”

我们数了一下，共有12个十字架。我们的烈士没有一个是信仰上帝的，决不会料到自己会长眠在基督的十字架下！

“烈士们已经永远埋在异国的土地上了，伴随他们的只有这永不停息的海潮声，只有这些乱石和荒草！”想到这些，大家的心都碎了。

我们把带来的小小花圈放在烈士的十字架下，又在附近挖了12颗小树苗移栽在十字架旁。临别时，我们恭恭敬敬地向烈士们鞠躬告别。

整整34年过去了，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实现了那天在烈士墓前，曾经对烈士们的英灵许下的诺言：“安息吧！战友！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回到祖国，一定要将你们为人民做出的牺牲和对祖国的忠诚，告诉党和人民！”

如今那些小树苗是长大了？还是枯死了？烈士的英灵是回来了，还是仍飘落在异国他乡？

下午，去“72”、“86”寻找烈士遗骸的同志们空着手回来了。他们找到那些由难友们在控诉会上揭发的掩埋烈士们尸体的地点，用军用铁镐挖掘了半天，结果只发现一些头发和衣服碎片。显然敌人已经移走了尸体。

据说在1943年被我们抓获的空降到东北当特务的原“72”的战俘中的叛徒曾供认：那些烈士的遗体在我们派人去之前又被挖出来，大卸八块装入粪桶，盖上大粪倒进了大海。

那么，这些不知名的烈士更为凄惨，他们的遗骸早已化为太平洋的苦水，而他们的英名却至今不为祖国所知。

成立“共产主义团结会”

不久，我们那些去海边清倒垃圾的难友在垃圾场上捡到几份美军《星条报》，带回来给我。我在其中一张较近期的报上看到了有关和谈已完全中断陷入僵局的消息。报道中说我方代表在板门店和谈会议上对美方的强行血腥甄别，强行扣留数万名所谓“拒绝遣返”的中朝战俘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这个报道使我们大为激动。一方面感到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向全世界揭露美方在战俘营的严重罪行，以支持我们的和谈代表；一方面我们原来以为可能很快交换回国的幻想被打消了，必须做好长期承受集中营的痛苦生活和长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也使我更钦佩集中营地下党委的远见，他们一来“602”就告诉斗争骨干，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充分思想准备。他们教育大家说：“我们党在艰苦斗争中总是强调：要做最坏的打算，力争最好的结果！”因此，他们在“602回国支队”建立之初，就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努力健全组织，巩固内部，准备迎接长期艰苦的斗争。

健全组织、巩固内部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重新建立地下党组织。

对于这个组织的名称，大家很费了一番脑筋。一方面，几乎所有参战

的部队都有被俘的同志在中国战俘营里，当时来到回国支队的五千多名战友互相都不很熟悉，连难友本人是否是共产党员都靠自报；另一方面，汇集到“602”来的各战俘营原有的各种地下斗争组织又很多，比如：地下党支部、地下团支部、爱国主义小组、回国小组、五一同盟、七一同盟等等。加上被俘后一年多来难友中政治状况变化很大：许多原在部队不是党员的同志，特别是很多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在斗争中表现很突出，而有些原来是共产党员的却表现一般，个别的甚至有丧失气节的行为。如果仅以原部队党员作为成员组成地下党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的。

那时，还考虑到如果不能得到党中央认可，作为集中营的正式党组织是否合法的问题。

最后，赵政委根据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提议将领导集中营斗争的核心组织定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这既表明它的政治方向，又表明它的任务和宗旨；同时，也有利于团结各个部队和各个地下斗争组织成员有利于发展非党群众加入组织。

当时起草的《团结会章程》基本上是按照党章的内容制定的。会员的标准与发展入会手续，和党员的标准与发展党员手续完全一样，只是更加强调了保持革命斗争气节和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要求。

当时，明确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实际上是起着地下共产党的作用，它的各级组织也完全按照党组织形式设立，各中队有支部，各大队有分委会，全支队设总委会，各级组织都设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保卫委员、敌工委员、机要秘书。总委会则设有相应的组织组、宣传组、保卫组、敌工组、机要秘书组等，由各常委分管。

赵政委任总委书记，杜岗、魏林、孙振冠、顾则圣、马兴旺等任副书记，总委委员多由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原营、连指导员担任。我记得总委组织委员是陈吉庆，宣传委员是张城垣（金甫），保卫委员是李喜尔，敌工委员由孙振冠兼任。总委机要秘书组由黎子颖负责，敌工组由我负责，高化龙、安宝元等同志都参加了敌工组。我还被总委任命为“对敌总翻译”。对美方则我的职务为“回国支队”的支队长，必要时可参加总委扩大会议。

共产主义团结会向全体战友宣布了“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从此，在共产主义团结会领导下，中国战俘的对敌斗争便从来自发的、分散的斗争进入了有统一组织领导，团结一致的崭新阶段。

1942年的五一劳动节来临了。总委决定要隆重庆祝这个国际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再次向敌人宣告我们的政治选择，并检阅我们的队伍，激励我们的战友去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理想而奋斗！

我们面向大门搭了一个“舞台”，挂上用中、英文写的“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横幅。两旁挂有“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中英文标语。

全体战友按大队、中队、小队列队，坐在“舞台”前的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大家都戴上了缀有五星的八角军帽，军容整齐，精神抖擞。

当大会主持人黎子颖同志根据总委“五一节筹委会”事先的决定，宣布：“下面请总翻译张泽石同志讲话”时，我站到了台前。

看着台下望着我的这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聚到一起来的亲爱的战友们，这些和我生死与共的骨肉兄弟们，我的心情异常激动：祖国有这么好多好儿女，工人阶级有这么好的钢铁战士，难道不是祖国的骄傲，党的光荣么？

祖国人民知道这一切么？知道远在海外的这个死亡之岛上还有几千名她的儿女正在敌人枪口下和全国人民一起纪念这个劳动人民的战斗节日么？

我于是大声地讲起来，面对着近 6000 名难友，也面对着亲爱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这样大的场面上讲演，它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亲爱的战友们！在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追求解放的战斗节日里，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似乎听到了天安门前万众欢腾的声音，似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起的无数象征和平、自由的白鸽和彩色气球！此时此刻，我们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解放军战友们正列队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检阅，请听听他们那震撼大地的前进的脚步声吧！它再次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祖国已经从百年的苦难中，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为了保卫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上百万的祖国优秀儿女又来到抗美援朝前线，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贡献出自己的鲜血、生命、自由和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几千名在集中营里，在敌人后方斗争着的战士。

“亲爱的战友们，尽管我们不能到天安门城楼下去亲身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检阅，但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是和全国人民一起在接受着检阅的。尽管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尽管敌人的机枪、刺刀正对着我们，我们却仍然坚持在这同一时刻和全国人民一起庆祝自己的战斗节日！这就向敌人、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我们永远和祖国人民在一起！

我们也深深相信：祖国人民也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庆祝五一大会最后一项是演出由高化龙、骆星一编剧，彭林，余国藩主演活报剧《华尔街之梦》和宣传队排练的《祖国颂》诗歌大联唱。当我认出在《华尔街之梦》里主演杜勒斯的竟是姜瑞溥时，对他这么快就从重伤中恢复过来的顽强生命力，感到万分惊讶！而且，他演得还真有点艺术性，惹得全场不时哄笑和咒骂。

第十二章 震惊世界的活捉杜德将军事件

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发出指令

五一节刚过，我们派去医院和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联系的同志给总委会带回了重要的消息：为揭露敌人强迫扣留战俘的血腥罪行，挫败敌人破坏和谈的阴谋，“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做出决定：活捉敌酋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方在战俘营犯下的种种罪行。我们“602”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斗争，要求面见杜德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并在见到杜德后立即停止绝食，给杜德造成唯有他亲自出面，我们才能相信美方管理当局的诚意而停止斗争的印象，以便朝鲜人民军同志在他前去谈判时设法活捉他。

虽然我们的代表曾要求把活捉杜德的任务交给我们，但被人民军同志婉言拒绝了。

他们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危险的任务，你们人数较少，又刚集中在一起，力量较弱，更重要的是你们为朝鲜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能让你们再冒这么大的危险。”

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传达了 this 任务。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表示坚决执行地下行动总委会做出的决定。然后，详细研究了行动计划。

1942年4月3日，我们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致杜德将军函。

4月4日，我们搞了一天游行示威。

4月4日，“602”开始全体绝食，面向公路和铁丝网上挂满了战俘们的饭盒，运来的粮食、蔬菜被堆放在大门外。除了我们的值班纠察队员和联队部工作人员外，整个战俘营见不到战俘活动。

老孙和我多次请博托上尉与杜德将军联系，表示我们不面见杜德将军决不停止绝食的决心。

当天下午博托通知，杜德同意接我们的代表前去司令部面谈。我们以代表们安全无保证为由，请杜德将军前来谈判。

4月6日上午，杜德准将带了他的中校副官和一个排的卫兵坐车来到“602”大门外，老孙和我被博托召集到联队部，说杜德将军决定亲自接见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

我们表示：请将军进入战俘营到联队部来谈判。博托说，同样出于安全的原因，请我们到大门口会谈。

于是，这次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602”的大门口开始了。

我们站到大门内等着。博托前去将杜德将军接下车。我注意观察这位近两个月来一直只是在书面上打交道的美国将军。他身材粗壮，脸色红润，那副玳瑁框的眼镜使他增添了些斯文。看来这位将军还十分注意外表，他戎装整齐，金色的肩章闪闪发光，很有点气派。

那位跟在他后面的手持一个文件夹和一本厚书的中校副官是个瘦高挑，一比之下，相形见绌。

他们的卫兵见杜德下车，立即从车上跳下来，排成扇形，如临大敌地持枪护卫着他们的将军。

见到这个架势，我和老孙相视而笑，想不到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战俘在铁丝网里竟然会对将军造成威胁！

当杜德和中校走到大门口时，老孙首先对杜德说：“欢迎将军阁下不辞辛劳前来我们602集中营！”

听我翻译之后，杜德微微点了一下头说：“我一向是尊重中国人的。你们有何要求？请讲！”

“我们想请阁下亲自视察一下我们的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和我们的伤病员缺医少药的痛苦处境。我们希望能得到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应给予我们的人道主义待遇，而贵国是在这个公约上签了字的。”

“我们一贯遵守日内瓦公约，凡公约上规定的，我们在运输和人员条件紧张情况下，已尽了最大努力予以实现，我请我的副官将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给你们读一遍。”

于是，那位中校煞有介事地翻着手那本日内瓦公约，找到有关条文，然后开始慢条斯里地朗读起来，而杜德这时掏出了指甲刀修饰着他那双肥厚

多毛的手上的指甲。

我一面听，一面转译给老孙。刚一结束，老孙就说：“显然，我们目前受到的待遇远未达到公约的规定。比如，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习惯吃大麦，而连大麦也供应不足，每天两个半碗饭所提供的热量，远远不够一个正常人的需要。蔬菜很少，质量极差，肉类更是罕见。如果贵国确有困难，希望通知我们国家，我们相信中国会立即协助你们改善我们这种半饥饿状态。”

杜德听了翻译的最后几句话，脸涨得更红了，不高兴地说：“对于你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异常的食量，我将予以考虑，尽快给予解决。既然你们总是感到饥饿，我认为你们更没有必要采取绝食行动，再增加你们伙伴们的难受，在改善医疗条件方面，我也将尽快解决。”

“如果将军阁下能认真解决我们的最低要求，我们当然乐于立即恢复进食！”

杜德正色道：“我对自己的话完全负责！”

老孙看了我一眼说：“那么我们愿意相信阁下的诚意，再次感谢阁下能亲自前来。”

杜德满意地点点头，坐汽车走了。

1942年4月7日黄昏，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少校神色匆匆地坐着敞篷吉普车来到“602”。我以为他是来传达杜德关于我们昨天所提要求的具体答复，但他却要我和孙振冠立即跟他坐车走。

对我提的“到哪儿去？去干什么？”等问题，他急躁地回答说：“杜德将军召集各战俘营的代表开会，我只奉命将你们两位送去。”

我和老孙又惊又喜，看来事态正在按照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的安排发展。

我们急忙带上“大事记”、备忘录、抗议书等必要文件上了车。我幸好没有忘记随身带着那本英日字典。

我和老孙都没有料到我们会从此一去不复返，会这么匆匆忙忙地离开“602”，竟然在一年多之后回到祖国时才和几千骨肉兄弟再次相见。

英雄的76集中营

傍晚，我和孙振冠坐着巨济岛美军司令部詹姆斯少校驾驶的敞篷吉普车，离开了602中国战俘集中营。

车子急速地沿着山谷里的公路奔驰，海风猛烈吹着，低低的乌云追赶着我们，沿途两旁一个又一个集中营内人声沸腾。在暮色中，只见难友们臂挽着臂，有节奏地摆动着身体，高唱人民军战歌，见我们向他们挥动八角红军帽致意，他们也雀跃着向我们挥手欢呼。看来他们都知道岛上发生了重大事件。

快到76集中营时，车子慢了下来，公路两侧排满了坦克、装甲车、宪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都是持枪在手，好像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我们的车子就在两排整齐的刺刀丛中缓缓前进。我忽然感到老孙和我是作为胜利者，代表中国人在检阅特殊的仪仗队，不禁下意识地整了整衣帽，更加抖擞起精神。

到了离“76”大门不远的地方，只见几个大探照灯的光柱从对面山坡上集中射向大门内外，照耀得如同白昼。大门边广场上更是黑压压地挤满了各种战车和部队，枪口、炮口都直指铁丝网内，长长的坦克炮筒和无数蠕动着的首盔在探照灯下发出阴森森的蓝光，一群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在暗中更像

鬼影般狰狞。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大门之上一个长达十米，宽两米的巨幅白色横标上面用黑色英文大字写着：“……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将性命难保！”那结尾上好大的一个惊叹号。

车子开到了“76”的大门口。下了车，我才看清大门内张灯结彩。上百名穿着自己改制的人民军军装的朝鲜战友们组成两道人墙，正列队欢迎代表们的到来。他们人人手执纸做的朝中国旗和彩纸带。

当我们无比兴奋地进入大门后，战友们用不熟练的中国话齐声高呼：“朝鲜——中国！”“金日成——毛泽东！”“热烈欢迎中国战友！”无数五彩纸花、纸带纷纷洒落在我们身上，落在我们流着激动热泪的脸上。

我们也禁不住用朝语高喊：“向英雄的朝鲜战友致敬！”“团结战斗！”“打倒美帝！”谁也不管就在我们背后有无数子弹上膛的枪炮！

我们被热情地簇拥看到了专为代表预备的帐篷内，见到了各朝鲜战俘营的代表和女战俘代表。大家互相热烈握手、拥抱！抢着用朝文、中文、英文混在一起的“国际语言”互相表达胜利的喜悦和兄弟的情谊。

然后，“76”的战友们向我们详述了活捉杜德将军的精彩场面。我们一面听他们的讲述，一面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深深地被朝鲜战友们的英雄行为所感动！

智擒敌酋

1942年4月7日这天，已经是“76”的战友们坚持要求杜德将军亲自前来谈判而举行示威游行的第三天了。下午一点半钟，杜德终于在一个排的全副武装警卫下坐着防弹装甲车来到“76”的大门口，然后隔着紧闭的大门和战俘代表谈判。杜德两旁的警卫人员则抵近大门，端着冲锋枪做出随时可以开枪射击的姿势。

“76”的代表当即指出：“在这种气氛中根本不可能进行谈判！我们不理解堂堂的美国将军为什么害怕手无寸铁的战俘！”

杜德左右看看士兵的阵势，又朝营内观察了一下，就挥手让士兵们把枪收起来靠后站立，仅剩下他的那位手拿《日内瓦公约》的随从副官站在身边。

于是，代表们严肃地提出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种种罪行，要求杜德认罪。

杜德开始还假装认真地叫副官查阅有关的条文，并逐条狡辩，激烈争论的时间长了，杜德就有些不耐烦了。他让副官代他回答，而他自己则又掏出指甲刀来修剪指甲，偶尔摇摇头，一副漫不经心、若无其事的样子。

警卫士兵们也开始松懈起来，散乱地站在后面交头接耳。

就在这时，要去海边倒粪便的清洁队抬着粪桶出来了。大门打开，杜德和副官只好捂着鼻子退在旁边等候战俘们出去。

眼看只剩最后十来个战俘了，突然这十来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一下子扔下粪桶将杜德和副官围住，迅速把他们推进了大门。

当敢死队员们正急速回身将大门关上时，那个副官先死死抱住门柱，后又灵巧地蹲下身从人缝中冲了出去。在门旁的战俘代表们立即用铁杠插上大门。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那些站在门外的警卫竟完全吓呆了，等他们清醒过来持枪冲向大门口时，只看见除四名敢死队员抓着杜德外，广场上已空无一人了。

肥胖的杜德将军极力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呼喊：“SAVE ME！SAVE ME！（救救我）”但他哪里挣得脱抓紧了他四肢并抬离地面的四个壮士的铁臂。勇士们就这样将杜德将军飞速地抬走了。

与此同时，在大门上空立即竖起了刚才看见的巨幅横标：“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我们和他谈判结束，就安全地交还给你们。如果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门外的美军官兵慌乱已极。不久，警报声凄厉地吼叫起来，坦克、装甲车、宪兵、步兵、海军陆战队全开来了，层层包围了“76”；直升机也飞到“76”上空，盘旋低飞。

但这时由杜德将军签署的命令也由代表们送了出来：“我命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绝对禁止开枪。我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雷边中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适当撤离76号集中营。”

随即杜德传令将电话接入“76”，由他直接进行指挥；接着又运来了杜德所需的食物和各种生活用具，以及召开战俘代表大会所需的用品。

“我们总算尽可能地为这位‘特级战俘’、这位‘战俘的战俘’做出了妥善的安置！”“76”的代表们这样结束了他们的介绍。

我们忍不住和大家起哈哈大笑起来，真是开心啊！被俘后一年来还未曾这么笑过呢！

将军——阶下囚

“76”的代表们介绍完情况，就领我们去看杜德。

只见在营内中心广场上专门支起了一座崭新的帐篷，四周站着我们自己的警卫人员，以保护他的安全。

战友们撩起门帘，让我们先进去。嗨！布置得真周到，地上铺了军用毛毯当地毯，墙上也挂了军毯用来保温。岛上4月初的天气还很凉哩！何况杜德将军目前的心情恐怕比天气更凄凉。靠里面又有白布隔出了一个盥洗间和便所，篷内还摆上了办公桌、椅、行军床，在那张靠床的桌子上还摆了一束插在罐头筒里的野菊花！

在集中营里看见这种陈设真是十分新鲜，这座“将军别墅”比起我们住的囚室，确有天地之别。难怪第二天当刚被派来接任杜德职务的美国第一军参谋长柯尔逊准将在电话里发愁地问杜德将军受到的待遇如何时，他竟得意地回答：“您不用担心，我在这里生活得像中国的皇帝一样！”

我们进去之时，杜德将军正双臂叠在脑后仰卧在行军床上，大块头的身躯深深陷在帆布里，将军服上衣的钮扣都扯掉了，金色的将军军衔肩章也只剩下几根线，从肩旁搭拉下来，显见他被抓获时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杜德这副样子实在有损将军的仪容，远远不像他昨天接见我们时那么有威严了。

他虽听见了动静，却仍装着闭目养神，直到我们走到床前也一动不动。

我们互相看了看，老孙朝我向杜德摆了摆手，我会意地笑了笑，便用英语向杜德客气地喊了声：

“喂！将军阁下，我们来看看您。”

“啊，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杜德睁开眼，像是刚知道我们进来的样子！急忙坐起来说着，有些艰难地把腿移下床，要站起来。

“啊，还是请坐着吧！我们是中国战俘代表，昨天我们见过面了。”

“昨天？是的，昨天我答应过要解决你们的一些合理要求。”

“现在，我们正等着您的实际行动呢！我们不希望仍像以往那样——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让你的部下又来向我们扔毒气弹，甚至向我们开枪！”

“那是，是我对部下管教不严。”

“但，您看我们的战士对您怎么样？”我指着屋里的陈设说。

“是的，我确实看到真正优待俘虏的是你们共产党人。”

“您懂得这点很简单哪。要是您的李奇微司令和杜勒斯国务卿也来体验一下就更好了。”

“是的，你们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您太客气了！好吧，咱们在代表大会上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吧。再见！”

“再见！”

我们强忍着，直到走出帐篷才捧腹大笑起来，一个朝鲜战友擦着泪水说：“美国的将军也不过如此，就像你们毛主席说的，是纸老虎。”

战俘——座上宾

接着，“76”的代表领我们去会见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的总领导人朴相显同志。

他是朝鲜被俘战友中级别最高的，战前，曾任道委书记（相当中国的省委书记）。

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了他住的帐篷。

满头银发的老朴同志站起来，目光慈祥地端详着我俩，急忙走过来，亲切地拥抱了我们，同时用朝语说：“啊，中古东母，急文滚东母！”（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然后，用手势请我们席地而坐。

我们用通过“76”代表和我互用英语转译成汉语或朝语的方式交谈着。

他先询问了“602”全体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思想状况。然后说：“对于中国战友们的英勇斗争我是很钦佩的。我还要当面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对中国战友的斗争支持太少了！”

我们则对朝鲜战友给予我们的一贯支持和鼓舞表示了深切的感谢！老孙说：“这次，在您的直接领导下，朝鲜战友完成了一举活捉杜德这件将载入人类战争史的伟大创举，给了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给了全体朝中难友以巨大鼓舞！我们将努力学习朝鲜战友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

“啊，这次活捉杜德的胜利是我们全体朝中战友共同努力的斗争成果！它只是整个朝鲜战争朝中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的一个小侧面！”老朴同志笑着说，然后又对“76”的代表用朝语说了几句话。

“76”的代表对我眨了下眼，低声说：“老朴同志要宴请你们呢！”说完出去吩咐了一下，立即有两位朝鲜战友端上来两盘热气腾腾的白面的饺子，这确实使我们大吃一惊！

老朴微笑着向我们摊开双手说：“请吧，请用餐吧！你们不要感谢我，要不是同志们抓住了杜德，美军送来了白面、肉罐头，我还不知用什么来招待我的尊贵的中国客人呢！”我们非常感动地吃下这顿终生难忘的美餐。

但更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在饭后发生的事：朝鲜战友们领我们进入秘密的地下室，在一个土台上赫然摆着一台收音机！

战友们说明这是他们节衣缩食，用粮食、衣物向李伪军偷偷换来的，老朴同志用双臂搭在老孙和我的肩膀上说：

“亲爱的志愿军战友们，要不是活捉了杜德，想请你们来也不可能哪。

我们没有什么珍贵礼品送你们，就请你们听一听北京的广播吧！”

天哪，北京的广播！我们已经一年多没听见过祖国的声音了！我们急忙凑近收音机，只听见飞越长空而来的电波的沙沙声中，突然响起一个亲切之极的女广播员的声音：“……为了支援朝鲜前线，全国掀起了捐献热潮，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多么遥远而又多么亲近的祖国的声音啊！在远隔大海的异国土地上，在敌人的监牢里，想不到竟能听到祖国母亲的心跳！啊！亲爱的祖国，您是否知道被囚在海外的儿女在多么强烈地思念您啊！我们任无声的泪水泉涌般洒在地下坑洞那冰冷的黄土上。

走出坑洞，我们仍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夜，已根深了。远方，海潮发出低沉的咆哮。在阴森森的锯齿形山脊的上空，透过一团团掠过的薄云，偶尔可以看到北极星在向我们闪烁她的光辉！

我们回到代表团专用帐篷时，帐篷里的朝鲜代表同志们也都没睡。他们三三两两正热烈地交谈着，看那样子也是在互叙旧情。

三位女代表见我们进来，便走过来用朝鲜礼节向我们鞠躬问好。我们忙不迭地还礼。

一位年纪最大、身体有些发胖的代表笑着对我说：“我们在女战俘营常见到您，但没说过话。让我介绍一下吧！”

经她介绍，我们知道了她姓南，另一位姓李的姑娘是她的秘书。她又指着另一位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说：“她叫贞玉姬，是金日成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和您是同行呢！”

我高兴地和玉姬握手，用英语问好。她有点腼腆地说：“在这里见到你们真高兴。

我和你们的姐妹小丫是好朋友，这次她还特意托我给您捎了封信，想不到还真见到了您。”

说完，她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得很小的纸条交给我。我拿着这还散发着她的体温的信很感动，贞玉姬是冒着被搜查的危险完成中国战友的重托的。

我向她们详细地问了小丫的情况，她们抢着说：“小丫妹妹可好啦！爱学习、爱干活，斗争勇敢，不爱哭了。她学朝鲜话可快啦！现在她的朝鲜歌唱得比我们都好了……”

老孙和我听了，都宽慰地笑了，我们的小妹妹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我们请她们回釜山后向小丫问好。

我们一直送她们回到女代表的帐篷。门口站岗的朝鲜战友向我们敬了军礼。女代表们又请我们进去再坐会儿，我们不便影响她们休息，便道别回去了。

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这一天使我激动的事太多了。我想起小丫的信，便取出来读了起来：“泽石大哥哥，我隔着铁丝网，隔着大海，向你问好。这半年多来，我日夜思念的是我年迈的祖母和你。你们的关怀给了我在苦难中坚持活下去的勇气……”字迹变得模糊起来，我流泪了，为自己不能给小丫更多的温暖而歉疚，她是多么渴望着这种温暖啊！正像我为自己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思念我的亲人，我的未婚妻 M，渴望得到她的爱来抚慰我痛苦的灵魂。

朝中战俘代表大会

第二天上午，代表大会正式开始。

会场设在一个新支的帐篷中，布置简单而严肃。在长方形帐篷正中，拼在一起的五张方桌上铺着军毯，周围摆了两排长凳；对着门的大会主席位置上有一把椅子，主席位置后面的墙上并列着用纸做的朝中国旗。

17个战俘营的43名代表围坐在四周，老孙坐在主席旁，我挨着老孙，三位朝鲜女代表依次挨着我们。主席正对的位置是给杜德留着的“被告席”。

大会选出了人民军的师团参谋长李学九为代表团团长，并一致推举志愿军的孙振冠教导员为副团长，接着讨论和通过了大会议程。

杜德将军被叫了进来，他的步履有些艰难，低着头走了进来。主席宣布大会第一项议程，要杜德将军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杜德简要交待了政策：“我们允许你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于是，各朝鲜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他们列举了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美方怎样迫害、虐杀战俘以强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并企图扣留大批人民军和义勇军战俘去当李承晚侵略北朝鲜的炮灰。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将战俘秘密运走，做化学战、细菌战和核子战的试验品。

敌人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被揭发出来，列举的事实都是有时间、地点、有真名真姓的。代表们愈揭发愈悲愤，声泪俱下！有的事实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遭受的苦难，有些比我们更甚啊！对敌人的愤怒与仇恨剧烈地燃烧着我们的心，真想握紧拳头向杜德那肥胖臃肿的脑袋上狠狠砸下去！

而杜德，这个曾经忠实执行了白宫罪恶政策的家伙，在铁的事实前面，惶恐地低着头，他大概是害怕我们充满仇恨的目光吧，我看见他摆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好几次，朝鲜战友用拳头砸在桌子上问他：“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他惊慌地站起来说：“我接任不久，不十分了解战俘营过去发生的事！”说完不敢坐下。

大会主席叫他坐下，并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并不想用你们对待俘虏的手段来对待你。我们尊重你的人格，决不会给你任何侮辱。但，你也要尊重自己，作为美国的将军，应该是有勇气承认事实的。”

杜德显然有些感动，深深地点着头坐下了。

从上午到下午，控诉大会在极为悲愤的气氛中整整进行了六个钟头。会后，为了更有力地控拆敌人的罪行，我们要求将我们的秘书长黎子颖和朝语翻译柳一同志接来参加大会。

杜德立即打电话命令照办。老黎、老柳很快就被送来“76”。我们连夜做了系统发言的准备，我把发言稿子先译成英文。

第三天，4月9日上午，控诉大会继续进行。脸色有些发灰、眼睛大概是由于失眠而发红的杜德被带进会场。大会主席请我代表中国战俘发言。

我站起来，扶着桌子，好久说不出话。我似乎又看见了死难烈士们的英雄形象，又听见了他们在英勇就义前愤怒的呐喊。我在内心呼唤着：“战友们！今天我是在替你们向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血泪控诉啊！”

我从敌人怎样阴险地在中国战俘营内利用叛徒特务来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谈起，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行径。

我揭露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如何将李大安、王顺清等战场投敌的叛徒数十人送往日本东京进行特工训练，带他们逛妓院、下馆子以奖赏他们对祖

国的背叛；又怎样将这些败类送回战俘营，任命他们充当集中营内的联队长、大队长、警备队长等等俘虏官；发给他们匕首、棍棒成立起集中营内的警备队，作为镇压战俘的打手；唆使他们在集中营里采用欺骗、利诱等卑鄙手段发展反动组织，以对战俘实行特务控制；又采用罚跪、罚爬、罚饿、罚苦工、吊打、灌辣椒水，甚至将人裸体放在有玻璃渣的汽油桶内来回滚动等酷刑，用以镇压战俘们的反抗和有组织的地下斗争。

我着重指出：尤为卑鄙、阴险的是美方指使叛徒们用极其恶毒的政治陷害手段来迫使战俘们不敢回国，诸如强迫战俘检举党、团员、干部，强迫党、团员集体写退党、退团声明，强迫战俘集体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强迫战俘写血书要求去台湾、写信辱骂领袖，直到强行在战俘身上刺下永远去不掉的反动字样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我愤怒地控拆美军当局在最后要进行“志愿甄别”时，又唆使叛徒们来一次大规模血腥镇压，让他们先搞一次假甄别，把一些敢于表态回国的战俘事先骗出来加以残酷折磨、惨杀，造成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以致使许多人在真正进行甄别时，不敢表达自己回国志愿。

我的控诉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也仅只是扼要的叙述，一年多来敌人对我们犯下了多么深重的罪行啊！

当我谈到烈士们的壮烈牺牲时，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悲愤，忍不住大声向杜德怒斥道：“你、你这个沾满了战俘鲜血的刽子手，你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吗？你听听烈士们临死前的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懂得什么叫做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吗？知道什么叫做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你以为镇压和屠杀就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就能强迫我们服从你们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吗？妄想！完全是妄想！”

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使我抑制不住年轻人的泪水，我急速转过身去。会场的空气似乎凝固了。那位懂得英语的贞玉姬同志，双手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流出来。

杜德在我的整个控拆过程中一直低着头。这时，他撑着桌沿站起来，声音嘶哑他说：“我，我有责任。”

没有人答理他，会场仍然笼罩着可怕的沉默。杜德有些胆怯地往两旁斜视一眼，又低下了头，等待着新的愤怒的爆发……

老孙站起来对他说：“我们清楚，你作为一个军人，要服从你的政府的命令。对于你犯下的罪行，我们并不认为你本人应负全部责任。但我们希望你能从中真正认识到你的政府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老孙停顿了一下，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愤怒，又说：“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反对你们这么干的。你们实际上是要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播下仇恨的种子。然而，我深信美国人民是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我们希望你做出一些事来弥补你的过错，并替你的政府挽回一些损失！”

当我将这些义正词严而又通情达理的话翻译给杜德听时，杜德不住地点头。

“感谢代表阁下的这一席话。我愿意尽力弥补我的过失。”杜德的声音带着颤抖，我感到老孙的话可能真正打动了他的。

杜德认罪

下午，代表大会起草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书》和《美方战俘管理当局认罪书》。两个文件列述了他们执行美国政府的意图和

在战俘营犯下的各种罪行。

同时，大会经过研究，提出了四项释放杜德的条件，准备第二天一早送交新任巨济岛战俘营总管柯尔逊准将。四项条件是：

- 1、立即停止你的军队的野蛮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大量虐杀、机枪扫射战俘以及用战俘做毒气、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等试验的做法，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 2、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 3、立即停止对数万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 4、立即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本代表团在得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满意的书面答复后，将把杜德将军引渡给贵方。我们等候热情而诚挚的答复。

下午，研究了杜德目前的思想状况和让他在认罪书上签字可能产生的顾虑，决定当晚由代表团长单独和杜德谈判关于签字的问题。目的在于使他进一步认清目前朝鲜和谈形势，了解我们的斗争决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为了争取消除阻止和谈进展的唯一障碍——“战俘问题”，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以减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伤亡和战争负担，并为早日实现全世界渴望的和平做出贡献。通过会下的思想工作，动员他抛开个人顾虑和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一进程，同时决定明天举行全战俘营的静坐示威，促使他下决心。

第四天，4月10日早上，我们送出了给柯尔逊的《朝中战俘代表团关于释放杜德将军的四项条件》的函件，同时举行《认罪书》签字仪式。

大会正要开始，东京盟军总部派来处理杜德事件的波特纳准将来到大巨济岛，并立即要求和杜德将军通电话。电话就在会场里，离我很近，波特纳准将军在电话中的声音听得相当清楚：

“我是司令官波特纳准将，我请杜德将军接电话。”

主席老李同志听了电话示意杜德过来，将话筒递给了他。

“我是杜德，请您指示！”

“啊！杜德将军，您好！”

“您好，波特纳将军！”

“我从东京带来了您的夫人，她要我问候您，她老是啼哭！”

“请告诉她，我很好，不必惦念！”

“将军，请告诉我，他们真的没有伤害您、侮辱您？我十分担心。”

“请相信我我说的是实话，我自己原来也不相信他们会尊重我的人格。但现在，事实使我不能不相信这一点。”

“啊，这就好了，上帝保佑您，尽管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还打算扣留您多久？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帮助您？”

“我不知道，我想代表大会结束后，大概会释放我吧。您唯一能帮助我的就是让代表大会顺利结束，不要强迫他们。”

“唔，好吧！我将一直不离开电话，我准备随时为您效劳。”

“感谢您的关怀！我想我们不久就能见面了。”

“那是我最大的愿望了。好，再见，将军！”

“再见，将军！”

从杜德的答话和口气来看，昨晚代表团长对杜德的思想工作还是有成效的。我们预感到今天的签字仪式将是比较顺利的，但我们仍然做了还要有一番激烈交锋的思想准备。

我们请杜德听取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认罪书》内容，并说明允许他提出不同意见。

杜德请求阅读文件全文。仔细读完后，他对某些用词提出了一些异议，认为那种提法有损他的国家尊严，希望我们考虑修改。

代表团长们交换了一下看法，决定尊重他的意见，尽可能做了一些非原则的让步。

最后，他听完了修改稿，点头表示同意。我们便重新誊清了这份后来震惊了全世界的文件，放在他面前请他签字。

杜德将军换上花镜，抽出钢笔，再次仔细阅读文件。读到某些地方，他停了下来，眼睛离开文件，长久地思索着。看得出来，他尽管有所准备，然而，思想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他当然很清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对他的政府将带来难堪的后果，更清楚对他个人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但是，几天来他听到的、见到的一切，一定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当然，他也要权衡拒绝签字的得失。

最后，他直起腰来，靠着椅背向前凝视着，又取下眼镜，擦着镜片，深思着。全体代表都默默地看着他，屋里静得可以听见杜德粗重的呼吸声。帐篷外面围坐着的76战俘营的7000多战友也是鸦雀无声，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啊！

终于，杜德将军重新戴上了眼镜，把钢笔移向文件签名的位置，停了停，便迅速而熟练地签署了他的全名。然后，放下钢笔，如释重负地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额上沁出了细微的汗珠。

这时，全体代表站起来，鼓掌祝贺代表大会的胜利结束。杜德也站了起来，轻轻地击了一击掌。

正副代表团长和代表们依次走向杜德和他握手。我走到他跟前时，发现他的眼睛是润湿的，我忽然觉得在他脸上新增加的皱纹里隐藏着某种人类共有的东西，不由得握紧他的手摇了摇，我希望他能懂得共产党人的风格和中国人民的心地！希望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能够有一天为美中两国重归于好做出贡献！杜德似乎理解我的心情，也握紧了我的手！

紧接着，帐篷外面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祝贺胜利的欢呼声。这欢呼声在各个集中营依次传了下去，像春雷一样由近及远滚过荒凉的巨济岛，冲向大海，冲向北方！

当天下午，代表大会在“76”召开了盛大的祝捷会，代表团长讲了这次代表大会的经历和取得的胜利。

老孙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感谢朝鲜战友为这一巨大的胜利做出的贡献，表示要学习朝鲜战友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他最后说：“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你们的不朽的功绩！”

在热烈的掌声中，我被邀请去唱了一支刚学会的《朝鲜游击队战歌》，又加唱了《志愿军战歌》。朝鲜三位女代表合唱了《春之歌》，还跳了舞。“76”的同志们表演了活报剧《活捉杜德》。

观众除了“76”全体战友，还有仅隔一条小马路的“77”的战友，共有一万多人，连在马路上巡逻的美国宪兵与站岗的李伪军也津津有味地看了演

出。

几天以后，我们从一个美军士兵偷偷扔进来的《星条报》上，读到关于在板门店我方代表向全世界公布了那份由杜德将军亲自签署的文件，并据此向美方代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谴责的报道。从报上还可以看出在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引起的惊恐与混乱，以及世界舆论的哗然，可以想象美国官方是何等狼狈！他们再三捏造的所谓朝中战俘不愿回国的真象，终于大白于天下！

我们为这个胜利消息高兴极了，代表们禁不住互相拥抱着，含着喜悦的泪花互相用拳头擂着对方的胸膛。好久安静不下来。

释放杜德

4月10日中午，我们收到由柯尔逊将军签名的回函，信上基本同意了大会关于释放杜德的四项要求，并要求立即释放杜德。

当天下午，美方宣布，由波特纳准将接替柯尔逊将军为巨济岛战俘营总管，由他代替柯尔逊和我们就释放杜德进行最后谈判。

由于我们的斗争已基本取得胜利，我们和波特纳将军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我方立即释放杜德将军，而美方则立即将代表们送回各集中营，并保证决不进行任何报复。

波特纳在协议书上签字后，晚上9点半我们全体代表愉快地一起欢送杜德将军到达那个曾经在四天前使他胆战心惊的大门口，并请波特纳将军在下面的收条上签字。

今收到由朝中战俘代表大会送还的一名美国将军——杜德准将。经检查杜德将军阁下确实毫无任何受侮辱与受损害的迹象。特此证明！

联合国军巨济岛司令官

R·波特纳（签字）

1942年4月10日

然后，我们与杜德将军握手道别，送他出了营门。当波特纳扶着他坐上了小轿车，车子开动后，他还无激动地再次挥手告别，离开了他终身难忘的巨济岛“76”战俘营。

至此，活捉杜德事件告一段落，然而，却远未结束。

残酷的报复——血洗“76”

杜德获释后，波特纳立即撕毁了协议，除了女战俘代表外，所有代表全部被继续扣留在“76”听候处理。

岛上各集中营，包括“602中国战俘回国支队”为声援“76”，为要回自己的代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遭到了波特纳用毒气、扣粮、扣水的镇压。坦克冲进“602”压倒了飘扬三天的红旗，火焰喷射器烧毁了挂在铁丝网上的巨幅漫画和标语。

总指导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估计到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残酷报复，甚至实行大屠杀，便决定立即做好反大屠杀的战斗准备。

“76”全营紧急挖掘坑洞和战壕，组织了战斗队和敢死队，队员们制备了“燃烧弹”（装满汽油的瓶子，用时点燃扔出）“梭标枪”（将汽油筒剃成尖刀，绑牢在帐篷支杆上），全营进行了战斗动员，并举行了战斗演习。

我们四名中国同志积极参加战斗动员和准备，我们被请到各个帐篷去“视察”，去讲演，讲述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的故事，去参加联欢会。我们的战斗故事和抗日歌曲演出，受到了特别热烈欢迎。我们还和朝

鲜战友一起挥汗挖壕沟，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中朝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骨肉情谊，并为朝鲜战友们临危不惧的那种革命英雄主义所感动。

6月10日，即释放杜德一个月之后，美方果然对76战俘营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他们先是以数千兵力紧紧包围了战俘营，然后用坦克从四面八方压倒铁丝网突入营内，跟在后面的特种兵部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毁帐篷，步兵则用机枪、冲锋枪扫射，整个战俘营火光冲天，枪声震耳，还夹杂着一些美军士兵野兽般的咆哮。

“76”的战斗队员、敢死队员们高声呐喊着投入战斗，全营几千战友为鼓舞斗志，高唱《国际歌》。三辆美军坦克被我们的“燃烧弹”烧着了，一些正持枪扫射的美军被从后面战壕中突然飞来的投枪刺中嚎叫着倒下！而更多的是英勇的敢死队员们圆睁怒眼，高呼着“祖国万岁”，跃出战壕，向坦克、装甲车扔出最后一颗熊熊燃烧的汽油弹，壮烈饮弹而亡。

在这场血腥大屠杀和反屠杀斗争中，人民军战俘共伤亡300余人。这是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啊！历史将怎样记载这个特殊的战场和这场特殊的战斗！

在整个血洗“76”的过程中，我们四名中国代表被朝鲜战友们坚决堵在地下坑道中，不让我们参加战斗。他们恳切地说：“志愿军同志们，我们要向全体中国难友们负责啊！”

你们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们将来怎么向你们的祖国和人民交待呢！”

直到战斗结束，我们被美军赶出了坑洞，只见整个“76”已被夷为平地，到处是燃烧着的帐篷、衣物，被燃烧的坦克还在冒烟，空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汽油味，地下到处躺着我们的伤员和烈士，一些美军的伤员正在被抬走。

我们这些活着的，没受伤的战俘被轰赶到广场中央，被勒令列队坐在地上。我们全体代表被一个个点名叫出来，陆续被押往营门外的特大型卡车旁。这些大卡车的车轮比人还高。

我们被驱赶着爬上立在车尾部的铁梯进入车厢内，车帮约有一米高，上面罩有不带刺的铁丝网，厢底上有根多未扫掉的牲口粪，使得车厢里臭气难闻。我们被刺刀逼着将双手抱在颈后，蹲在车厢里。

当代表们全部到齐后，卡车发出巨大的轰鸣，将我们载离了巨济岛第76战俘营。从而结束了我们在“76”这段人间罕见的经历。

从活捉杜德事件发生到今年的4月7日，整整34个春秋过去了。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风雨冲掉了许多记忆，但是这个事件的全过程却仍然历历在目。这大概是因为活捉杜德是中朝战俘在巨济岛集中营内斗争的最高潮，而自己又亲身参加的缘故吧！还可能是由于这个人类战争史上最奇特的事件——一位将军竟成了自己所囚禁的俘虏的俘虏——终于使我领悟到了由集中营残酷的现实所揭示的如此深刻的生活哲理：一切不愿屈服于命运的人们，终将做出他力所能及的最大抗争！正是在这种哲理的激励下，使我坚定地迎接了以后的艰难岁月中，命运对我的各种严峻的挑战。

第十三章 在朝鲜蹲美国监狱（上）

在巨济岛美军最高监狱——从战俘升格为“战犯”

1952年6月10日傍晚，18名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和一些随行秘书、翻译人员，在美军血洗第76战俘集中营后，都被押往巨济岛最高监狱。我们蹲在那辆美军装运牲畜的特大型卡车车厢里一路颠簸着，终于，在一次故意的猛然刹车后到达了目的地，而我们也全都重重地摔倒在车厢地板的牲畜粪便中。

押送我们的美军大声咒骂着：“混蛋东西，赶快滚下去！”催我们一个个沿着车后的铁梯往下爬。

下车后，我直起身来，看见前面一座有人字形屋顶的石砌坚固楼房，门栏上方刻着英文的“最高监狱”几个字。楼房两侧围有高达3米、顶上装有电网的石头围墙。

我正看着，背上挨了一枪托，只听到一声命令：“混蛋，给我滚到墙根去，面对墙蹲下，把双手放在脑后！”我踉跄着被赶到墙根。

一种人格被侮辱的耻辱感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心里翻腾起极度的愤怒，那张写着“我方保证决不对你们报复”的《释放杜德协议书》和波特纳在上面签字时的阴沉面孔再一次浮现在我眼前。“这个背信弃义的禽兽！”我在心里骂着。我告诫自己要准备为“活捉杜德”付出更大的代价。

过了难捱的半小时，我们被连踢带打轰赶进监狱大门。在侧面的一间屋子里，我见到了脸色苍白的老孙。看见他额头上肿起的血包和血迹，我心里十分难过。我再寻找黎子颖和柳一，却未发现他俩。

一个美军监狱管理人员过来交给我一把理发手推剪，比划着要我和老孙互相把头发剪光。我用英语告诉他：“我从来没理过发，不会使用推子。”他盯着我看了一眼，指着老孙说：“你会讲英语，那么，你告诉他让他先给你剪！犯人在监狱里不许留发。”我还想告诉他老孙也不会理发，老孙已经从我手里拿过推剪对我说：“跟他无法讲理，让我来试一下吧！”我只好偏着头尽力忍着头发被夹、被拉扯的疼痛让老孙给我推光了头。

然后我十分小心地为他剪。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因我的蹩脚“手艺”而哆嗦时，我真想扔掉推子。结果，不管我怎么努力，仍然把他那一头漂亮的黑发剪成像狗啃了似的“花头”。

看着我的“杰作”，我忍不住苦笑着对老孙说：“真对不起，理得太糟了。”

老孙叹了口气说：“早知有今天，我该在部队时就学会理发！你摸摸自己头上吧，可能比我的脑袋更难看！”我一摸，果然也是个“花头和尚”！

接着监狱看守又命令我们解去裤带、鞋带，搜了身，拿去一切金属物，连帽徽也被撕掉拿走，再将我们逐个带往牢房。

这时我才看清这座美式正规监狱的内部结构：从大门进来，正中是个约100平方米的长方形空间，在房子的中部靠边有两张办公桌，一位棕色皮肤的美军官员坐在桌旁，看来像监狱长。监狱大厅里正对着大门有一个通到后面操场的小门。厅内两侧是约2米多高的石砌隔墙，墙上每间隔约3米有一个小铁栅栏门。从栅栏门里可以看见里面是一个狭窄甬道，甬道一侧是木板墙，墙上排列着靠得很近的一扇扇木门，门上有小窗口，木门里就是牢房。而在所有这些牢房的顶上罩着无刺的铁丝网，网上铺有木板走道供卫兵

巡逻。

老孙先被领走，临别他暗中紧紧握了握我的手，一股热流流进我的心坎，我知道这里包含着兄长般的嘱咐和信任！眼看他提着裤子被领进了左侧第3个铁门。我也被一个看守领向右侧第2个铁门。

进门后，看守打开第1扇木门，让我把鞋脱在门外，趁我躬身往里走，他一脚把我踹了进去。我从地板上翻过身来，愤怒地喊着：“我抗议你们这种虐待战俘的暴行。”

那个看守皮笑肉不笑地瞪着我说：“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战俘！只有战犯和刑事犯！”说完吹了声口哨锁上门走了。

“好嘛！我们从战俘升级为战犯了，真得他妈的感谢美国鬼子！”我坐在牢房地板上揉着被撞疼的膝盖，忍不住说了句粗话。

环顾这间单人牢房，顶多有0.8米宽、两米长、两米高，除了顶上是铁丝网外，四面都是松木板，这大概也是防止囚犯自杀的措施吧！“真可笑，要自杀用不着等到今天，还要留着这条命跟你们拼到底呢！”这么想着，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

那整整一天所受到的过分强烈的刺激使我这时渐渐闭上双眼，沉入了痛苦的梦乡……

凶狠的下马威

第二天早上，我被开门锁的声音惊醒，猛一睁开眼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直到听见一声喝斥：“滚起来，都跟着出来！”我才意识到自己被判成“战犯”关入监狱。

今天来的是另一个看守，这个鬼子身材粗短，棕色头发，一脸横肉。我站起身出门，穿上皮鞋，提着裤子防备着他踢打，走出铁栅门。代表们也正都陆续慢慢从侧门走出来。

走出后门，我看见后面是一个被高墙围着的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墙外两个角上都有一个岗楼，几个戴钢盔的鬼子正坐在机枪后面对着我们指指划划。

墙内的鬼子端着刺刀吆喝着叫我们排成双行，然后发出了口令：“跑步走！”

大家一手提着裤子跑了起来，穿着没有鞋带的鞋跑步还真要点本事。加上大家从昨天早上起就滴水未进，干渴饥饿使我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领头的看守又端起枪托威胁着大喊：“快点，不许停下来！”直到我们代表中一位上年纪的朝鲜战友被石头绊倒再也爬不起来，才让停下。

大家拥上去，把那位全身发颤的战友扶起来，愤怒地看着这群不通人性的野兽。

这时我在混乱中发现了黎子颖和柳一，便转过去向他们点头致意。黎子颖肩上衣被撕破了，这位性如烈火的好战友昨天肯定和敌人撕打过，不免为他担心。黎子颖好像看出我的心情，对我挤出了一个笑容，这反倒使我更加难受了。

“放风”大约延续了半小时，我们又被轰回了各自的牢房。回牢房感到又饿又渴浑身乏力，刚躺下来，就听到头顶上的吆喝：“坐起来，不准躺下！”

我抬头发现一个卫兵正朝下看着，这才又明白一条美国监狱的洋规矩——犯人白天不许躺下！我靠墙坐起来，抱着双腿，低着头，闭上眼轻轻摇晃着身体，发现这种姿势比较省力，于是这成了我在牢狱生活中的标准姿势。

上午 10 点左右，总算听到开铁门的声音，然后看见一个黄皮肤面孔凑在小窗口前朝我喊了声“希克沙哈斯木里达！”（朝语：开饭了）幸好我能听懂这句话，忙过去接住他从窗口递进来的半碗大麦米饭，一小碗酱油汤。

我吃完了碗里的每一粒米、每一滴汤，饥饿的感觉反倒更强烈了。这大概是因为“76”的朝鲜战友为了照顾我们，给我们吃了一个月“满碗饭”，使我变得有些“娇气”了。

放下碗我又靠坐在板壁上闭上眼。胃里的那种空虚感使我想起了孟子那句名言：“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就总结出了这么一条精辟的人生经验。祖国人民将降什么样的“大任”于我呢？作为几千名坚持回国的中国战俘的一名代表，我现在的“大任”是什么呢？我能不能承担这个重任呢？

想到这里，共产主义团结会那些领导同志们，赵政委、魏林、顾则圣、杜岗、马兴旺、陈吉庆、李喜尔、张城垣的面影，我的那些从“86”一起冲杀出来的战友时占魁、曹明、钟俊华、周铁行、曾德全……的面影，我发展的那批爱国主义小组成员姜瑞博、曹友、方向前的面影陆续浮现在我眼前。想起他们，想起在这监狱里还有孙振冠、黎子颖，还有这么多朝鲜战友们在一起，我的心里踏实多了，孤独感、软弱感消失了。我又抱着双腿轻轻摇晃起来……

残暴的逼迫悔过

不知过了多久，我又从迷糊中被开门锁的响声惊醒，在我的小牢门门前立着一个中等个子小白脸的美军少尉，看起来样子挺斯文。他将右手食指翘起来钩了钩示意要我过去。我惊奇地想着：“他要干什么？”起身走了过去。

他查对了我的姓名后说：“你跟我出来！”我随他来到外间那两张办公桌前。

他坐在桌子后面，指着桌上放着的一个文件夹说：“你是中国战俘代表，你先签字吧！签了字就可释放你回去！”他打开了文件夹，把签字笔往我跟前推了推。

我说：“我总得先看看是什么内容吧！”他点点头把文件夹推近我。

我俯下身看那文件，标题就使我大吃一惊——《悔过书》！我急速地读下去，大意是“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对杜德将军非法地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人身折磨，强制杜德在《认罪书》上签了名，承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保证今后绝对服从战俘管理当局的命令”等等。

我把签字笔推回去对他说：“这完全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杜德将军签名完全是自愿的，我们对他的人道待遇柯尔逊将军、波特纳将军都是确认了的！”

他把签字笔拿起来在手中转着，盯住我看了好一阵说：“看来你是很喜欢这监狱生活，也不愿回到你的同伴中去了？”

“回去，立即回 602 去！”我脑子里响起这个声音。这个诱人的建议使我立即想象出当我回去时战友们把我当成英雄给予热烈欢迎的场面。

“但是，我怎么对他们交待我是如何被放回来的？如果这封《悔过书》被放在板门店我方和谈代表前面，甚至向全世界公布出去，我怎么向祖国人民交待？”想到这里，我摇摇头说：“不，决不！”便背过身去。

我听见他终于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我的声音。他用手抬起我的下巴，

盯着我说：“那就回牢房吧！”

我走回牢房，他一脚跟进来，把我踢靠到墙上，眼里露出凶光，咬着牙说：“那就让你尝尝蹲监狱的滋味！”便一拳，打在我小腹上，剧痛使我弯下了腰，接着下巴上又受了另一下拳击，我的头朝后仰过去，后脑重重撞在墙上，眼里满是乱串的金星。未等我缓过来，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又左右开弓朝我脸上连续扇了七八个耳光。我明显地感到嘴里的血腥味，忍不住蹲下呕吐起来，血水和那点可怜的食物都吐在裤子上、地板上，小牢房里弥漫着难闻的臭味。

牢门“哐”的一下被关上，接着又被锁上了，我抬起头来看见小窗口里那小白脸军官的狼一般的威胁眼光。我又低头呕吐起来，最后我仰靠在板上，喘着气，感受着小腹、下颏、后脑、两颊火辣辣的疼痛。

我忽然感到脸颊上流着无声的泪水，赶快用衣袖擦去，但愈擦愈多了。我对自己的软弱恼恨起来：“比起难友们来，你被俘后的处境要好多了，第一次挨揍就受不了，太脆弱了！”

这种自责使我的委屈感缓和下来。但我一闭上眼，就觉得那双凶残的眼光仍在盯着我，那份《悔过书》、那支签字笔又晃动在我眼前。

我索性睁大眼睛，一个念头明确起来：“这些家伙大概是看中我是个文弱书生，在代表中又最年轻，先拿我开刀，好打开突破口吧？”这个念头使我警觉起来。我努力鼓励自己：“林学逋烈士不也是个文弱书生么？他被活生生割肉时，比你刚才挨揍不知疼多少倍，他都勇敢地挺过去了！他自觉地选择了这条宁死不出卖灵魂的道路，你呢？刚才不也是自己坚决拒绝签字的么？不是从一被俘就自愿选择了这条艰险的路么？你可决不能受点皮肉之苦就动摇了啊！大不了就是永远离开这个充满罪恶苦难的世界。你最好现在就在心里做好跟妈妈永远告别的准备吧，做好永别的准备就一切都无所畏惧了！”

我的泪水又涌出来，但惊恐的心却逐渐安定了下来……”

牢门的锁又响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我对自己怎么这样软弱真气坏了，狠命地在大腿上掐了一把。

牢门打开，这回不是那头凶狠的人狼，而是那位棕色皮肤的看守长。从他阶徽上我看出他是个中尉，我向后缩了一下，做好了挨打的精神准备，他厌恶地看了看吐得一地的血水脏物，看了看我身上污迹说：“张，出来清洗一下吧！”听口气是真让我去洗。

我站起来随他走出去。牢门外还有一位在监狱服刑的朝鲜难友，提着水桶和帚布等着打扫我的牢房。

出门后，中尉看守长叫一个上士看守领我去洗澡。那位上士拿着一身衣服领我进入大门旁的小空房间。

我没有找到淋浴装置，正怀疑着，他叫我脱光衣服。我以为他会给我扛热水来，便转过身对着墙，刚脱下衣裤，突然一股冰冷的冲力极大的水柱把我冲击得一下子贴在石头墙上。开始，我感到剧痛，但很快就麻木了。接着冰得我全身颤抖起来，我只得用手臂护着头来回侧身抵挡这股水流的鞭打。

我听见一阵狂笑，使我气愤极了，但强大的水柱不允许我张口。我被冲得倒在地上打滚。过了好一阵，狂笑停止了，水流停止了，我渐渐缓过气来。睁开眼，见那个上士正一面把一个消防水龙头挂上墙，一面叫我站起来。

我艰难地爬起来，上士把那身囚衣扔在我身上，转身出门了。

我手脚发僵，咬紧牙关使劲穿好衣服。他进来叫我回牢房，在关上牢门时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淋浴，不是么？”对我怪笑了一下，走了。

我坐靠在那里，先是全身发冷，怎么也控制不住牙齿的咯咯碰撞，然后是发烧，觉得皮肤像着了火似的。好久好久才缓过劲来。我闭着眼，任仇恨的怒火在心中燃烧。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开铁栅栏门的声音，我一下坐直了身子握紧了拳头，横下一条心：“来吧，看你们还有什么整人的花招！”我高兴这次心里不再发怵了。

我的牢房门响了两下拍门声，窗口里出现的却是那位送饭的朝鲜难友的脸。他可能知道了我受到虐待，充满同情地看着我，然后将饭菜从窗口送进来。我发现那碗饭比上午的多了一半，心里发热了，他可能是省下自己的定量来慰问我的。

这天晚上，我不断被恶梦困扰，到处是大火追着我，我被火烤着往一个深渊跳下去，水冷极了，我想游起来，手脚却僵直不听使唤，沉下去了……

到早晨又叫我们出去“放风”时，我才醒来，感到头炸裂似的痛，周身发冷。

这次来叫我出去的是位年轻黑人看守，当他听我说我感冒了，他触了下我的额头，便转身出去，把看守长请来。看守长也试了一下我的额头，回身对他说：“让这个中国人歇着吧！”

过了一会，那位中士端来一杯热水和一包“APC”，从窗口递给我，看着我又摇了摇头说：“你躺下吧！不要紧！我去对上面的卫兵讲一下！”

服了药片躺下，我不久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这次重感冒延续了三天，那位年轻的黑人士兵来过好几次，送水、送药，对我表示的同情也只是摇摇头，那双黑白分明的眼里闪着忧虑的光。我不禁想起马克吐温那部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的主人公来。在美国黑人中，善良的受苦人不少啊！

第四天早上放风时，老孙、黎子颖一见到我，立即站到我身边来，一面跑步，一面小声急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简要地谈了这几天的遭遇，为了不让他们难过，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了遭受的那些折磨。

他们放心了，要我继续提高警惕，好好养病，并告诉我柳一同志已放回“602”去了，估计是因为他们只把他当作随行人员，就未定为“战犯”。

这天上午刚吃过饭，那位小白脸美军少尉又来了。他在牢门口奸笑着说：“张，现在考虑好了吧！愿意签字么？”

我立起身，两腿牢牢地站稳后说：“请给我纸笔！我要向波特纳写封抗议书！”

他脸色沉下来，眼睛又露出凶光，一步步朝我走过来。我也做好了准备，站在那里看着他。

我们对视着，他后退了一步，出手了。第一拳仍然是朝我腹部击去，我往下蹲了一下这拳击在了胸膛骨上，我下意识地用双手去阻挡。他抓住我双手向墙板上压去，然后用膝盖朝我下身猛然一击，我只觉一股钻心的痛楚就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这条人面狼已经离去。虽然我的下身、胸骨比上次挨打还要痛些，但我的情绪却平静多了，甚至还有点高兴，高兴我的精神总算坚强

了些。

为了减轻痛感，我便努力去想他们的杜德将军被我们抓住时叫喊挣扎的狼狈样子和在批判会上汗流浹背的苦相，回忆杜德、柯尔逊、波特纳等几位美国将军相继在文件上签名时的窘迫样子。想起这些，觉得很解气，痛感也减轻了许多。尽管多少有点阿Q精神，但这个办法还是缓解了不少肉体上的痛苦。

那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砸在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惊醒了。我睁开眼，只见头顶上蹲着个卫兵，正朝下看着我。在灯影下，我看不清他的脸，连忙坐起来，身上那个东西掉在地板上。我拾起看，便睁大了眼睛，原来是一块巧克力！

我朝上看那卫兵，他正向我招手要我站起来。我站起身离他很近时才看清了他就是那位给我送药送水的黑人中士。

他伸头往厅内办公桌那边看了看，回头对我悄悄地说：“值班看守睡着了。今晚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值勤站岗，明天我就在朝鲜满一年，该回去了。我来送你块巧克力。”

“你病全好了么？”

我直点头，轻声说：“谢谢你，但你让我太吃惊了！”

“我佩服你们中国人，我喜欢中国！”

“你怎么会了解中国？”

“我的邻居就是从中国移民来的，他常给我讲你的国家。他对我很好，从很小起就常给我吃糖块。”

“你是哪里人？怎么当上兵了？”

“我是内华达州人，中学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就出来当兵了。”

他忽然又问我：“张，你不想抽支烟？”

“在这里行吗？”

“行，你抽时把吐出的烟赶散开，我替你看着！”说完他捂住手点燃一支烟通过铁丝网递给我。

在我一生中这又是一次关于抽烟的难忘经历！在那个冷酷的监狱里，在受到美国军官的严重侮辱后，却能得到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冒着危险给我的一支烟！现在我的这位黑人朋友在哪里呢？你一定也没有忘记 35 年前的这一幕吧！你不知道当年你那支不值一分美金的烟曾在我心中产生了多么大的温暖！你现在一定是一个美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吧！多么遗憾连你的名字也忘了问！现在，让我在这里，在我自己的祖国，在首都北京向你衷心地问好！今天，中美人民友好之林已经很茂盛了，其中就有我们当年播下的那颗种子！

又过了一天，我决定采取主动。在放风后，我向看守长要求给我纸笔：“我要给波特纳将军写封信！”

看守长似乎很理解我的要求，没说什么就从抽屉里取出纸笔给了我。我表示了感谢，就拿着它们回到了牢房。

我在这封信里叙述了中朝战俘谈判代表们所受的虐待和我自己被强迫要在什么《悔过书》上签字与那位白脸少尉对一个数千名中国战俘的代表所施加的无耻的人身侮辱与摧残，并写道：“对此我提出强烈抗议！所有的事实您是完全清楚的，代表团并未给杜德将军任何人身侮辱和折磨以迫使他在《认罪书》上签字。我们是无罪的，把我们判定为战犯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坚决要求立即无罪释放代表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所代表的各自的战俘营中去！”

最后，经过我反复思考还是写上了一句使我后来一直十分懊悔的话：“如果我们能获得无罪释放，回到 602 后，我们愿意服从美军当局的合理管理。”

我懊悔的是虽然我我说的是“服从合理管理”，但美方总是认为他们对战俘的非人道管理是“合理的管理”，这样写不仅容易被他们钻空子，更糟的是这句话听起来有服软的成份，有损我们的尊严！

当时我只是想：“先争取被放回去再说，回去后我怎么干你们就管不着了”，认为是一种斗争策略，后来的事实证明波特纳并不，他没有被麻痹而“放虎归山”。

但是这封抗议信却使看守长对我有了较深的印象。另外，那个白脸少尉也竟然没有再来加倍折磨我，虽然我对此做好了充分精神准备。

看守长与囚犯

我请看守长转信之后不几天的一个深夜，他值夜班，竟把我叫了出去。我迷迷糊糊地跟了出来。他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听罐头和一瓶威士忌酒，还有两个听装啤酒。罐头已经打开，里面插上了叉子。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站在桌前没有说话。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说：“坐下吧！张，今晚没事，找你来谈谈天！”

我只好坐下来。他把一个罐头、一筒啤酒推到我面前用手势让我自己吃，我欠了欠身表示感谢。

他打开啤酒一仰脖喝了好几口，用手抹抹嘴说：“张，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我回答：“父母兄妹。”

“你没有结婚么？”

“没有！”

“有心上人么？”

“有了，但……”

他掏出一个皮夹，拿出两张相片给我看，一张是他和一个相当摩登的女人站在一辆很漂亮的小轿车前，背景是一座非常华丽的别墅；另一张是他和一个肤色发黄的老女人互相扶着肩在一个小套间里照的。

我拿着后一张问：“这是你的老母亲吧？”

他点了点头说：“60 多岁了，受了一辈子苦，最近来信说病在家里没人管！”

我指着另一张相片问：“那么，这位漂亮夫人，这是您妻子吧！她不住家里？”

他把相片取回去看了半天，先对着威士忌瓶了喝了大口，说：“这世界上女人都是见利忘义的东西！她跟一个洛杉矶的富翁跑了！”

“那么，这汽车、这别墅她都不要了！”

“嘿，张，我如果有这么贵重的汽车和别墅，她就永远属于我了。这是我离开美国来朝鲜之前，站在别人的房前和车前照的相。它只是用来装门面的！”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同情，安慰他说：“等战争一结束，您回国一定能重新找一个忠实的伴侣。那时候，您的积蓄会使你不那么困难了。”

他往后一靠说：“张，你以为我这个中尉的月薪可以买座金山吧？我当了十多年兵，差点把命赔上，也没买上一座别墅！”我哑口了。

他停了一会儿说：“不谈这些丧气的事了！你吃肉吧，喝酒吧，这是我真正请你的！”

我动了动身子，还是没有动手。

他替我把啤酒罐打开说：“在这一时刻，我们不是看守长和犯人的关系，我把你看成朋友，你别有顾虑！”我只好喝了口啤酒。

他把罐头推得距我更近一点，说：“吃吧，别看现在你落难，战争结束后你回中国比我有出息。我看出来你文化高，本事大。我还敬重你有骨气，那么整你，你并没有屈服！我看得起勇敢的军人！”说完他拿起啤酒罐说：“来，干了它！”

我看着他那微醉的诚恳的脸色，喝干了那小罐啤酒，感到有些头晕。

他见我不肯动肉罐头，就从抽屉里取出张干净纸，把里面的土豆肉取出来包在纸里说：“你带回去吃了，明天放风时把纸丢了就行了。”说完硬塞在我手里。

他领着我回了牢房，又轻轻地上了锁关好小铁门。

回到牢房，我慢慢地把那包食物吃了下去，把纸捏成团塞在裤袋里。我听着外面看守长还在独自喝着威士忌，深深感到在他的内心并不比我们这些“犯人”更光明！

狱中绝食纪念“七·一”

日子在极其单调苦闷的心境中一天天熬过去，眼看7月1日党的生日快到了。

6月30日早上放风时，我和老孙、黎子颖跑在一起，我建议明天绝食一天，并由我今天向波特纳提出书面抗议：抗议美方不遵守双方协议，扣押代表入狱，要求立即将我们中国代表释放回“602”去！我们为此绝食一天。

我说：“这也向敌人表明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对自己党的感情。”

他们赞许地点了头，黎子颖还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使我很受鼓舞。

回来后我又请看守长给我纸笔，他笑了笑拉开抽屉，取出来给了我。我回牢房趴在地板上写完“抗议信”并请看守长代为转交。他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三人拒绝进食。那位送饭的朝鲜难友奇怪地看着我。我用不熟练的朝语告诉他：“我们党的生日是今天，我们对她想念！”

他悄悄地翘起大拇指说：“中国共产党万岁！”

下午，布鲁克斯上尉和一个手里端着盘子穿白大褂的美军来到我的牢房。我自从在前方战俘收容站见他一次后再也未和他见面，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他进来后上下打量着我说：“张，你瘦多了！你不听我的劝告，落得如此下场，我为你感到难过！”

我说：“承蒙您来看我，谢谢！我并不后悔没有到你们第八军去当平民翻译！”

“你又不是共产党，跟着他们胡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是太单纯了！”

“我本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你们却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相信马列主义的人，这算是你们的一大功劳哩！”

他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不允许你在监狱里还搞什么绝食斗争！我奉波特纳将军之命来劝说你们！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将给你们注射针药，让你们

的胃里沸腾起来！”

我看了一眼那个美军端的盘子，那里用纱布盖着的真是注射器。

我正色道：“布鲁克斯先生，如果你真敢对中国战俘代表下毒手，如果我不死，我一定要向全世界控诉你！”

他狠狠地看着我，一挥手和那个美军医生一起退了出去，把牢门“砰”的一声关死了！

临走，他从窗口对我吼了一句：“我要让你永远在这里呆下去！”

第二天，我凑空问老孙：“布鲁克斯去见你没有，给你打了针没有？”

老孙说：“那个上尉就是布鲁克斯？打什么针？他进来看了看，话都未说就走了。”

我还以为他是来查房的呢！”

我便把他在牢房的情况汇报了。老孙说：“你做得好，你在斗争中越来越成熟了！”

人的一生受到真正值得记住的表扬不会太多吧。但是“成熟了”这个表扬却给了我多么大的激励啊！

上午进餐时，我们3个中国人都在碗底发现了一个肉团子。这是监狱伙房朝鲜战友们冒着危险拿狱中美军的供应慰劳我们的。这使我十分激动，朝鲜战友们和我们心相连啊！

我的这些朝鲜战友肯定也不会忘了35年前的那个7月1日和8月1日，这两天我们都进行了纪念性绝食，他们都这么慰问过我们。如今，他们也老了吧！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打听到，再见到他们呢！

囹圄中的反思

在这个监狱里，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个1.6平米的牢笼里呆坐着，任生命无声地流逝。这对我这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来说更加难以忍受。所幸的是敌人虽能囚禁我的躯体，却无法囚禁我的思维。我大半天是靠板墙坐着，抱着双腿，低头闭眼，轻轻摇晃，让记忆把我带往童年、故乡，带到外面那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去。

虽然我对自己幼年毫无记忆，我也能根据父母告诉过我的情况再次去想象：想象1929年7月23日我在上海四川北路那个四川饭馆的里屋呱呱落地；想象父亲在北平工业大学毕业后失业，到上海开饭馆，满头大汗地在充满油烟的灶间给顾客炒回锅肉的样子；想象母亲为了继续她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学习而不得不离开我去上学，回来却发现我爬在床上抓自己的粪便吃，心痛得抱着我大哭的样子；想象“一·二八”事变后父母带着三岁的我绕道厦门、广州、武汉回老家四川广安县代市镇时的仆仆风尘……

从那以后，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故乡的青山绿水，童年的嬉戏欢笑，祖父母对自己的钟爱；在祖父那幢兼营造纸和卖纸张文具的小作坊里和哥哥们捉迷藏；清明时节全家下乡去祭扫那么多的祖坟时，我们张家众多的小孩子在竹林和松树、青杠树林子里奔跑着“打仗”；在乡下那铺满月光的石坝子里玩老鹰抓小鸡……

我闭上眼，生怕这么令人愉快的回忆飞去：在代市镇小学那用庙宇改成的阴暗的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我和同学们趴在草地上支着下颏出神地听国文教师给我们讲《木偶奇遇记》；在远足旅行中，我们在石岩下躲雨时自然课老师给我们描述将来人类怎样用电光来轰散乌云，赶走我们四川那没完

没了的雨水了；在旧风琴伴奏下，音乐老师在教我们唱儿歌：

“蝴蝶姑娘我爱你，你的家住在哪里……”

啊！我的亲爱的启蒙老师们，是你们给了我文明、智慧和理想！你们在哪里？我的泪水洒满了衣襟！

回忆飞到了抗日战争：镇子上来了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宣传队，对着我们这批穿草鞋的小朋友们唱：“打回老家去！”我们陪着他们哭，参加他们为庆祝台儿庄胜利举行绕镇子一周的“提灯大游行”。

音乐老师开始教我们唱《中国不会亡》——“啊！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我止不住轻声地哼起这支记忆深处的歌子来。

有时，饭送来了，我的回忆暂时中断，但吃完饭，那种噬心的孤独感又迫使我尽快钻进回忆里去：武汉失守了，大人们的情绪十分低沉，我看见几个教师在宿舍里流着泪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在我那少年的心灵里深深地播下了爱国和仇敌的种子！

然后是小学毕业，我抱着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奖品跑回家。祖父抚着我的头说：“老三，你爸派人来接你出去，你别把公公婆婆给忘了啊！”我扑在祖父身上哭嚷着不去，但第二天还是拿着祖母给我们三兄弟煮的腊肉跟一个伯伯哭着上了路。到广安县坐船去重庆，又坐汽车去成都，最后到了雅安。一路上的新鲜事真多啊，那么美的渠江、嘉陵江；重庆有那么高的楼房，街上有那么多的人，大哥、二哥拉着我，怕我走丢了！成都有那么好吃的麻婆豆腐、米花糖；到了雅安，站在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上看水流湍急的青衣江真好玩；在父亲当总工程师的那个雅安毛织厂里，有那么多飞快旋转着的纺线机……

啊！我的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故乡，你曾在我梦魂中出现过多少次，现在我多么怀念你！

雅安张家山上的私立明德中学校舍真美，一式的红砖楼房。那个总是带着十字架从加拿大来的老校长在第一学期就熟悉我了。一个早上，教我们班英语的老师——一个美国教士陪着老校长散步，听着我在小树林子里大声朗读英语课文时停下来。他们拨开树丛站在我面前，英语老师扶着我的肩，用发音不准的汉语说：“这是我班上年纪最小又最用功的学生。”老校长弯下腰来在我的光脑袋上敲了一下说：“嗯，这里面能装下好多知识。小伙子好好学，长大当个科学家！”

回忆到这里，我奇怪，同样是洋人，差别怎么这么大！那个美国老师大概没想到他的学生以后会跟他的国家打仗，并且正在用他教的英语去同他的国家斗争！

我还回想起在那个高耸入云的教堂里，听神父传道的情景：那辉煌的大穹顶，四周那雕花窗户上的彩色闪着光，管风琴在教堂里奏出优美的旋律，大厅里回响着深远的回音，比起周围的村舍，真好像是天堂呢！神父宣讲的那段《圣经》我听不懂，但对于“你，如果有两件外衣要送一件给穷苦的人”这样的话我听懂了。

想到这里我又感到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劝人行善，却不能在中国扎根？尽管外国传教士费了很大的劲，像我这样上了六年教会学校，读过全部《圣经》的学生，最终却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化太悠久，还是因

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负太深重？

回忆把我带到位于成都附近那风光绮丽的金堂县曾家镇的铭贤中学。尽管孔祥熙是这个教会学校的名誉校长，但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和学校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战乱与流亡的痛苦，连我的美籍英语老师席勒和加拿大英语老师威尔玛特都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抗日热情。

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比较民主，课外活动很活跃，既有基督教的“团契”社团、唱诗班，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壁报社，还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秘密的读书会。那时候，同学们都住校，我学习又不吃力，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参加各种活动。唱歌从圣诗班的宗教歌曲《哈里路亚》到合唱队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演剧从《风雪夜归人》到《放下你的鞭子》；读书从鲁迅、巴金的作品到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从14岁到16岁，我在高中这三年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的乳汁，我多么感谢那些文学巨匠送给我的精神财富，多么感谢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文化知识！多么思念学校里那些给我关怀和友爱的师哥师姐！他们现在知道我在监狱里思念着他们么……

如果没有每天早上放风和每天两次进餐，关在巨济岛最高监狱那间小小牢房里会完全失去时间观念，白天黑夜都是同样昏暗的灯光，同样的狱卒在头顶上的踱步声音和同样不时传来隔壁牢房难友的呼噜声。时间冻结了，但我的思维却未冻结，我仍然闭着眼，靠坐在板壁前，抱着腿摇晃着上身，陷入漫长过去的回忆之中。

高中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八·一五”那天，人们是多么欢乐啊！

整个成都市都沸腾了，鞭炮声响彻全城。酒一下卖光了，人们不管认不认识在大街上互相举杯祝贺，拍肩拥抱，庆祝民族的苦难从此结束了！谁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是美国兵代替日本兵在沿海大城市耀武扬威、强奸妇女，是美国货充斥市场。

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这个总工程师失业了，家境每况愈下，我考上清华大学后不得不申请助学金。国民党的教育部宣布停止派送公费留学生，我那留学美国在物理学上深造的幻想破灭了，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了！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流传着：“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歌谣，进步的同学把我从图书馆里劝出来连夜写标语、练歌子准备反美抗暴游行；动员我去参加“大家唱”合唱团，动员我参加“民间歌舞社”演秧歌剧；动员我参加系里成立的“戈壁草”读书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大众哲学》等书，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呈现在眼前！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里，在北大红场上参加三千人《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对敌人军、警、宪、特的镇压，我们愤怒！对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

我在清华园工字厅外的小湖边被吸收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员，在女生宿舍“静斋”后面的小树林里参加了共产党，要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种种人间悲剧而奋斗终生。向往使我年轻的心血沸腾着！

想到这里，我的那些亲密的同学和战友的面影一个个浮现在我眼前，他们那么亲切地注视着我，好像在对我说：“石头，你可要像石头一样坚强啊！”

1948年夏天，组织上调我到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受训。

我化妆成小学徒，剃光了头，穿上破旧的中式短衫，经天津坐火车到陈官屯，再坐马车前往封锁线。

过了中立区，我走进一个村庄，一个儿童团员盘问了我，把我带到村政府。

“这就是解放区了，让我跪下来亲吻这圣洁的土地吧！”

大概每一个从那黑暗污秽的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都会有这同样的感受。

“有一天当我从集中营释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我肯定会有比这更强烈的感受的！”我闭着眼坐在牢房里这么想着，心里升起了一股神圣的感情激流。

1948年八一建军节的动人情景鲜明地来到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五名要回到敌后的北平学生为了从中央转组织关系，由敌后工作培训班的负责人荣高棠带着从泊头镇来到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正遇上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把我们带到会场，介绍给朱总司令、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

当我握着朱老总那温厚有力的大手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朱老总把我们让到那个农民院子的一间土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在递给我西瓜时还问哪里人。当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时，他笑着说：“你是我的小同乡，你这么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幸运！”

“朱总司令，现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后悔参加革命。我一直记着您对我说的参加革命很‘幸运’这句话。这个幸运是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获取的！”

从解放区再次通过封锁线，坐船从大清河抵达天津。回北平后，我被安排在傅作义公馆，傅冬菊同志对她爸爸说我是她同学。我们党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变成掩护共产党的“窝子”！

冬菊同志为我买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莹祥又向她在银行当协理的父亲要钱给我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

1948年秋的大上海混乱萧条！那些睡在霞飞路梧桐树下拖儿带女的难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难不会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市委遭敌特破坏而无法联系，我失去了党的领导，只好独立作战。我去闯过华蓥山找游击队，也去乐山县、广安县找过党组织，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借读物理系，总算通过我在该校当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党外围组织，投入了川大的学生运动。

想到那段岁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党组织一方面很重视我这个从清华大学来的“学运老手”，让我参加“方言歌舞社”活动，一方面又派人监视我，担心我是“红旗特务”！而我却如鱼得水，把我在清华从事学运的经验、方法都用上了。我们排练了许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场“年关”，我们的演出感动了那么多观众！

1949年4月9日晚上，声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会结束时，在川大广场上我们组织了上千人的《团结就是力量》集体舞，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啊！

1949年“四·二”大逮捕之后，地下党组织让我们撤退到乡下。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个小组住在市郊牧马山上的一个地主大院里，学习革命理

论。在共同的斗争和学习中，我们结下了那么深的兄弟姐妹情谊，即使在阴暗窒息的牢房里，我也能感到它给我带来的温暖！我深信他们正在远方祝福着我，祝愿我以最大的坚毅去迎接最严峻的考验！

也正是在牧马山那个庄园里，M和我确定了爱情关系。

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一直让她跟我一起下乡搞农运，上山打游击，我们的感情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迅速成长起来。现在她是否也在想念我呢？

最后，我想起在四川解放前夕那段经历对我的成长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我现在之所以能够比较坚强地去战胜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一切艰难困苦，不能不说得益于那时的锻炼！

开始我到双流县红石乡去当农民，发动贫雇农参加革命，后来周鼎文同志重新吸收我参加川西地下党组织，叫我创办山西地下党报《火炬报》。白天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夜里通过秘密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连夜刻印报纸，再步行几十里送到接头地点去。

联络站遭到特务破坏后，我连夜走百里路通知各据点的战友们紧急撤退。

我们撤退到名山县，在周戈西同志领导下准备成立游击队。我以“刘伯承派出的代表”的名义到乡政府去做统战工作，还深入到总岗山的土匪山寨里去动员土匪武装加入反蒋行列，参加游击队。11月川康边区人民游击纵队成立后，我们在邛崃山区里为堵击胡宗南部队逃往西康、云南，进行了艰苦行军作战。

所有这些革命实践，对我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的磨练太重要了！但只是在监狱里特别需要这种磨练时，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它！

在牢房里，当我从反思中意识到我自从来到人间接受了那么多的爱，我的亲人、老师、同学、战友都曾无私地关怀、爱护、帮助我，使我成长为一个知道生命价值所在的人。我应当能够承受一切痛苦，去坚持真理和正义，决不能使爱我的人们失望！

现在回想起当年在监狱中度过的这段生活，使我有机会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许多问题，悟出了不少人生的道理，为此，我还应当好好感谢波特纳呢！

再次和菲利浦打交道

1952年8月2日，在我们为纪念“八一建军节”绝食后第二天，菲利浦来了。他进到我的牢房，一见我就“同情地”摇着头说：“这样对待你们确实是不公平的，又不是你们抓的杜德将军！”

见我无话可说，又说：“张，你有什么要求？让我看看能否帮助你减轻些痛苦！”

我想：“你披上羊皮是好看些，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说：“你说说现在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好嘛！你又在收集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的心理状态的情报吧！我可以告诉你，只怕不合你的意！”想到这里，我便说：“第一我想我们三个中国代表应住在起，第二我想读书。”

他拍了下手说：“果然如此！这好办，我将设法满足你的愿望！但你们的秘书黎子颖即将放回“602”，他不算是代表团正式成员。你可以和老孙在一起。”说完就走了。

我对此未抱任何希望。没想到刚吃过下午饭，看守长就打开我的牢房，

显得挺高兴地对我说：“张，你真有办法，上面来电话同意你的请求！”我一时没转过弯来，问他：“我没提什么请求呀？”

“你不是要求和你们的孙少校住在一起么？我这就给你们调整房间！跟我走吧！”

我拿上作为我全部行李的那床军毯，跟着他来到一个稍大点的牢房，从小窗口一看，果然老孙坐在里面，我高兴得真想蹦起来。

牢门打开，老孙愉快地笑着迎接我。等看守长走了，我抓住老孙的手直摇，傻乐！

我说：“菲利浦还真有点意思！”

老孙说：“他明天还会送书来，只怕他又下了一次收不回本钱的赌注哩！”

第二天，菲利浦果然送来了两本书和几本杂志，他说：“我喜欢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就像你们常说的那样！”

老孙微笑着点头致谢。我忍不住上去把书接过来，那两本书本是《唐诗选集》，另一本竟是《郭沫若选集》，我轻轻“嘿”了一声！杂志则全是英文的，有《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

菲利浦显然是满意于他给我们带来的惊讶，用手点了点我的手臂说：“张，你就只顾急着看书，也不对我说声谢谢？”

我头也不抬机械地用英语说了声：“谢谢。”

“哦，你也太不热情了！为了找这两本书，我昨天特地飞回釜山去了一次呢！”

我抬起头来对他做了笑脸说：“那太麻烦你了！”

老孙看他有些尴尬，便插话说：“菲利浦先生，对于您给予我们的特殊关心，我们会忘怀的！”

菲利浦很老练，似乎没听出老孙话中的话，装出一副十分愉快的样子说：“不用客气，我们是老朋友了，不是么？”然后和我们握别。

他一走，老孙瞧瞧小窗口说：“这只狡猾的狐狸，很懂得我们的心理！”

第二天放风我们果然找不见黎子颖，知道他真的被放回“602”去了。我真羡慕他，也祝愿他回去更好地用他犀利的笔锋去和敌人斗争。

和老孙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从那以后，我的监狱生活大大变化了，白天我们各自看书，或者我给他译读英文杂志里的一些有意思的报道文章。晚上，就缠着他给我讲他怎么带兵打仗的故事，或者一起轻声地唱起高尔基写的《囚徒之歌》，

太阳出山又落山哪，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总逃不出牢监。

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铁链！

那块小小天地变得温暖和开阔了！

可惜书已读完了，释放我们回去的事还毫无音讯。看守长对我的打听，也只是摊开双手耸耸肩。

老孙看我情绪又低落下去，便建议我和他比赛背诵唐诗，于是我的好强争胜的劲头又上来了。我上中学时就背得许多唐诗，老孙当然输给了我，便让我在他手上打了三下。

新学的唐诗《琵琶行》和《长恨歌》我也比他背得快些，加上我还会

耍赖，于是他便总是让我打三下。看着我孩子般高兴的样子，老孙也微笑了！我的这个只比我大十几个月的同志哥，实在比我成熟得太多了！

1982年寒假，在我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之后，第一个想见的老战友就是老孙。我跑到长春去看他。他在火车站耐心地等着晚点的火车。我下了车，远远地看见已经两鬓斑白的他——我日夜思念的这个同志哥，不顾泪水涌流，我跑上去就一把抱住他，透过泪水痛心地读着他脸上每一根饱经沧桑的皱纹。

“老孙，老孙，你也老了，你本来可以为党做出多么惊人的业绩来啊！”我在内心深处痛苦地呼喊。他却还是那么稳重地对我微笑着，好像这30年来他没有经受过极大的委屈，没承受过难言的痛苦！回到他家里，他爱人玉美同志天天为我杀鸡、宰鱼。

临别那天晚餐，他举着酒杯说：“来，泽石，咱们连干三杯。第一杯为了30年前我们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第二杯为了今天党终于为我们六千战友平了反，你我都恢复了党籍；第三杯为了今后我们保持晚节，继续为党贡献我们幸存下来的生命！”

我们颤抖着手碰了杯，干杯时，不少酒都洒在了胸前。玉美同志为我们斟酒时也把不少酒倒在了杯外……

1952年9月10日下午，在监狱里被囚禁了整整3个月，不，应该是2208个小时之后，我们被宣布“服刑期满”。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剩下的18名被正式判为“战犯”的朝中战俘代表团成员押送往“巨济岛战犯战俘集中营”。我扶着十分衰弱的老孙一起爬上卡车，最后望了一眼那座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监狱，背着美国军事法庭强加给我们的“战犯”罪名，离开了那座阴森森的石头牢狱！

第十四章 “战犯”战俘集中营

有组织的孤雁

巨济岛战犯战俘营离巨济岛最高监狱不算远，但离其他普通战俘集中营很远。我们到达之时，天色尚早，我能看清用英文写成的那块很大的营名标牌和四周密集的岗楼、岗哨。

这天，为“迎接”我们，增加了很多岗哨，还有不少手执防毒面目的卫兵。这个集中营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建在一块荒芜的河滩地上，成正方形。从大营门进去，东西南北都有互相隔开的小铁丝网，正中是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操场。每个小铁丝网都有小门可进入广场。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离大门很近，很小，里边只有一个帐篷和一个厕所，厕所旁有一个可以冲澡的小间。

在我们对面隔着大门的是管理人员的帐篷，伙房、医务室、库房、清扫队等。除了几个负责管理的美军人员外，勤务全部都由被判刑的朝鲜人民军“战犯”战俘担任。这些人民军战士都是在游行示威、绝食等斗争中与前来镇压的美军或南韩军发生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

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到来，引起了很大骚动。每个铁丝网内的老“战犯”们都排着队向我们敬礼，唱歌，喊口号，欢迎我们这些新“战犯”。敌人立即向人群扔掷毒气弹，黄绿色的浓烟在铁丝网内外升起，那些铁丝网外的毒气弹是战友们又扔回去的。这场特殊的欢迎仪式直到我们全部被押进“代表团特殊小队”的铁丝网并被轰进帐篷之后才告结束。

等押送的美军都退走之后，我们 18 个人互相握手拥抱。代表团团长老李又特意向我们两个中国代表介绍了其他朝鲜代表的姓名、在部队职务、所属战俘营编号等，我这才知道我们 18 人的组成是：除了他和老孙为正副团长之外，其余 16 名分别代表 16 个志愿回国的朝中战俘营（女战俘营除外）。

这一天大家都很高兴，总算熬过了正式美国监狱的单独囚禁和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战友们又都聚到了一起。尽管大家都离开了自己所代表的战俘营，但这也是一个小的新的战斗集体。

又一种新的战俘营生活开始了。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危险，总可以互相支持鼓舞了，总可以从事一些比在监狱有效的、集体的对敌斗争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老孙身旁问他今后怎么开展斗争？他想了想说：“形势很严峻，敌人已经把我和广大战友们隔离开。我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今后我们大概将长期被困在这里，让我们在无所事事的隔离生活中消磨掉斗志！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他们的人质，作为要挟我方和谈代表的资本。我还担心他们会继续对我们施加压力，强使我们为他们在世界舆论中消除杜德事件的影响服务！”

听了他的这番考虑深远的分析，我也感到了担子的沉重。心里想着该怎么去打破敌人的如意算盘，还没找出答案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老孙被请去和几位朝鲜师级领导人开了一个会。老孙回来传达说，大家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同意老孙昨晚对我所作的分析，决定做好与敌人进行长期的针锋相对斗争的思想准备。首先是健全内部组织，他们都是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吸收老孙和我参加劳动党。我与老孙和另外三位朝鲜战友分在一个党小组里。大家选举了原朝鲜平壤俄语大学校长辛泰凤同志担任特别支部书记，老孙担任副书记。全体同志接受支部统一领导。

支部做出决定，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努力学习，顽强斗争，每周一次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开展互助，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学习计划，并开展学习上的互助；开展有益的健康文娱活动以增强革命乐观主义；在对敌斗争方面，决定一方面继续向敌人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撤销“战犯”罪名，把我们释放回各自的战俘营，一方面积极设法与“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以取得总委会的领导，参加统一的斗争行动。

我听了很高兴，既高兴我们被朝鲜战友们接纳为劳动党员完全成了一家人，又高兴我们的支部领导坚强有力，细致全面。我心想：“别看我们老孙只是个营级干部，领导水平绝不比师级干部差。”但是我却没敢说出来给老孙听，我知道哪怕只是稍为流露出一点点这种情绪也准要挨一顿狠狠的批评！老孙一直非常真心地尊重朝鲜同志，也总是这样教育我。他的全局观念、党性远比我强。等到我和朝鲜战友们朝夕相处久了，真正了解了他们，我才为自己那种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感到害羞。

“宏大”的学习计划

老孙要求我模范地尊重和执行支部布置的任务，搞好和朝鲜战友的团

结。我决定先和我们党小组的三位朝鲜战友加强相互了解，同时制定了一个学习俄语和朝语的计划。

书记辛泰凤同志欣然答应我的俄语老师，三位同小组的朝鲜战友答应教我朝文。

当我知道代表团团长的围棋下得很好，便又请他当我的围棋老师。我在两天之内就用水泥和油漆做了一副漂亮的围棋，画了一个棋盘，材料都是我直接向美军总管托雷上尉要来的。

老孙对我制定的学习计划和实际行动很满意，开玩笑说：“看来你还想学好俄语去苏联留学呢！”

我说：“解放前我想去美国留学，没能实现，今后也不可能了，才打算回国后去当留苏学生呢！”

我至今还记得和我同一个党小组的朝鲜战友，一个姓朴的是人民军的师团政治委员，年约 40 岁，红扑扑的脸膛，左脚受伤有些跛，人很风趣，思想又很敏锐。难得的是他还会一些中国话，因为他是在图门江边长大的。另一位姓金的是人民军的副团长，年约 25 岁，身强力壮，逞强好胜，好争论问题，有时还红脸，下棋输了都不高兴，但很直爽勇敢。另一位姓李的是人民军的团后勤主任，是代表中年纪最大的，当时已 50 岁左右，我们叫他“阿爷爷”（即老大爷）。

阿爷爷会讲不多的几句中国话，为人和气、慈善，对我很关心，他给我讲的朝鲜民间故事最多了，我也很敬重他。

我们两个中国人和 16 位朝鲜战友生活在一起，语言障碍是第一需要解决的。一开始我们使用“国际语言”，朝、中、英语都用，有时还包括大量的手势。往往一句话里就使用了两三种语言词汇。这样的好处是我们较快地沟通了思想和日常交往。但这很不利于学习和掌握正规的语言，因此尽管和他们在一起整整一年，我却没把朝鲜语学好。

朝鲜的文字采用拼音字母，是把汉字拆开来使用的。如“l”和汉语拼音中的“i”相同，而“卜”和“a”同音，朝文一共 24 个字母，很好掌握，我只用了一个钟头就学会拼音，能拼读朝文单词和句子了。但朝文的语法和中、英文差别都很大。朝文属东方语系，和日文、蒙文类似。比如把动词（谓语）放在句子的末尾就是一个特点。我们说“中朝人民是一家”，他们说“中朝人民一家是”。

由于朝文中外来语多，包括来源于汉语的词汇相当多，语音和粤语相近，这样，朝鲜同志就常用汉语词汇和朝文语法来和我们谈话，日子长了习以为常，我们自己说汉语时也朝语化了。

就朝语来说，我学得最快最完整的是朝鲜的歌词，在那一年里，我几乎把他们会唱的歌曲包括民歌都学会了。朝鲜民歌我很喜欢，那种热情、活泼的风格和优美的旋律，很适合我的性格。还有他们的舞蹈，柔美之中含有刚健之气，我常想，朝鲜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而仍然保持着乐观善良的民族性，真是难能可贵。而且在集中营生活中，我更体会到作为人类灵魂语言的音乐，在苦难生活中能起到多大的激励生活的勇气和抚慰心灵创伤的作用啊！我也正是从这方面更愿意和朝鲜战友们接近和愈来愈融洽，使我成了他们大家喜欢的小兄弟。

学习俄语也较大地充实了我的空虚难过的“战犯”生活，分散了我那对自由、对祖国思念的痛苦之情。老师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我从字母学起，

要听、说、读、写、背诵、做练习。我向托雷上尉讨来了一些纸和半支铅笔。后来他不再供应纸，我就用烟盒、水泥纸袋缝订成本子，请老师写课文，请老师改作业。

辛老师的俄语真好，后来才知道他原是苏联塔什干师范学院院长，苏籍朝鲜人，共和国成立后才回朝鲜担任俄语大学校长。感谢他的教育，使我实现了那时想多学点本领回国好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回国之后我还真担任了几年中学俄语教师，我把从他那里学来的苏联歌曲教给我的学生。那些俄罗斯民歌曾以它深沉的感情使我着迷，减轻了我心灵上的痛楚，那首曾为列宁喜爱过的《光明赞》，几十年来都伴随着我度过了艰难岁月。

兄弟们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坏消息

在战犯集中营的第一个月，我们也曾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美军战俘管理当局将我们释放回去，写了不少抗议、要求，甚至进行过绝食斗争，但毫无结果。

不久，我们通过清洁队的战友和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知道总领导人老朴同志也已被单独拘押。而和谈已中断，敌人随时可以找借口强行镇压。总指导委员会建议我们暂行休整一下，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准备好迎接更加艰苦的斗争。

这些有机会外出的清洁队的战友们还带回消息说，“602”的志愿军同志已全部移往济州岛去了。说他们在被运走之前曾进行多次斗争坚决要求我们回去，否则拒绝上船，结果遭到严厉镇压，还是被强行押走了。这使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回国支队中只有老孙和我两个中国人留在巨济岛上了！

尽管朝鲜战友们多方安慰我们，我的情绪波动仍然很大，我在那本俄语练习本背面写上了首唐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被老孙检查我的作业时看见了，他沉默良久说：“我们家乡有句俗语：出头的椽子先烂！但椽子总得出头才能用。我们恐怕要有思想准备作出更大的牺牲！”

我看出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被敌人永远拘留甚至杀害。

我望着他说：“老孙，活，我跟你活在一起；死，我与你死在一起！”

他用手紧紧地抱着我的肩，又安慰我说：“敌人也不敢轻易杀害我们，他们还有被俘人员在咱们手里呢！你那么思念你故乡的巴山夜雨，有一天会再见到的！”

济州岛传来噩耗

10月中旬，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传来了关于济州岛第八集中营中国战俘的消息：他们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升起十面国旗，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战俘的回国意志，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护旗勇士们被杀死56人，重伤129人。这个噩耗使我们十分悲痛，也更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一直想象着济州岛上的战友们怎样赶制五星红旗，绑旗杆，挖旗杆坑，怎样在黎明时升起十面国旗来。战友们那雄壮的国歌声

响在我耳边，敌人大屠杀的硝烟火药味进入我的嗅觉，战友们在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时的英姿，不断出现在我眼前。我的亲爱的战友们，我多么想展翅飞到你们之中去啊！第二天，我们以中国战俘代表的名义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了一份《最最强烈的抗议书》。

从那以后，我们也更加思念在济州岛艰苦奋斗的战友们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亲密战友在这次流血斗争中是受伤了还是牺牲了呢！

我的学习热情因不能回去跟战友们共同斗争的失望情绪而逐渐削弱了。为了打发单调的日子，我开始更多地缠着老孙和朝鲜战友们讲故事，更频繁地找代表团长老李下围棋。

老李是三段围棋手，一开始让我 19 个子还赢棋，后来逐渐少让我。他教我很认真，什么“金边、银角、草肚皮”，什么“挖心战”、“声东击西”等等技术、战术都耐心指点，以致我在三个月后开始敢和他不让子对弈了。

他不想下棋时我便去找“阿爷爷”或朴政委讲故事给我听。我至今记得“阿爷爷”讲的那个关于“歌包”的朝鲜民间故事，大意是：一个穷苦樵夫上山打柴很晚才下山。

他在森林里迷了路，被动听的歌声吸引到一个林间草地，看见一群仙女正在月光下赛歌，他听得着迷后竟撞了进去。仙女们见他很善良便给他换了副金嗓子，还教给他唱歌，然后送他出森林。他回家后唱歌出了名，被一个恶霸地主叫去唱，并问他在哪里学的歌子，他讲了仙女们教唱歌的事。地主便自己去找到仙女们，请示学歌。仙女们见他是个恶人，便告诉他若真想学歌可以给他一个歌包放在脖子上带回去。他表示愿意，一个仙女便将自己脖子上的肉瘤给了他。这个地主回家发现“歌包”已长牢在脖子上，却半个歌也唱不出来，最后便活活气死了。

我听了后还问他：“要是我去见那些仙女，她们会给我一个金嗓子教给我好听的歌么？”

“阿爷爷”说：“我原来就猜想你是去找过仙女们了，不然你怎么嗓子这么好，会唱这么多歌呢？”

朴政委不会讲民间故事，便讲他自己的身世、经历。他本是一个穷苦的铜矿工人，受不了日本鬼子压迫参加了金日成将军的游击队，直到朝鲜光复，前年才和元山一位纺织女工结了婚。他说：“我的老婆大大地爱我。这次战争爆发后，我前方打仗去，她的抱着刚生的孩子哭了，很多很多眼泪的流了。现在她在哪里我的不知道，我在哪里她知道的没有，我要是活着的回去，就到处找她！找不到她，我路的不停地走！”

我被深深地行动了，我说：“您定会找到她的。战后工厂会恢复，她会回去上班！”他带着向往的神情笑了。

他还给我讲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他的师团急速往北撤退。他们在山里艰苦行军、战斗、被围、断粮、断水及被俘的经过。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民军战友整师整团地被俘，被俘时建制都未打乱。这是他们被俘后能够较快组织起来，并控制了自己的战俘营的重要原因。

老孙

白天我找朝鲜战友下棋讲故事，晚上躺下我又转过脸去要老孙给我讲故事，我很怕眼睁睁地睡不着。老孙一开始给我讲的是陈老总的故事（他们军原是三野的部队），粟裕同志的故事。我还记得他讲了陈毅同志刚进上海就派人去保护宋庆龄的故事，还有陈老总从江南带兵打到江北建立新的苏区

的故事。他讲时充满了那么深的对陈老总的敬爱之情！

老孙还给我讲过一个关于粟裕的故事，一次行军中，已担任三野副司令员的粟裕同志在行军中遇见了他在红军中当班长时班里的一名战士，那时他仍在当饲养员。他去向那位当年的红军战士问好。那位饲养员看了他半天，认出他来便说：“粟班长，您现在骑上马了，当上营长了吧！”

我还记得老孙讲了个骡马吃大炮的故事：淮海战役开始时，他们军的重炮还不多，为了吓唬敌人，便将芭蕉树干用黑烟灰刷了架在车上让骡子拉着故意大白天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行军。没想到在一次休息时，一头骡子饿了，竟啃下“大炮筒子”来吃，于是全军都传开了骡马吃大炮的奇闻。

老孙的这些故事，在 1952 年那个凄冷的寒冬，给了我这个刚参军两年多的大学生以多少温暖和鼓舞啊！我更多地理解了人民子弟兵和老一代革命家那种英勇无畏、智慧超人和对人民的忠诚！

关于部队的故事讲得差不多了，我还缠着老孙讲，他便说，他没有那个阿拉伯国王的妻子的本领，不能每晚一个故事地讲上一千零一夜。他建议一起来唱歌。我说：“唱什么呢？”他说：“唱《延安颂》吧！”于是我们深情地唱起了：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
夜色笼罩着河边的流萤，

……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后来他又教我唱《新四军军歌》。他是在用我们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激励我，鼓舞我！于是，我更想知道他的身世，为什么那么早就参了军，怎么锻炼得这么老练豁达，足智多谋。可他不大愿意谈他自己。

我绕了不少圈子才从他口里了解到，1944 年他 16 岁时，高中没毕业就从上海跑到新四军东江支队去参军抗日，成了他所在部队里的“大知识分子”。那时部队文化水平低，很重视知识分子。他较快地被培养成了一名政治工作干部，他是全军提升最快的最年轻的教导员，因而被战友们称作“小老兵”。他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是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但他本人的品质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非常令我痛心的是：老孙是在我军打胜仗时被俘的。当时我们几个军把美军围困在长津湖，他的营负责在袋形包围圈的南面堵口子，不让敌人突围南窜。连续几天的战斗，喝不上水，吃冰雪，饭送不上来只好啃冻土豆。他的几个脚趾头冻得坏死了。当时部队通信工具很差，战场形势变化又快，他是在跛着腿去检查一个应该由我军扼守的阵地时，进入那个已变成敌人营地的阵地时，被敌人哨兵拦腰抱住活捉了。

听完了老孙的沉重回忆，我躺在他身边更加睡不着了：“他要是不被俘，现在肯定还在意气风发地指挥着部队战斗呢！多么可惜，他为这场战争付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又一个没有春天的新年

1953 的新年，是在那呼啸着从北方越过大海扑向巨济岛的凛烈寒风中来到战犯战俘营的。

这天，根据我们代表团传下去的建议，全体“战犯”举行了新年团拜以鼓舞士气。

各个号内的战友都列队面向中心广场站在各自铁丝网前，在统一指挥下唱了《人民军战歌》和《金日成将军之歌》，呼喊了口号：“勇敢顽强，坚持斗争！”“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各小号内的战友们还高喊着：“向代表团的同志们致敬！”“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友致敬！”老孙和我激动地挥舞着帽子也高呼：“向人民军战友们学习！”

向人民军战友们致敬！”

我们两人又被代表团的朝鲜战友们抬起来，其他近千名朝鲜战友们向我们鼓掌欢呼！

于是：“毛泽东方岁！”“金日成万岁！”响彻了整个战犯战俘营。

这次敌人不知为什么未动用毒气弹来镇压。下午，当我们进餐时，发现各人碗里都有份朝鲜的特产“金鸡”——用生牛肉、辣椒面和盐一层层放在生白菜中腌制而成的。

这是伙房的战友们特意在一个月前就为我们代表团腌制出来的极为难得的食品。我十分佩服他们怎么摘到了这些材料，我更为他们这种盛情而感动。尽管我和老孙有点怕吃生牛肉，但细细嚼来，真是其味无穷，这又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餐！

在“战犯”集中营里，由于我们是代表团员，又都是军官，营内其余的朝鲜战友们对我们十分照顾也非常尊敬，他们来送饭或抬垃圾都要敬礼。我们所有的劳务都由他们替做了，连往外运送粪便也没让我们动过手。（也可能是管理当局怕我们到外面被其他集中营的战俘看见后闹事）。相反，在伙食上我们这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反而供应得充足些，这些都使我们很不安。

美军管理当局对我们代表团似乎也采取了一种只要我们不领头闹事，就尽量不招惹我们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这些“战犯”在物质生活上反而比在当普通战俘时要稍好一点，连我们睡的草垫也换成了木板连铺床。但这点物质上的“改善”却远不能补偿我们精神上因被迫脱离了自己的战斗集体而受到的损失。

苦闷

新年过后，从劳动党地下党带来的关于和谈的消息令人沮丧，看来美方还没有被打痛，还存在着一些幻想，还不想结束战争，我们回国还遥遥无期。

我有时无端地烦躁起来，拒绝了“再来一盘”（围棋）的邀请，一个人跑到帐篷外面，独自坐在铁丝网边上的乱石堆上，一坐就是半天。

我望着天上漫游的白云，羡慕它们的自由自在！“你们游向何方？会不会飘过朝鲜海峡飘到辽东半岛上去呢？你看见祖国那美丽的山川大地了吗？看见了那奔驰在原野上的列车、高耸入云的烟囱、喧闹的城市、寂静的乡村了吗？这一切离我多么久远了啊！”

有时，我被那钻过铁丝网跑出去的田鼠吸引住了。那小东西跑出去后竟然回过头来用那双豆粒般的小眼看看我，甚至立起后腿，用两只前脚抓抓胡须。“你这小东西也嘲笑我吗！你虽是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却比我这万物之灵要骄傲得多，因为你拥有世间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而我们人类为追求自由，几千年来已经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这时，在我心中又响起了《吉普赛之歌》那悲怆而充满向往的旋律！西班牙作曲家萨拉萨蒂在他写的这首著名的小提琴曲里表达了多么动人的对

不幸命运的反抗，多么深厚的对没有祖国的吉普赛民族的同情！

老孙有时也出来默默地坐在我身边，让我把头靠在他肩上，我们无声地交流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对自由对光明的憧憬……

晚上，我更多地感受了失眠的苦恼。爸妈，兄妹，还有未婚妻 M 常进入我的脑中，似梦非梦，特别是每次 M 在梦中给我带来的温情醒来即化为更深的痛苦……

斯大林逝世

3 月 6 日，托雷上尉忽然来到我们住的帐篷说：“一个重大新闻，你们的斯大林去世了！”

我们全都惊呆了。“不，你骗我们！”我先嚷了起来。

“张，今天是 3 月 6 日，不是 4 月 1 日。我们只是在“愚人节”才开这类玩笑的！”

说完他把藏在背后的手举起来，我看见他手里有张《星条报》。他说：“你给大家读读今天的头号新闻吧！”

我过去取来报展开一看，果然有镶有黑框的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的头像登在报头上，下面是粗大的通栏黑体字：“斯大林去世”。我举着报纸给战友们看了，什么也不用说了！

大家痛苦地低下头，响起了一片啜泣声。第二天，巨济岛“战犯”集中营的全体难友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早上 8 点大家列队面向广场站在铁丝网后面，唱起了朝文的《斯大林大元帅》之歌：“人类的太阳，照耀千秋，斯大林大元帅……”

场外的美军、李承晚军队平静地看着这个场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叫骂，扔毒气弹，他们大概被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真挚感情所折服，被我们所表达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气势震慑住了！

当托雷上尉吃惊地问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会对斯大林有这种感情？”我告诉他：“斯大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象征，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他摊开手，困惑地摇摇头。

开始交换伤病战俘

1953 年 4 月，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了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的惊人消息！

我们帐篷里沸腾起来了，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我们那些受尽折磨的伤病难友可以脱离苦海了，而我们自己也回国有望了！但这时我们也更担心我们这些“战犯”会被美方作为人质扣留下来不予交换。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给我方和谈代表的备忘录，详述了在巨济岛“战犯”集中营被关押的近千名“战犯”的人数、组成、被美方无理判为“战犯”的原因和经过。请求我方代表在和谈会上揭露美方企图长期扣押我们作为人质的阴谋；要求美方立即取消“战犯”罪名，立即释放我们回到各自的战俘营，等待交换遣返祖国。

我们代表团成员首先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按了血手印，又传到各小号内让战友们签名按血印，然后将这份长长的备忘录交由地下“联络员”送给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送往北朝鲜。

我们希望它能平安地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出现在板门店我方代表手里，我们的思想全集中在这上面了，白天黑夜大家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个问题。我心里更加急躁起来，日子似乎过得更慢了。

和谈终于签字

6月10日下午我们从托雷上尉那里知道了和谈终于在今天上午签字，战争终于从此结束的消息，我们忍不住当着他就欢呼和相互拥抱起来，眼泪在笑声中流满了各自的脸颊。

我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多大的痛苦！中朝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所有参战的国家为这场战争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托雷也搓着手愉快地看着我们。我忽然觉得应该感谢他及时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于是又转过身去和他握手致谢。大家也都走过去跟他握手表示感谢。

大家抢着说：“让我们共同庆祝今天这个节日吧！”“战争终于结束了！”“双方的敌对行动总算停止了！”“双方军人不再生死相拼了！”“双方的人民不再互相仇视了！”

托雷一面微笑着和我们握手，一面说：“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早日离开这荒凉的岛子，回到我的妻子和女儿身边去呢！”

十几天之后，巨济岛上的朝鲜回国战俘集中营的战友们开始遣返了。

满载着战俘的车队开始从“战犯”集中营的大门外驶过，我们拥向朝着公路的铁丝网，激动地向那些有幸首批遣返的战友们挥手道别！车上的人们战友有的认出了自己的代表，便发出“敬礼”的口号，大家在向我们庄重地敬礼！

车队过完后，我们回到帐篷里，各人都躺在床上，不说话。我知道大家和我一样心里都被焦虑、渴望、等待的情绪折磨着。我们不止一次向美军管理当局去信质问为何不立即将我们遣返，一直没有回答。

痛苦的等待

从7月到8月，眼看一车车的战友们被送走，而我们自己毫无动静，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了。本来不多的饭食每餐都有剩余，来送饭的朝鲜战友忧虑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剩饭取走了。

下围棋停止了，讲故事停止了，学外语停止了，大家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出去走一会儿又回来躺下了。

我被派去问托雷上尉我们是否将被长期扣留下去？托雷耸耸肩做出无可奉告的姿势。

我问的次数多了，他就说：“张，我自己也希望你们早日回去。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成天在铁丝网里呆着，已经觉得自己也成了囚犯！请你告诉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吧！”

当天下午，托雷拿着一个足球来对我说：“张，你们到操场上去玩玩足球吧！”

我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翻译了他的话，并请大家一起到操场上去玩。但大家到操场上只玩了半个钟头就不想玩了，倒是周围各分号的战士们羡慕地拥到铁丝网前面来“观战”。于是我请托雷把球依次给其他各分号的难友们玩。他同意了。

从此，“战犯”集中营反而有了运动场上的欢笑声。只是我们这个小号内仍然气氛沉闷。我们知道，如果敌人要扣留人质，我们首先难以幸免！

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找出合适的词句能恰当地说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难熬心情，因为我们所企望的不是一般的利益，而是自由和尊严，是新的生命！

到了8月中旬，托雷来告诉我们好消息：“和谈双方达成了交换双方‘战犯’的协议，你们可以回国了！”我们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们也更急切地盼着回国了！

结束“战犯”生活

8月底的一天，托雷上尉来到我们住的帐篷对我说：“你和孙少校带上行李出来吧，车在门外等着送你们走。”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看着他！

他又重述了一遍。这次我明白他所说的话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又转身去拉老孙。

老孙显然也听懂了托雷的话，他坐起来要我问一问托雷为什么只送我们两人？朝鲜战友们何时走？

我问了托雷，他回答说：“先送你们回到你们的同胞中去，好一起回国。他们当然也快了。”

于是，所有的朝鲜战友都过来抢着为我们收拾行李，一床军毯，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一个饭盒，一双筷子。看着他们那种难舍难分的样子，我们那种即将回国的欢乐情绪又被离愁冲淡了。

从1952年5月7日谈判代表团成立到今天，我们在一起整整度过了15个月，而这又是什么样的15个月啊！

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一拥抱告别。老阿爷爷抱着我哭出了声，说：“我等着你们将来从中国重访朝鲜时再见！但你们要早点来啊，要不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也哭着对他说：“阿爷爷，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给我讲的故事，也永远不会忘记您！”

我一定要争取早一点重访朝鲜去看望您，您的家乡地址我已经牢记在心上了！”

我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别后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可能去访问他那坐落在美丽的金刚山脚下的家！如今阿爷爷还健在吗？

和战友们重逢

当天，我和老孙被押送到一个紧靠港口的铁丝网内，这儿显然是专为这几个月来押送战俘上船回国临时修建的转达站。

到了那里，我和老孙又分别被送往战士队和军官队。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就被分开了。等我扭过身去看他时，只见到他向我摆了一下手就被押进另一个围着铁丝网的小营门。

我在战士队见到坐着整整一帐篷的在济州岛被判为“战犯”的战友们。他们都是在历次斗争中被敌人抓出来的“领头暴乱分子”，其中有不少原来“71”战士队的战友们。

大家一见我进来都惊异地站起来。接着是一阵欢呼：“张翻译回来了！”大家围过来和我握手，拍肩！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整整15个月的相互思念、担心，汇总在一起无法用语言表达了！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马兴旺营长，他正站在后面微笑地望着我。我挤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问：“您怎么没分在军官队？”他说：“我自一被俘就说我是炊事员，登卡片时也报的是战士，现在看来要遣返了，仍然是按战俘卡片来区分军官和战士的。”

我问：“刚才大家是在开会么？”他告诉我大家正在研究怎样向敌人提

出要求，让我们去会见咱们的红十字会代表，以便有机会向祖国亲人控诉敌人的罪行。

我惊喜地问：“咱们祖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真到巨济岛来了么？”

“这是我们的估计。因为刚才站岗的美军扔了一包中华牌香烟进来，大家分析这包烟是我们的代表带到岛上来的！大家正议论找谁去跟美军谈判呢，你回来得正是时候！”

正说着，张达走过来把那包中华牌香烟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上面还印有天安门的华表，都舍不得打开包来抽呢！”

拿着这包来自遥远祖国、闪着红色光芒、包装非常精致的香烟，闻着它那沁人肺腑的香味，看着它上面“中华牌香烟”几个亲切的中国字和那象征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玉石华表图形，我的心和手都在发颤：“中华，中华！两年多来，我们呼唤过您多少遍哪！”

最后一次斗争

我立即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份《致美军管理当局》的英文信，信中要求“让我们立即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否则我们将拒绝上船！”

经过交涉，看管我们战士队的美军士兵同意让我们派代表去见负责的美军少校。于是，我和马兴旺同志一起，拿着同志们赶制出来的纸花束，向美军管理人员住的帐篷走去。

中国“战犯”战士队的小铁丝网位于这个港口转运站的最里面，小营门口正对着10米宽的甬道，往前走，甬道两侧是关押朝鲜人民军“战犯”战士队的用铁丝网隔开的一块块营地。

见我们手持纸花束走过，朝鲜战友们都拥到铁丝网跟前来问我们干什么去？我使用朝文说：“去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

但到了美军管理人员帐篷，那位美军少校却十分傲慢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到岛上来，你们都立即给我回去！”

我拿出那包中华烟对他说：“我们已得到这包中国出产的香烟，这证明我们红十字会代表已经来到了岛上！”

他哈哈大笑着说：“不错，根据双方协议，国际红十字会是派了代表到双方战俘营进行考察，为此，从板门店给代表们预先运来了给养。只可惜你们中国的红十字代表并没有到岛上来，这些中华牌香烟只好由我们分享了！”

我们表示不相信他的慌言，声明不见代表决不上船！

回到战士队营地，全体中国“战犯”举行了一次示威，唱歌，喊口号：“我们坚决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

这天晚上睡觉时我发现大家脱下的皮鞋都是崭新的，再看大家的衣服从里到外也都是新的。一问，才知道这是前天他们到达时美军强迫他们换下的——以此在板门店证明他们优待俘虏。为此，大家进行了坚决抵制，结果吃了一顿“毒气弹”后，还是被美军强行把大家的衣服剥下来收走了。不少战友为抢夺旧衣服挨了枪托。

第二天早上一位美军中尉来通知我们准备上船。我们便全体静坐示威。

我再次对美军中尉说：“不见我们的代表不上船。”美军中尉说：“你们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只到了釜山考察，确实没有到岛上来！”我们便要求会见其他中立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美军中尉听了后转身去了。

不一会儿，头戴防毒面具全副武装的美军开来了，催泪弹扔进来了。

大家立即用军毯蒙头盖上全身。

我听见美军咒骂着进到我们的铁丝网里面来了，正想掀开军毯看一下，忽见一双美军大皮靴站在我跟前，紧接着一颗嘶嘶作响的毒气弹塞进了我的“军毯防线”。一阵极难闻，极刺鼻的浓烟呛进了我的嗓子，使我剧烈地咳起来，两眼非常难受，愈流眼泪眼睛越痛。

我站起来跑进了帐篷，那个美军追进来扭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拖到铁丝网外面的甬道上，我睁开眼睛看见我们的人都被美军拖了出来。

那位美军中尉认出了我，走过来要我叫大家排好队上船去，我转身寻找马兴旺同志，看见他一面擦着被“催出”的泪水一面对我喊：“告诉他，我们要向全世界控诉他们的暴行！”

我对中尉大声译出了这句话。他说：“我不管你们向谁控诉，我的任务是要押你们上船！”说完一挥手，美军士兵们将刺刀指向了我们，逼迫着我们走出转运站。

到了港口码头，我看见一艘万吨巨轮停靠在趸船外侧。在巨大的趸船甲板上坐满了人民军战友，我们被押着走上趸船，走过他们留出的空地，走向高达十几米的巨轮舷梯。

这时我忽然听到一声“张东母”（张同志）的喊叫，我循声望去，看见了代表团的朝鲜同志们正坐那里向我挥手道别。

我兴奋地举起双手向他们示意：“永远团结在一起！”然后上了舷梯。

“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朝鲜战友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不会忘记我们共同度过的苦难岁月！”我一面往上爬，一面回过头去多看他们几眼，他们还在那里向我们挥手呢！

我们被押进了一个宽大的货舱。过了一会儿，巨大的轮机轰鸣声响起来了。我感到了船身在转动，便扑向舷窗，只见巨济岛码头转动起来，然后向后退去，愈来愈远。那撞击在石砌码头上的浪花飞溅着，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一群群海鸥在浪花中嬉戏着。似乎这只是个安详的、和平的、从未发生过人间悲剧的普通海岛！

巨济岛退得更远了，像突出在大海中的一座黝黑色的山峰。我想起两年前被敌人用登陆舰押送巨济岛第一次见到它在大海中的可怕形象时的心情，整整两年煎熬过去了，我们在这个荒岛上度过的日日夜夜真像一场噩梦！

啊！巨济岛，我们就这么离开了你这死亡之岛。那汹涌的海水能洗净我们流在你身上的血泪么？能冲掉我们留下的愤怒的呐喊声么？能抹去我们在烈士坟旁留下的足迹么？

第十五章 回到祖国怀抱

在汉川会见祖国红十字会代表

1953年9月5日，我们最后一批“战犯”战俘——包括近140名志愿军战俘和近千名人民军战俘——被英军用万吨巨轮从巨济岛押送到仁川港。立即又将我们用火车押往汶川市。

我们终于又见到了城市和乡村，看见了平民百姓与绿色的庄稼。尽管还到处是战争的遗迹，满目疮痍，但这毕竟是人间烟火，是一片和平景象啊！

在离开仁川和到达汶川时，列车两旁都有不少穿戴破烂面黄饥瘦的南朝鲜市民拥上来看热闹。于是，全列车各车厢响起了《金日成将军之歌》《人民军战歌》的歌声，从车窗里飞出去一些衣服、毛毯和写有标语口号的小传单。

我们的车厢也唱起了《东方红》、《祖国颂》，扔出去美军强套在我们身上的崭新的美军制服。站在我们车厢两端的美军士兵这次没有干涉我们，还笑着对我们举起了大拇指。

傍晚我们抵达汶川县一所由军用仓库临时改成的拘留所。可能是怕我们再闹事，用一排小铁笼子来关押我们，每个笼子里只能装下一二十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看见一位美军中校陪着几位穿着平民服装的人走过来，其中竟然有一位身穿中山装年约50岁的慈祥长者。

我们大家都站起来拥到铁笼边上。只见这位长者快步走过来对我们说：“我是祖国派来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今天特来看望你们，慰问你们！”

唰的一下，所有的瘦骨磷峋的手都伸到铁笼外来了，都伸向了这位祖国的使者，祖国的亲人！

大家抢着争着要跟他握手（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党中央派来的潘芳同志），一些年纪小的战友已经哭出了声。

潘芳同志一面轮流和跟前的同志们握手，一面环顾大家高声地说：“同胞们，同志们，几年来祖国深知你们所受的苦难，充分了解你们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一直关心着你们的命运，为了你们能早日回国做了最大的努力……”

他下面的话被愈来愈来的痛哭声完全淹没了。啊，祖国派来的亲人，我们终于真切地听到祖国的声音了！原来祖国并没有忘掉那些虽已陷入地狱仍在为她奋战的儿女，党没有忘掉那些尽管落入魔掌仍在用生命捍卫着她的战士。祖国啊，党啊，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对你讲！

整个拘留所被哭声震撼着，地上洒满了泪水！潘芳同志也掏出手绢擦着满脸的眼泪。

他向大家摆手说：“同志们，同胞们，请不要再难受了！今天就将送你们去板门店，今天你们就将回到祖国的怀抱！祖国人民正在殷切地等待着欢迎你们呢！”

潘芳同志总算走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一把抓住他的手使劲摇着。他深情地望着我，点着头。我旁边的难友又把他的手抢过去握着，有人终于喊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感谢祖国亲人来看望我们！我们将永远做祖国的好儿女！”大家情不自禁地都跟着喊起来。

我看见那位美军中校和其他几位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远远地站在门口互相说着什么，看那种神态，好像他们终于理解了这些中国士兵对自己国家的感情。

板门店在望

中午，给我们送来了最后一顿午餐：一个个纯大米饭团，大家反而吃不下去。

卡车在门外发动了，心急如火的我们被送上车，离开汶川，驶向板门

店。

车队在蜿蜒的公路上奔驰，路窄，坡度陡，转弯多。车速已够快了，但我们仍希望它快些，更快些，谁也顾不上欣赏沿途洒满阳光的山野风景，它再美也是异国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车子爬坡了，过了一个山口，下面是一个绿色的洼地，远远地我们看见了在洼地中央有几座绿色的帐篷，帐篷前面好像是个用树枝搭成的门楼，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了，那就是板门店吧！

山脚下有一道不太高的单铁丝网防线顺着山势在草丛中延伸过去。呀！这肯定就是分界线。前面就是中立区了，那里就真是板门店了！

那座牌楼越来越近，上面的四个金色大字也愈来愈清楚了。啊，看清了，那是“祖国怀抱”四个字啊！它们那金色的光芒那么耀眼！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祖国，祖国，祖国啊！

祖国，我们回来了

车队在牌楼前停下来了，众多穿白衣的志愿军军医和护士早就排列在停车场前。

车刚一停，他们就拥上前来。带队的美军中尉从驾驶舱里走下来向负责接收遣返战俘的志愿军军官敬了礼交上了我们的名单。我们的军官还了礼收了名单。看完了名单，清点了人数，便点头让大家下车。

车帮一打开，我们这些憔悴消瘦、形容枯槁、只穿了一身内衣的归俘，不等抓住前来扶持的军医、护士们的手就迫不及待地往下跳，一个个扑在亲人怀中放声痛哭起来。

我最后被扶下车来，由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年轻护士搀扶着。我只觉得天地在旋转，脑子嗡嗡作响，分辨不出是别人还是自己在哭！分辨不出流出的是悲愤的泪水，还是欢乐的泪水！

我脚步僵直地跟着这位护士进入了帐篷。他替我脱下了全部衣服，向我身上和扔在一旁的衣服上喷洒了消毒药水，用毛巾给我擦干，又拿来全套志愿军的内、外衣。我像一个完全失去知觉和意识的病人任他一件件给我穿上衣服戴上军帽，我抚摸着这散发着染料香味的军衣，久久地，呆呆地望着他。

他脸上现出了惊慌的神色，一把将我紧紧地拥抱在怀里，摇晃着我，喊着：“同志，同志，你不能这样，你要说话啊，说话啊！”

我终于听懂了他的话，“啊……”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控制不住全身的剧烈颤抖。

他把我抱得更紧了，像对一个孩子一样不断在我耳边说：“好了，好了，我的好兄弟，这下可回到祖国来了，回到亲人身边来了。敌人太可恨了！你们的斗争真了不起！”

这一切我们都知道，都明白！不要再难过了，啊！听话！”

我在他的抚慰下慢慢镇静下来。外面的汽车发动机声又响了起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往后挣扎着。

他赶快说：“这是咱们自己的汽车，是来接你们去医院疗养的。不要怕，美国鬼子早就滚蛋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低头捏着自己身上崭新的志愿军军服，知道这一切确实不是在做梦，而是真真切切回来了！自由了！不再是个俘虏了！

我把头靠在他肩上由他搀扶着走出帐篷，上了停在外面的那辆苏式中

型吉普。车上已有十来个难友。那位好心的护士同志和我紧握了手说：“你先去医院，等我收拾完回头就去看你。”

汽车开动了，我们被送往开城志愿军前方医院。

从此，完全结束了我从1951年5月27日被俘到1953年9月6日交换回来这一段漫长的永生难忘的岁月。

第十六章 祖国的温暖

震惊世界巨济岛事件的主角

山口伦平

在中国时曾经和我在同一个工厂从事工程师工作的张先生在一次电话中告诉了我一件事情。说他的兄弟最近写了一部自传性的书，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位张工程师和我一起工作过近二十年，他的全家我都很熟悉，但是以前却从未听他说起过有这么一位兄弟。

不久，我收到了张工程师的兄弟从中国寄来的这本题为《战俘手记》的书。原来张工程师的这位兄弟是朝鲜战争时震惊中外的巨济岛事件的主角——中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张泽石先生。

张泽石先生1929年生于四川广安，19岁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先后从事地下学运、农运以及武装斗争。1951年5月参加朝鲜战争，在战场上不幸受伤被俘。

以后在战俘集中营坚持反迫害斗争，发动了生擒美军杜德准将、震惊世界的巨济岛事件。

张泽石先生作为最后一批的交换战俘，1954年返回了祖国。

张泽石先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志愿军英雄，但是等着他的是长达一年的受审和被视作“变节者”的悲惨命运。他接着被开除了军籍和党籍，以后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和叛徒，惨遭迫害。直到1981年才被恢复中断了30年之久军籍和党籍，可谓重见天日。

张泽石先生把他这三十多年来的遭遇和历史写成这部长达三十万字的自传小说《战俘手记》，部分章节曾在很多报刊连续登载，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张泽石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最近国内某电视台正在邀请他一起将此书改编成剧本，准备在电视上上演。

《战俘手记》座谈会发言

顾骧

（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

我非常投入地读完这部书，它给了我心灵以极大的震撼！过去曾片断地读过，这次完整地通读了。我几次不忍卒读，是因为难以忍受感情的折磨，但它的吸引力又使我非读完终卷不可。这部书的价值不仅在文学方面，而更

在它的重大思想价值方面。它是现代革命史上一出巨大的历史悲剧，罕见的悲剧，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悲剧，而是民族的一个悲剧。它不是虚构的小说，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但它具有许多优秀悲剧文学毫不逊色的悲剧美学特征，具有一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震撼心灵的崇高的悲剧力量！因为它真实，就更加感人。它还含有令人深思的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部书的悲剧力量、令人无限感伤、令人深思的是在书的下半卷里的主人公们的命运，美的毁灭！本来是英雄，却成为罪人，包括主人公在内都有负罪感，这多么令人惊心！

说实话，我本人在战俘问题上的科学的现代观念也是最近这些年才获得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表现得十分沉重。自古人类就有战争，采集狩猎者之间的争夺是原始战争。有战争就有战俘，对待战俘及其观念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进步的。在西方不仅有日内瓦公约，而且在观念上把战俘当成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可以理解的、平常的现象。我想这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潮的浸润是艰难而可贵的！在我们国家，不仅在队伍中有“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壮举，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不是也有领袖训示“不成功便成仁”么？原来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沉重的历史积淀！

“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古训啦！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铸成下意识的集体观念。

我不敢非议在革命战争中弹尽粮绝、舍身赴义的烈士们，他们无疑是要千古垂范、万世师表的。但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战俘们在与敌人作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后胜利归来，无疑也是应该受到国人尊敬的，他们是大功臣，是英雄！

然而，我们从我们历史文化的观念方面思考，认为悲剧的成因不能简单归罪于某些人，还要思考的是战俘们归国后的命运显然与我们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潮是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直到八十年代末近一个世纪的左倾思潮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灾难？战俘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吧！这也不值得深思吗？

我与泽石同志是同辈人，也许是命运，我在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便转到地方从事新闻工作。我若还在部队也开到朝鲜会怎么样呢？我的思想与感触当然会更多！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么大的一个历史冤案，不是从上而下平反的，而是以泽石同志为代表的受难者自己抗争、坚韧不拔地努力而争来的！《战俘手记》是这一冤案的产物，是这一悲剧的文化结晶。这是一本将会令全世界人士关心的书，这是一本“人类文化学”要研究的书，这是一本有巨大悲剧力量的爱国主义的好教材！

再一次向泽石同志及你们的战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